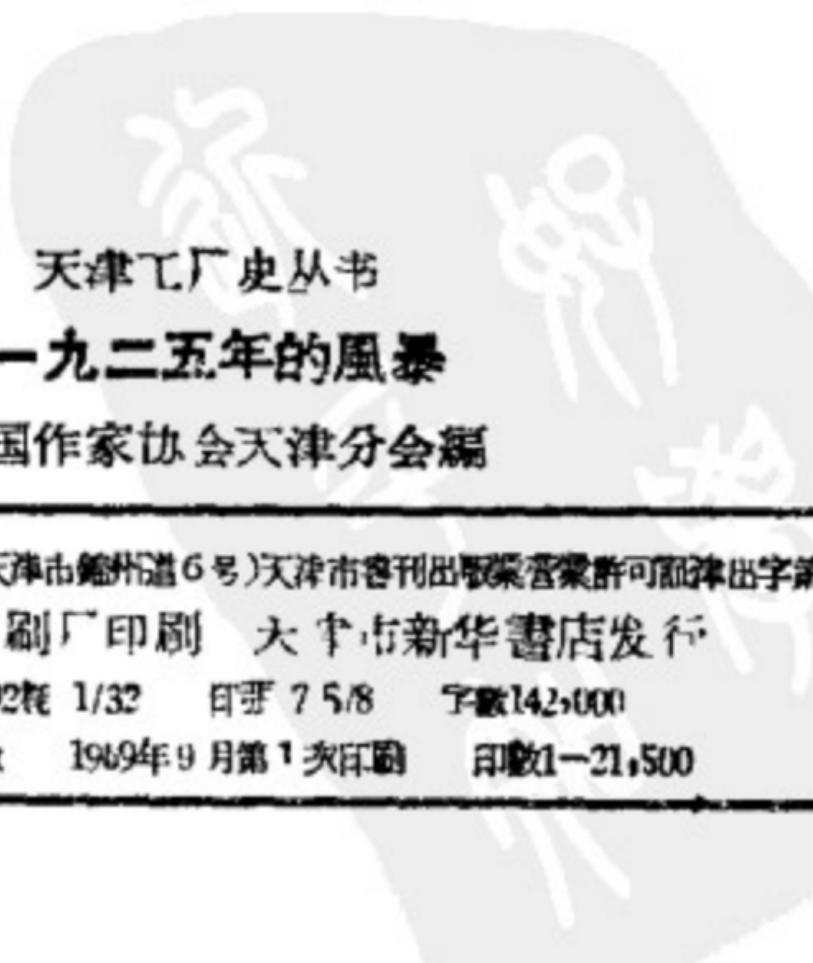


內容 提 要

棉紡三廠建成于一九二一年，到現在已有將近四十年的歷史了。四十年來，棉紡三廠的工人們歷經了帝國主義、官僚買辦階級及其爪牙們血腥的統治，直到解放，工人們才真正做了工廠的主人。

這個集子里的文章都是棉紡二廠工人口述或自己寫的，這是他們的鬥爭歷史，也是棉紡三廠的歷史，也是整個工人階級從過去的被剝削、被壓迫變為今天工廠和國家的主人的歷史。



天津工厂史丛书
一九二五年的風暴
中国作家协会天津分会編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和平区和平路6号) 天津市报刊出版营业登记证津出字第032号

天津市第一印刷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 7 5/8 字数142,000

1959年9月第1版 1969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1,500

天津工厂史丛书序

“天津工厂史丛书”的编辑出版，是想把从一九五八到一九五九年間，天津工人进行工厂史写作活动的成果，做一个初步的总结，以便在这一基础上繼續前进。

工厂史的写作，是由第一个偉大的无产阶级作家高尔基倡议的，并得到苏联共产党中央的贊同，和广大苏联作家和工人的热烈响应。在二十到三十年代期間，苏联工厂史的写作活动，在高尔基亲自主持下，获得了丰富的成果；对苏联的工人阶级起到了巨大的鼓舞和教育作用，整理和保存了大量有关苏联工业发展的宝贵史料，还培养了一批为数不小的优秀的工人阶级作家，成爲整个苏联文学队伍的組成部分。

天津工厂史的写作活动，就是受到了苏联先进經驗的启示，在中共天津市委和中国作家协会的领导和帮助下进行的。一九五八年，是一个偉大的、难忘的年代：中国人民以巨人般的步伐，跨过重重困难，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設大躍進。天津工人写作工厂史的活动，就是在这样的年月

开始的。人们意气风发地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巨大劳动，同时，回忆到了过去的黑暗年代，悲惨生活以及英勇的斗争，而更加鼓足干劲，力图彻底埋葬旧生活，和迅速建立新生活进行了胜利的战斗。

“天津工厂史丛书”，可以说这是这一时代精神特征的反映。虽然就其写作内容来说，大都还是旧生活的回忆，但其中已包含着有觉悟的对比；包含着对于已往反对帝国主义和阶级敌人的光荣自豪；而且对正在进行中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充满信心。就这个意义上说，一九五八年工厂史写作活动的发生和发展，正是工人阶级政治觉悟空前提高，革命热情高度昂扬的表现。事实上，写作工厂史活动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不但发动了数以万计的工人参加提供材料和进行写作，并且每一篇优秀的工厂史作品的出现，都立即变成了良好的工人教材，随时随地起到了鼓舞和教育的作用。同时，就是在这样一个群众性的，工人阶级集体写作工厂史的活动中，涌现出来了一批积极的、有才能的工人作者。

在写作工厂史的活动中，各工厂党委积极领导了这一工作。因此能够在比较短的时间，获得比较大的成果。工会、青年团和一些高等学校的教师、学生，都是这一活动积极赞助和参加者。不少的作家，直接参与了编写和整理工厂史稿的工作。

“天津工厂史丛书”，就其内容来说，是丰富的；就形式来说，也是多样的。但是，这毕竟是一项新的工作，

是群众性的創作。關於它的許多想法和做法，以及作品的內容和形式，都還不能說是成熟的，還有待于在實踐中逐步解決。但是作為天津工人階級在描寫自己的生活和鬥爭，在表达自己的意志和感情，在傳寫工人階級偉大的創造歷史的活動中，他們已經邁出了勇敢的第一步。

中国作家协会天津分会

一九五九年六月

目 录

- 一九二五年的風暴 姚兆生等口述 (1)
- 在大風暴的日子里 蔡近衛 口述 (13)
- 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屠刀面前 侯光华等口述 (23)
- 我們二十六个粗紗工人 美汝为 (37)
- “偷” 陈宝树 口述 (42)
- 八間房 刘振华等口述 (51)
- 我十一岁上工 劉德和 (59)
- 小妮子 赵立元 口述 (66)
- 妹妹的死 陈玉兰 口述 (70)
- 任大起 任大起 口述 (76)
- 四个指头 梁俊峰 口述 (82)
- 小老板 高海三等口述 (84)
- 工贼赵奎高 美汝为 (89)
- 工人文娛生活的今昔 許宗旺 (93)
- 母女兩代 王佩玉等口述 (100)
- 走过的路 刘肇福 (113)
- 青年工人王德昌 王德昌 口述 (127)
- 改造“二十三”部 李景文、董世珍 (134)

- 報仇 李景文 (139)
革新能手孙宝魁 孙寶魁 口述 (144)
“五好”党员刘淑珍 潘國英 (158)
党给我带来了文化 何春堂 口述 (165)
劳动模范赵起山 許宗旺 (173)
永不熄逝的火花 赵长来 (185)
我画画的經過 李孟齋 (194)

附 录

- 1925年天津“益世报”上的罢工新闻摘录 (199)
播种 王 林 (206)
我們是怎样编写工厂史的 棉紗三厂党委宣傳部 (228)

一九二五年的風暴

姬先生、項瑞芝等 口述

鄭莊子庚元里有一間坐北朝南的紅色大房子，中間是四扇合叶門，一邊一個大窗戶。起先蓋的是說書場，從一九二四年九月李培良同志到這以後，就成了工人鬥爭的指揮部。

李培良同志是個細高個兒。留分頭，戴眼鏡兒，經常穿着一件藍布長衫。待人特別熱情、和氣，無論誰和他見一次面，就象多年的老朋友不願離開。他到鄭莊子後，就在書場辦了一個平民學校，白天教窮人家的子弟，晚上教工人，都不要學費。

鄭莊子當時有兩個工廠。一個是資本家劉仲榮開的寶成，一個是漢奸王克敏倒賣到日本手里的裕大。這兩個工廠就是現在棉紡三廠的前身。那時候工人們在廠裏，累個七死八活，拼命的干還整天吃不飽，誰家的孩子也上不起學。自从李培良同志在這成立了平民學校以後，人們就一個傳一個，傳得很快，不幾天就傳遍了整個鄭莊。

子。很多工人都把自己的子弟送到这里来念書。工人們虽说都願意識几个字，由于工作劳累，生活困难，也沒有心思學習去。李培良同志为了动员工人們学文化，每天一早一晚在工人上下班的时候站到厂门口，見了工人們就打招呼，說：“下班啦，有空到我那學習，識几个字多好哇！要不人家少給你算了錢你也不知道。”工人們一边答应，一边說：“李先生是真好哇！”

宝成工人董兆义念过兩年私塾，識几个字，很快就跟李先生熟悉了。他到车间以后，逢人就說：“今天下班跟我到李先生那去吧，他又教咱識字，又經常說笑話給咱听。”就这样今天去倆，明天去仨，很快，屋子里就坐不下了。

李培良同志和工人們在一起就跟亲兄弟一样，給大伙倒茶，跟大伙一塊下棋，一塊拉唱，就是在上課的時候也是隨隨便便。有一天，他問大伙：“今天有挨打挨罰的嗎？”

“天天有。”工人們告訴他。

他长出了一口气，在黑板上写了一个“工”字，說：“咱们工人就是苦哇！你們看，这字上邊是塊石头，下邊是一塊砖，把工人堵在当中，受多大罪呀！”

“这有什么办法呢？”

“有办法，咱们不叫他打！”

“誰敢呀，这样还不知道啥时候給开除了呢。”

“一个不敢，人多了就不怕。”李培良同志打了一个

比方說：“一根筷子，一折就斷；一把筷子，再折也斷不了。一根麻繩，一折也斷；一捆麻繩，再折也折不斷。根據這個道理，我們工人就必須組織工會，有了工會，工人就有了爹娘。他們打一個人，全不干；他們開除一個，全都不來。这么一來，工人就有了力量，工會就可以直接和資本家講理……”工人們越聽越對，越聽越入神，下課以後還不走，還請李培良同志接着講。李培良也越講越帶勁，還講了帝俄時代工人們的苦難生活，更多的講了十月革命的故事和推翻了沙皇以後工人們當家做主的幸福生活。同時結合着中國的情況講了很多打倒資本家和帝國主義的道理。工人們有時聽到深夜還不肯離開，甚至有時聽一夜第二天還去上班。工人們聽了這些故事以後，知道了自己受苦的原因，也懂得了必須組織起來的道理。回到車間以後，就一傳十，十傳百的傳开了。到轉年二月寶成的工會就組織起來，全廠工人都加入了工會。十二個人一小組，一個車間一個工會支部。

在組織工會的過程中，董兆義、姬兆生等人最積極、最熱心，所以被選為工會代表。以後李培良同志又給他們講了共產黨的性質和共產黨的綱領，使他們逐漸對黨有了認識，不久便光榮的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四月各車間都有黨員了。

在寶成組織工會的同時，北洋、裕元、裕大、華新等紗廠的工會也組織起來了，最後又在李培良同志的幫助下，把这几个紗廠的代表組成了聯合會。從此各廠的工人

就亲如兄弟，紧密的团结在党和工会的周围，在党的领导下向资本家和帝国主义展开了一系列的斗争。

在1925年“五一”劳动节和“七一”的早晨，全市的工人、学生、商人集合在南开操场上，一人一根棍子，一人一个小旗。有多少人呢？数不清，反正是黑压压的一大片。在整理队伍的时候，八个人一行。游行的时候工人在前边，高举着革命的红旗，迈着刚劲的脚步，沿着南马路前进。一路上喊着响亮的口号：

“打倒帝国主义！”

“收回铁路矿山！”

“取消二十一条！”

“打倒资本家，不买日本货！”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当游行的队伍走到东南角（当时日租界的边上）时，红旗越举越高，口号越喊越响亮。日本鬼子虽然拿着明晃晃的刺刀，可也没敢吭声。这两次游行示威，显示了工人阶级的偉大力量，进一步加强了工人的团结和斗争意志。

当时的资本家不把工人看在眼里，他们依仗着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横行霸道，欺压工人。

宝成的资本家，在七月十几号，无理开除了一个女工。当她找到工会的时候，工会一方面给她做饭，一方面就研究怎样同资本家交涉，让她恢复工作。这事经过党内研究以后，就确定让她陈生等三人代表工会去与厂方谈判。

晚上八点钟，太阳刚落山。三个代表从车间出来，走向西边厂长办公楼。他们进了厂长室，只见厂长和四个稽查正坐着说笑呢。厂长看见他们进来，立刻变了脸色，竖起横眼地问：“干什么？”姬兆生往前走了两步说：“我们代表全厂工人，有点事和厂里商量一下。”

“什么事？”厂长往椅子上一仰，带答不理地说。

“我们希望能讓那个被开除的女工上班，因为她家里老的老、小的小，全靠她吃饭。求你行好，給些方便。”姬兆生很有礼貌地说。

“是誰叫你們來的？”这肥贼似的家伙吼叫着問。

姬兆生很和气地说：“是工会。”

厂长一听工会两字，“叭”的一下，把桌子拍的山响。然后指着姬兆生說：“不提工会还罢了，一提工会，能讓她上班也不叫上。”他的話还没有落音，总管奸笑着說：“你們罢工吧，你們不罢，我們还想停兩个月呢，全把你們餓死！”姬兆生使劲压着心头的怒火，还是請求說：“我們不想罢工……。”他的話还没有說完，厂长就跳起来大罵：“王八旦，給我滾出去，你們不罢工我停工！”姬兆生这时改变了态度，指着那一群肥猪說：“你們是想讓我們罢工？那好吧！”說着，就走出来。

姬兆生回到车间以后，馬上召集各工会支部的代表开会，把刚才的事一五一十的說了。大伙一听就火了，有人握紧了拳头說：“咱们馬上罢工！”

“就这么办！”大伙都贊成。

在会上研究了罢工計劃以后，各工会支部代表回去立刻組織工人纠察队，并且挨个告訴工人們准备罢工。一夜的工夫全准备好了。到下班的時候，纠察队队员們，每個人一个竹节鉄条，分南北兩队卡住了路口。当上班工人来了的时候，他們就說：“今天別去啦，咱們罢工了。要听工会的。”

“为什么罢工呢？”有人問。

队员們把昨天晚上的事一說，大伙都表示贊成工会的决定。一小时以后，下班的全出来了，上工的一个也沒有进去。厂門口前边堆的人山人海。工会和李培良同志研究了罢工条件以后，又拿来大旗喊了一声：“工友們，咱到鹽坨地开会去。”这时工人們就象一股巨流，涌上鹽坨地。到鹽坨地后，姬兆生站到高桌上說：“兄弟姐妹們，今天我們要罢工，要和資本家斗争，我們怕死不怕。”

“不怕！”千百个声音像轟雷似的喊了一声。

“对！”姬兆生繼續說，“为了咱们工人的利益，为了讓資本家看看咱工人的力量，咱们一定要斗争到底！”他



的話剛落音，人群里就有人喊：“找資本家算賬去！”接着，就有人開始走動。老姬拉開了嗓子喊：“兄弟們，先別動。咱們還得要條件呢。除去要求那個女工上班外，喂，咱們還要求：一、把落下去的工資再漲上來；二、要吃飯的時間；三、廠方不准隨便打罵工人或開除工人。這些條件大家同意不同意？”

“同意！”人們齊聲回答。

老姬拿了大旗說：“走吧！”

罷工的隊伍在大旗下面，高聲唱着雄壯的歌曲，包圍了厂房。當時的職員全吓得尿了褲子，警察剛要說話，忽然哐朗一声，一塊石头把辦公樓上的玻璃打碎了。緊接着呼啦一下，人們沖進了辦公樓。這時候只聽見劈哧喀嚓，桌子翻了个腿朝上，鐘表砸的扁塌塌，洋錢票子撕成了碎紙末，全樓的玻璃嘩啦啦。砸完大樓以後，工會代表說：“兄弟姐妹們，咱們不愛財，一點東西也不拿。現在咱們就還到鹽坨地開會去。”大伙說了一聲：“走！”這一支浩浩蕩蕩的大軍就離開了工廠。

工人們一連三天沒有上班，廠里派人來和工人們講和，都被工人們趕跑了。等到第三天晚上八點來鐘，由上邊來了一輛小汽車，里邊是學生代表。他們除去鼓勵了工人的鬥爭以外，還問清了工人要求的條件，然後派了兩個人進廠調和。到晚上十點，學生代表從廠里出來，又在鹽坨地開會。那個學生代表說：“廠方除去答應工友們提出的全部要求外，又補充了一條：在罷工期間工資照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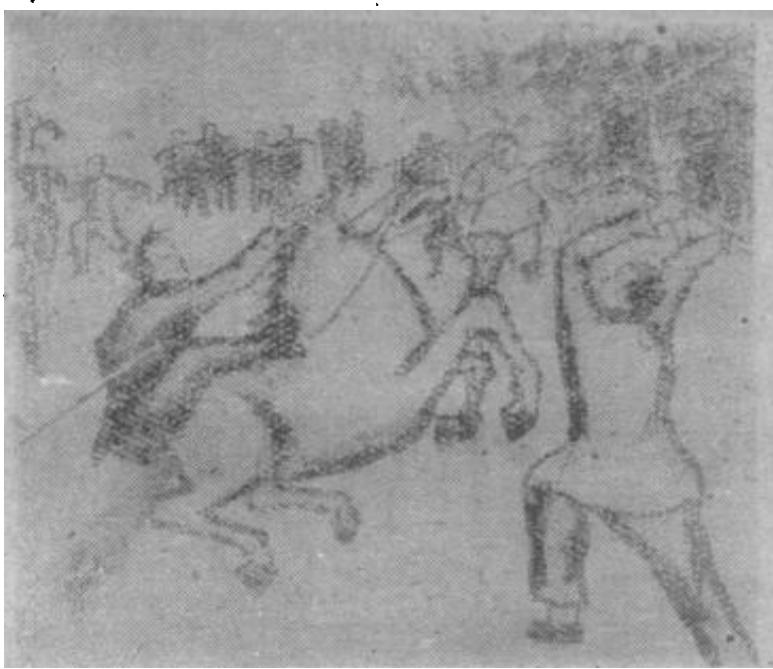
这时，会场上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人们在“共产党万岁”声中离开了会场。

裕大纱厂的工会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和汉奸走狗的破坏下，力量比较薄弱。但是在宝成胜利的鼓舞下，他们也坚强的组织起来了，推选项瑞芝等为代表，在李培良的帮助和领导下，他们从七月二十日（旧历）中午就向厂方日本人提出了四个条件：一、要求给工会办公的房子；二、要求给工人增加工资；三、要求实行八小时的工作制度，并且给吃饭的时间；四、要日本人签字，公开支援广州、上海日英纱厂工人罢工的斗争。

这些合理的要求都被拒绝了。为争取斗争的胜利，工会又组织了工人罢工。六点钟下班的时候，成千上万的工人赶到麻塘地开会，准备罢工。

可是日本人早买通了军阀李景林。他派来了保安队和手枪队来镇压工人。工人们还没有集合好。他们就把工人队伍包围了。同时李景林的侄子李树凤，也骑着大马，耀武扬威地赶来镇压工人。当他正走着，有个徒弟拦腰挡住了他的去路，他立即掏出手枪来，指着这个小孩骂：“小兔崽子，你不怕死啦！”他呲牙裂嘴，眼珠子瞪得有牛子儿大，想一下子把小孩吓跑。他没想到咱们小兄弟挺直了腰板，瞪着圆圆的小眼，一只手拍打着胸脯说：“我不怕死！”他这一嗓子吓了这位大官一跳。为了施展他的威风，李树凤朝这十来岁的童工要开枪。他还沒有来得及接机，被工人们一火钩子打下马来。这时反动军队兽性大发，开

槍打死了工人王鶴鳴，還打傷了另外兩個工人。工人們一看就急眼啦，工人代表項瑞芝一擺手，工人們就象暴發的山洪包圍了厂房。為了防止更大的犧牲，一個



工人在槍林彈雨中爬上了電線杆子，卡斷了電話線，使裕大紗廠和市內斷絕了聯繫。

反動軍隊看事不好，緊緊地關閉了鐵門，妄想把工人關在門外。可是他們沒想到罷工的隊伍象沙漠里的一場風暴，一連把大牆推倒五處，冲進了厂房。

黨組織當時充分的估計到，這場鬥爭要取得勝利必須進行全面的鬥爭，所以早就把裕大罷工的消息通知了各廠。當人們聽見槍響以後，寶成的工人立刻趕到支援。他們從東西寶成新工房那兒推倒了大牆，冲進裕大工廠。北洋、裕元的工人聽到槍聲以後，連飯也沒吃，就拿着鐵錘趕來相助。當時楊莊子擺渡口堆的人山人海，把所有的船都動員來擺渡。就是這樣，那些年輕力壯的小伙子也等不得，嘰通嘰通地跳下水去。雖然一只手拿着鐵錘，可比小鴨兒飛的還輕快，還靈敏。

工人的队伍冲进工厂以后，人们的喊杀声和叮哐叮哐砸机器的声音搅成一片。厂房的玻璃象下雹子一样唏哩哗啦的掉下来，钢丝的针布被铁锤砸的一个坑接着一个坑，整个摇纱车从楼上的窗户里扔到厂外，发电机也给砸了个粉碎，不到两个小时把机器全部砸毁，厂里厂外成了一堆破窑，到处是机器零件。

工人砸着最不解气的是那个保险柜，它简直是个铁疙瘩，工人一铁锤接着一铁锤，很多人累的冒大汗，就是砸不开。后来实在没办法了，大伙一使劲抬起来，把这个铁怪物嘴通一声扔到海河里。

工人们冲进工厂以后，李景林派来的保安队和手枪队一看来势不好，就缴枪求饶，工人们把大枪一捆一捆的收起来。工厂的日本人为了活命，就趁天黑的节骨眼，换上了工人衣服带上了工人帽子溜跑了。只有一个日本大夫被捆起来，被锉刀开了花，鲜血流了满地，土城的警官不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也来送死，工人们把他捆起来要投到河里。跟他一块来的毛署员吓的面如土色，给工人们跪着求情，说了三重好话，工人们才放了他。

天越来越黑，工人们越砸越带劲，一直砸到深夜才离开工厂。当时虽然把工厂给砸个粉碎，但是并没有一个人拿厂里的东西，最后工人还派了自己的纠察队看守厂房。

工厂里一夜也没有断人，第二天天刚麻麻亮，瓢泼地就聚集了一千多人。他们正在那交谈砸厂的有趣故事、嘎嘎嘎乐的山响，北洋的工人们也罢工了，他们从杨庄子

過河來保衛裕大鹽工的勝利。裕元也停工了，成千上萬的工人拿着黑紅棍，从郊庄過河也來保衛裕大的勝利。當時河里所有的船都被請來作擺渡，一會工夫把工人都擺過來了。那些人呀，灌滿了大而圓的銜角子。工人們打着大旗，排着隊，邁着剛勁的腳步向前走。

反動軍閥李景林被工人們狠狠地給來了个耳光子，他便惱羞成怒，一夜也沒有睡好覺。第二天一早，就調集一個團的兵力，架着機槍，拉著火炮，擺了一個半圓形的陣勢，把工人包圍起來。

裕元的工人队伍走着走着，看見反動軍隊上着明閃閃的刺刀冲來。工人代表就高聲問：“工友們，怕死不怕？”

“不怕！”千万个声音匯成了一个巨雷，震的反動軍隊面打顫顫。工人的队伍越走越近，反動軍隊吓坏了，趕緊停下来对工人們开槍。大槍、手槍、機關槍的聲音混在一起，噠噠噠……象放鞭一樣。

工人們勇往直前，工人代表在前面搖幌着大旗，再一次問：“工友們，怕死不怕？”“不怕！”“好！”工人代表把大旗往高处一舉，說：“我們要加速前進！”這時工人队伍冲到反動軍隊面前，并沒有停止脚步，繼續前進。可是反動軍隊的刺刀已經刺向了工人代表。工人代表掄起了自己的青紅棒一連打壞了五根大槍。工人的棍棒和反動軍隊的刺刀撕殺在一起。

最後，工人手無寸鐵，被反動軍隊冲散了，接着，挨

家搜查，到处抓人，只要見了穿小衣裳的就逮走。就連兩個背着皮包走路的学生也被抓去。当天逮了四五百个人。李景林恨透了这些人，依着他是用机槍点名，全都打死。这个消息傳出来以后，天津的学生就一列車一列車的往北京开，把北京的城牆都包围起来，向当时的段执政請願。李景林迫不得已，押了一个多星期，才把那些人放出来。

裕大紗厂被砸坏了，一直停工三个多月，才把机器安裝好。要开工的时候，日本人为了进一步的鎮压工人，利用了叛变的工賊，把过去搞过工会的人全开除了，徹底的破坏了工会組織。妄想使工人們老老实实地受他們剥削。

他們的算盤完全打錯了。当时虽然沒有了工会，但党并没有放弃对工人运动的領導，受过党的教育和在斗争中鍛煉出来的工人群众，永远跟共产党一条心，只过了一年，工会就又組織起来，繼續領導着工人向帝国主义和資本家进行斗争。

(王子經 整理)

在大風暴的日子里

韓近庸 口述

一九二四年夏天，鄭莊子后面一間鋪面房忽然挂起平民學校的牌子來。有些工人到那裏去上課。我好奇地想：那位教書先生是怎樣的人呢？這天晚上，我走到那裏去，見屋裏有個看門燒水的老頭兒，再就是那位教書先生了，那位先生瘦瘦的，是個二十歲上下的青年。見我進去，很客氣地和我攀談，我們互通了姓名，原來這位先生叫李培良。聽說我是寶成紗廠的工人，他拿出課本來叫我試讀。我一下都念出來。他說：“你滿好，在這樣低的班放不下去。”又說：“雖然不上學，常來談談吧。我很願意和人聊天。”

从此，我就不斷到李培良那兒去。我二人真是一見如故，很投緣。他給我講“鴉片戰爭”的歷史；還給我講“台灣問題”、“五四運動”……講得既詳細又具體，我很吃驚，小說，這樣年輕的人怎麼懂得这么多？

這以後，在感情上我們更接近了。我也常向李先生講

說工厂里的事情。李先生对这些事似乎很感兴趣，有时间了又問。

慢慢地，他就給我解釋“社會”是什么意思，“階級”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有資本家、工人之分。又告訴我什么是“階級矛盾”，“階級斗争”。……后来又談到苏联，李先生說：苏联是列寧領導无产阶级革命成功的国家。他說：一九一七年春天虽然推翻了沙皇，但是政权被資产阶级篡夺了。一九一七年冬天无产阶级才把政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目前因为接收的是沙皇留下的爛攤子，又受到十四个国家的进攻，虽然把帝国主义赶走了，經濟还很困难。他又补充說：苏联人民的生活还不很富裕，但因为他们是布尔什維克領導的國家，沒有人压迫人的現象，所以人民是很幸福的。我問道：“中国有沒有布尔什維克？”他回答：“已經有了。”我又問“我想加入这个布尔什維克，它在那儿呢？”李先生含糊地說：“好，我們慢慢找吧。”

我心里总盤算这件事，过几天又到李先生那儿去，我把話題又扯到布尔什維克。我說：“天津有沒有布尔什維克？”李先生略一沉吟，大概是看着我的要求太迫切了；肯定地說了一句：“天津也有。”听了这话，我倒躊躇起来。我回到家里，想：这李先生可能是布尔什維克領導的一个人，不然，他怎么懂得这样多？我又想到：在目前，反动軍閥勢力大，参加共产党一定很危险，随时有流血牺牲的可能。……这种顧慮剛一冒头，我就想起自己的出

身。我的父亲是个作棺材的木匠，哥哥从小当童工，我自己也是幼年时代就失业受苦。像我这样的人参加共产党为什么还有顧慮？……我反复想了好几天，把問題想通了，就跑到李先生那儿去，把我的一切想法統統告訴他，最后我堅决地向他說：“我一定要參加共产党，為真理牺牲性命在所不惜。”李先生听了我这一番傾吐，兩眼放光地說：“是呀，一个头脑清楚的工人要是聽說共产党，是会像孩子找到母亲一样，恋着不放的。”于是他很坦率地告訴我，他就是一个党的工作者。他願意介紹我入党。从这天起，我就是一个共产党员了。

从此，李培良同志不仅是我良师益友，而且是我最亲密的同志和战友了。不久，李培良同志又發展宝成的粗紗工人姬兆生、董紹义为党员，我們三人就在李培良同志的領導下进行工作了。

我們首先把宝成工会組織起来。我們發展会员的办法是三三制，就是姬兆生、董紹义、我，各分头發展三个会员，这每三个会员又下去分头發展另三个会员。如此一層層發展下去，但都是單線联系，而我們的手里却掌握了所有工会会员的名单。仅仅三四个月，正会会员就發展到一千八百多人，并选出十五个工会委员。我、姬兆生、董紹义都是委员之一。这一切工作都进行得很秘密。

无论如何秘密，我們組織工会的消息还是很快就傳到那些工头的耳朵里了。有几个南方来的女工头跑来向我探听（因为我也 是南方人，她们和我很熟悉）：

“聽說工人們組織工會了，你贊成嗎？參加嗎？”

我說：“當然贊成，也參加；不參加，生活就沒有保障。”

她們眨巴眨巴眼，又問：“我們能參加嗎？”

我說：“將來可以，現在還不能。”我趁勢向她們解釋：“你們工頭、領班都是賺薪俸的，都是勞動者。只有大老板，算資本剝削工人的，才是資本家。”又告訴她們：工人有了自己的工會，不是好欺侮的了，今後再不能打罵工人。

她們听了，忙說：“我們可不敢。”

有个五十多岁的老工头金宝芝說：“要那样，这碗飯也難吃了，我們不如回南方。”

我說：“飯有什么難吃，只要你們不胡作非為，也沒人難為你們，而且你們也是勞動者，將來也可以參加工會哩！”

我說這話的意思是警告她們，不要阻擋工人參加工會，並打消她們的種種疑慮顧慮，免得節外生枝，但她們還一味囁嚅我：“以後有什么消息可告訴告訴我們呀！”

有个女工头蔡小妹太不識相，在背後唧唧咕咕，說些破壞工會的話。我知道了，就忙找她說：“你們當工頭的，最好少管閒事，管管生產就得啦。要是破壞工會，人家可要把你當工賊看待，就要受工人的打。哼，那可是不客氣的狠打！”蔡小妹被我吓唬住了，不敢再唧咕。過去工人們三三兩兩的談話，只要被她們發現，就急忙探進腦

袋去探听情况，从那儿以后就不敢了，远远地看見人們在一起聚談，就急忙閉目走开。我对領班也經常宣傳：你們是腦力劳动者，将来也可以参加工会。領班心中安稳了，不惧怕了，也不过問工人了。

在这个阶段，我們經常在一起开小会，談工作發展情況。也时常到李培良同志那儿去匯報。李培良同志給我們的指示簡短扼要而具体。比如我和女工头的談話要不是李培良同志的教导就談不出。姬兆生表現得最勇敢，經常說：“只要对工人阶级有利，要我死，我就死！”

我們对工会會員也經常进行教育，一有机会，我就向他們說：工人阶级都是亲密的弟兄，沒有南方人、北方人之分。團結起来才好办事。又說：当了会员就一定要听工会的指揮，不随便拿工厂的东西，不破坏机器，不无故吵架；要是出現了工賊也一定要向工会報告，由工会决定如何处理。工人加入了工会，不仅觉悟提高了許多，而且生活作風也确实有了改变。

工会成立不久，我們就參加了党領導的全天津市工人学生舉行的一九二五年五一節大游行。从这天起，天津市工人阶级的生活里增加了一个最主要的内容——政治。

五一节剛過，我們寶成工会就發動了一次罢工斗争。这次罢工提出的条件有：削減的15%工資照發；設立女工喂奶間；要求給工会俱乐部房間。

原来工厂老板借口蝕本，在数月以前就普遍削減工

人工資15%，工人們早就心懷不滿。那时有小孩的女工來上班，總是把孩子放在盛棉紗的籠筐里，上面蓋上一層棉紗。稽查來車間兜圈子，他走到東，就把盛小孩的籠筐挪到西；他走到西，就把籠筐挪到東，好像捉迷藏；如果被他查出，就要開除出厂。女工們為了生活，整天提心吊胆，苦不堪言。這是工人們迫切要求解決的兩個主要問題。

李培良同志曾經指示我們，在工人還未普遍覺悟起來的時候，直接的經濟鬥爭是能够爭取大多數人同情的。所以我們就抓住這幾個主要問題把全體工人發動起來。

罷工這天，早六點以前，工人糾察隊就在工廠大門外把守着，工人只許出不許入。有來上班的，就告訴他：“先回去吧，咱們罷工了。要是工廠老板照發工資再來上班。”工廠里的總管、稽查一看，沒有一個工人進廠，機器全砸吧了，很發慌。打聽出罷工原因，他們也作了一番考慮：說蝕本完全是謊話，只不過嫌剝削的少了些，而且自从削減15%的工資後，工人生產情緒不好，生產率普遍下降，故意破壞機器的現象增多，反而得不償失。要是再無限期地停工，損失就更大。另外，資本家也這樣想：工廠自开办以來，從沒罷過工，人們為什麼一下子這樣齊心，都不來了呢？要是鬧大了恐怕對廠方更不利。因此種種原因，就產生了急欲解決的心情。但是和誰接洽呢？誰是鬧事的頭兒呢？找不着。他們只好把一個女工頭找來，說：“你去打聽打聽看，到底是誰領頭搗亂呀。現在是大事化小，小事化無，只要他們上班，一切條件都不成問題。”

这个女工头找到我們的一個委員（她不知他是委員，只是看見他平日最活躍才找他的），把資本家的話告訴他，然後說：“你知道嗎？罷工的頭子是誰？”這委員回答她：

“嘿，你問頭子嗎？可多啦！我給你找找看！”這委員把女工頭的話又告訴了我和董紹義、姬兆生三人。我們到李培良同志那兒去請示。李培良同志認為：既然達到目的，就應該赶快复工。於是我們就接受了廣方的复工要求。

我們第一次罷工在工人中打下一個很好的基礎。工人們對工會產生了感情，人與人之間團結得更好，有困難能夠互相幫助。相對的，工頭在車間的威風銳減了，連稽查、領班見到工人的心中也畏懼三分，笑臉相迎。

我們每一個工會委員的情緒更是高漲。大家都深深体会到工人階級力量的偉大。李培良同志曾對我這樣說：“我們革命的前途是樂觀的。比如寶成紗廠的資本家只有一個，其他人慢慢都會認清真理，被我們爭取過來。”他還諄諄地告誡我們：“鬥爭勝利了，不要驕傲，應該預料到，革命運動不會總是順利的，有時會受到挫折，但我們共產黨人要有鋼鐵意志，永遠站穩立場，不屈不撓地鬥爭，要不惜犧牲個人一切，把改造世界的責任擔當起來。”對於李培良同志的談話，我們當時都能心領神會。他晚上和我們談了這些，白天在搖紗車間，我和董紹義、姬兆生就在一起討論。我們的思想認識在這時又有了一步的提高。

第一次罷工之後不久，在一九二五年七月初，我們又

开始了第二次罢工。原因是厂方无故开除了一个女工。前面說过，第一次罢工要求厂方給女工哺乳間，厂方答应是答应了，也給了；但是，天曉得，那是怎样的哺乳間哪，他們在車間洋灰樓梯下面的阴暗处安置了兩塊木板，就把孩子們像放鱸魚似的，一个挨一个排在那里。夏天，蒼蠅把孩子的小臉爬黑了，孩子們的糞便沒人收拾，以致这哺乳間的氣味比廁所还難聞。好几个孩子抗不过这恶劣的环境，上吐下瀉地夭折了，有些孩子患着重病，女工們深深感到这样的哺乳間还不如取消了好。因此，有个女工悄悄把孩子帶到車間，仍旧放在籠筐里。但是稽查把孩子翻出来，就把这个女工开除了。

事件發生得很突然。我們感到在上次罢工中既然取得很大胜利，就應該再接再厉，一鼓作气地把資本家的威風打下去，并且决定由工会推出代表向厂方展开公开斗争。当时的代表有姬兆生、董紹文等三个人。

厂方也有他的一套想法。上次工人罢工，为了維持厂方利潤，不得不答应了工人提出的全部条件，但是事后他們实在覺得气不出，感到第一次表現得很被动，是失策的，想借开除女工的事显示一下对工人的压力，所以态度很强硬。當我們的代表質問他們为什么无故开除女工的时候，总管立刻放下臉來說：“你們为什么借工会的勢力干涉工厂‘行政’？既然設了哺乳間为什么把孩子放在籠筐里？她不守廠規，就一定要开除！”資本家这样猖獗，我們的代表当然不能示弱。越說越僵，厂方坚持开除这个女

工；我們說：“如果不許可这个女工复工，明天就罢工。”
厂方說：“好，你們罢吧，我們還要关门呢！”

于是我們宣布了罢工，除去要求讓这个女工复工，還提出其他改善工人待遇的条件。工厂為了跟我們頂一下，竟調來警察把大門把守起來，不讓一個人进去，也不和工会代表談判。看样子是要孤注一擲地跟我們斗一下哩！

我們把这些情況告訴了李培良同志。李培良同志認為既然提出罢工就要堅持，否則資本家更認為工人好欺侮了。但一定要爭取大多數工人參加這個斗争，只要人多心齐，最後勝利必定屬於我們。按照他的建議，由姬兆生同志出頭發動群眾，我和董紹義從側面起聯絡與鼓動作用。

在罢工这些天，我們每天都开会，總是在鄭莊子前面的那塊荒地上聚會。姬兆生同志表現的最積極也最勇猛。开会時他手持会旗，走在眾人的最前面；在大会上他的講話也最能激動人。工友們都能响应他的号召。

一連好几天，厂方對我們的要求置之不理。警察拿着槍把廠門堵得嚴嚴的。這激起我們全體工人的憤恨。這天，我們廠的工人由姬兆生同志帶領着，把廠圍了。好几百人圍在廠門口，哇哇地起哄示威，跟着就亂扔磚頭，把廠辦公樓的玻璃砸得粉碎。資本家太死硬了，向他們示威是必要的。

當時黨有個新的計劃，那時上海五卅慘案就要結束了，為了提高天津市工人階級的政治覺悟，展開對帝國主義的斗争，黨決定發動裕大紗廠——一個日人开办的紗廠

的工人罢工。就想先迅速地把宝成紗厂的罢工斗争結束。因此，人們砸了好半天玻璃，把气也出了，就由工会代表把大家劝回去。門口外仍由我們的糾察队把守，沒有一個人来上班。

过了三天，在党的布置下，天津市学生代表到工厂来調停，主要向資本家說明利害关系，說上海为了五卅慘案工人們鬧得很凶，劝他們还是及早答应了工人的条件为妙。厂方原来要跟我們賭口气——他們認為受工人的气，听学生代表一說又害怕了，再一想，为了开除一个女工把事鬧大了也不值得，因此，就答應了我們提出的一切条件，于是我們的第二次罢工又获全胜了。

裕大紗厂和我們宝成紗厂隔壁为邻，是日本人开办的。这个工厂的工人身受双重压迫——阶级压迫，民族压迫。上海日本紗厂打死工人顧正紅的五卅慘案大大地激怒了全厂的工人。他們本来躍躍欲試，但苦于沒有組織，很难成事。我們宝成紗厂接連兩次罢工斗争的胜利使他們看得心里都出火了。我們知道，裕大紗厂有些工人也在平民学校上学，他們經常受到李培良同志的启发和教导。李培良同志也常和我及董紹义、姬兆生談起裕大紗厂的事，告訴我們：天下工人是一家，應該以阶级友愛的精神协助裕大工友組織工会。因此，我們也从侧面帮助他們作了一些工作。裕大有个南方来的工头郑林祥，和我很熟識，我不仅說服他不要阻碍工人参加工会，还使他起了一些促进作用。

由于大多数工人对组织工会早就有迫切的要求，仅仅一个月，裕大工会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宣告成立了。

裕大工会刚成立，就趁上海五卅惨案尚未结束发动了一次富有政治意义的罢工斗争。

当时裕大工会代表全厂工人向厂方提出的条件有：增加工资；要求吃饭时关车；要厂方日本人签字，公开支援广州、上海日英纱厂工人罢工斗争等。日本人恼羞成怒，完全拒绝了这些要求，把工厂大门上了锁，并和天津督办李景林取得联系，要来五十名保安队和数十名警察镇压工人。工人清楚地看到：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勾结在一起了，他们采取的手段比国内资本家更凶狠。有些工人急得心焦，罢工期间，向谁要工资？吃什么？很多人拖家带口，真是扛不住。

这些时候，我和董绍义、姬兆生常常到李培良同志那儿去，向他彙报裕大情况，大家都很愁闷，感到束手无策，没办法帮助。

李培良同志掌握了这些情况之后，一方面向上级党请示，要求各兄弟厂支援裕大纱厂的罢工斗争，另一方面叫裕大纱厂工会出头，发动工人向裕大当局示威，要求取消“存工”制度。

那时一个新工人进厂，要先于两个月活儿才发一个月的工资。那第一个月的工资一直不发，叫作存工。最后如果工人自动离职，存工就不发；如果是厂方无故辞退的，工人才能拿到存工。这存工好像是一个工人的押租，充分

說明資本家对工人的无理剥削。

‘黨組織对这次斗争是十分重視的，事先作了極周密的部署。要存工的这天正是大礼拜（那时各厂都是劳动两个星期才休息一天），早晨天刚亮，裕大紗厂的工人們就手持工本，向工厂拥来。人們口里喊着：“我們耗不起，不干了，把存工算給我們！”“我們要回老家啦，把存工算給我們当盤費！”“把存工算給我們，我們要吃飯！”……人越聚越多，好像潮涌一样。保安队慌了，把刺刀冲向着涌上来的人群。为了維持他們的“威严”，用刺刀督着人們后退，在工厂门口划出一塊“禁地”，不許人們向前再进一步。

人越聚越多，好像水漫金山寺一样，从四面八方向这座紗厂卷来，呐喊声响徹云霄，整个郑庄子被人流堵塞住了。原来是裕元、北洋各厂的工人队伍赶来支援阶级弟兄的罢工斗争。

这一个上午，我和董紹义、姬兆生等人到李培良同志那儿去請示，还不断找工人弟兄們談話，忙得唇敝舌焦，汗流浹背，主要是研究怎样才能把政治斗争搞得更鮮明。現在斗争力量轉为我强敌弱了，敌人有如大敌压境，我們一定要充分利用这已造成的声势把斗争更推進一步。李培良同志認為應該趁这时組織一个上海五卅惨案后援会，把旗子赶快打起来。他命令我馬上去写一面旗子，拿到群众当中去。

我赶到宝成紗厂工会俱乐部，用白布紅字写了一面旗。

子。上面的字到现在在我的记忆里还很鲜明，是：“援助上海五卅惨案，替顾正红报仇！”

这时已经是下午三点多钟，我拿着旗子向裕大纱厂跑去。裕大纱厂门口已是人山人海，一望无际，少说也有一万多人。我费尽全身力气，刚刚挤到接近工厂门口那块“禁地”的人丛里，这面旗子就引起周围人的注意。“啊！替顾正红报仇！”好几个工人弟兄跑起来，眼睛里闪着兴奋的光芒，“哈，这个旗子真好，我来打！”他们争先恐后地向我手中夺旗子。旗子被一位青年工友抢在手中。这青年拿到旗子之后，好像一位冲锋陷阵的战士，不顾一切地冲开众人，一直跑到工厂门口前面的那块“禁地”上，面对着工厂，站得正正的，把旗子高高地、高高地举起来。这是对敌人的蔑视、示威！看，我们就是要到这块“禁地”上来，就是不害怕！人群立刻爆发出好像巨雷一样的喝采声、鼓掌声。持旗的青年听见这助威的声音，把旗子举得更高了，他的身体显得更高大，更威严。虽然持枪的保安队拿刺刀威吓他，他仍屹立不动，好像一座雕塑的石像。这种壮烈的场面一直持续了十余分钟，保安队只是站在原地恫吓，连一步也不敢向他走近。保安队恫吓的声音哪里还起作用？群众的喧嚷呐喊把什么都压下去了。

在这最有纪念意义的十余分钟内，反动派露下了屠杀工人的毒手，只听“砰”的一声枪响，持旗的青年应声倒地。雷似的鼓掌声、喝采声立即变成“吼”“吼”“吼”的愤怒声。只一刹那，另一个工人抢进这块“禁地”，把

倒下去的旗子重新举起，举得更高，站得更挺直。人们的吼叫声更是摇撼天地，似乎要把一切都吞没了。

这种情况又继续了十余分钟，保安队又把子弹向第二个持旗的工人射来，人又倒下去！敌人竟敢一次又一次地这样进行疯狂的屠杀，上万人的仇恨立刻熊熊地燃烧起来，为了给受伤的战友报仇雪恨，为了显示了工人阶级宁死不屈的精神，谁还怕死？谁不想把凶恶的敌人一口吞掉！当第三个勇士刚把第二次倒下去的旗子重新举起时，用不着谁发布什么冲锋陷阵的号令，大家一齐开始了英勇的行动：有的爬上紧闭着的大铁门；有的攀上厂围墙；有的强挤进大铁门旁边开着的小角门，双手揪住保安队伸出来的刺刀，说：“扎吧！扎吧！老子不怕！”挤进小角门的人一个挨一个，三四双有力的手揪住一把刺刀。保安队哪里抵挡得住，这些被愤怒燃烧得红了眼睛的人们，正在这时，“咔喳”，“轰隆”，传来一片震撼人心的巨响，原来是西围墙外面的电线杆被人们砍折了，围墙被众人猛力推倒了，成百上千的工人像洪水一样，从那个豁口冲进来，“哇哇”的喊叫声给从小角门冲进来的工人助了威，也吓破了那些已经无法抵御的保安队的胆，他们的心一慌，把被揪住的刺刀松了手。我们的人趁势把枪夺过来，立刻刺刀尖返过去向着保安队。这些败兵见势不妙，抱头鼠窜地向后门逃去。人们哪里肯放，一路紧追，有个保安队长没跑了，被人们逮住，五花大绑地捆起来。

这时我们的人大部分拥进厂房，由于愤怒，仇恨地捣

毀着机器。工会原来和所有参加罢工的工人講好：不打人，不砸厂。但是控制不住的怒火使人們把什么都忘了。我們一些工会負責人急得双脚跳，拼命地嚷：“快住手，不要砸了！”但誰还听这些，就这样，大家还觉得解不了心头的仇恨呢！

我急忙跑到平民学校去，李培良同志沒有在。这时天已黑下来，厂子砸完了，人們也走散了。我心中惦念受伤的工友，就走到裕大工房去，在一間单身宿舍里看見那第一次持旗受伤的工友。他姓王。有几个裕大的工友正守着他，我們端着一只蜡燭，查看他的伤口。子弹是从膝蓋骨旁边穿进去的，削了老大一块肉，血汨汨地流着，人已经过去了。現在外面已經戒严，附近又沒有大夫，大家面面相覩，束手无策。

這一个夜晚極不安靜，李景林派好几个騎兵到庄子上找我們，要我們俘擄來的日本人和繳获來的槍枝。这些人走后已是深夜，我又到裕大工房去，这时受伤的王姓工友因为流血过多已經死去了。我們这些守在他旁边的人都流下了眼泪。

我的心情很沉重，回到家，怎么也睡不着，我悼念这位死难的烈士，他的死激起了多少人的阶级仇恨啊！

第二天，天还没大亮，也就是早晨四点多鐘，李景林的军队包围了郑庄子，我和好几百名工友一起被捕了。

(夏 壯 整理)

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屠刀面前

侯光华等口述

一九四三年那年冬天特別冷，把地都冻拔了裂，一道一道的縫子跟小孩子嘴一样。那时候，工人一天吃兩頓爛土豆，干十二个鐘点的活，連飢帶累，把人折磨的个个都是面黃肌瘦，成了皮包着骨头的人灯。

这年二月二日，下午六点钟，天津裕大紗厂“津字班”的織布工人們东倒西歪的进厂接班了。工人們走到車間，譁嘩喧吼叫的机器声一震，渾身就出起虛汗来，眼前發黑，天旋地轉。当时，有个保全工人，叫侯光华，他曾經受过党的教育，参加过一九二五年七月裕大紗厂的大罢工。那时候，党派来的李培良同志，在郑庄子庆元里举办了一所平民学校，每天教給工人認字，学注音字母。这位同志每天除了教工人學習文化以外，还給工人們講解放的道路，講中国工人受压迫的原因。有一次，那位同志对大伙說，“苏联現在把帝国主义赶跑了，把本国的地主、資本家也打倒了，工厂里工人当家作主，乡村里农民平分了土地，

人家可好啦，咱们中国非得走这条道穷人才能翻身。咱们工人只要抱住团体，嘛也不怕，找资本家要嘛，就得给嘛。侯光华当时听的直了眼，越听越入耳，越听越对心思，他句句都记在心里。那工夫工人和这位“先生”都分不开了。一有空工人就提着茶壶找他去聊天。有一次，侯光华拿着张传单在车间里看，被工头邵阿有看見了，上去把传单夺过去，大声地喊：“你还要腦瓜子不要，这是共产党撒的呀，再看就弄走你！”尽管这样，谁也没挡住侯光华参加在党领导下的一九二五年裕大紗厂大罢工……

在这一天，侯光华看到工人这种情形，难过的直跺脚，再也干不下活去了，他把工具袋往下一背，跟另外几个人凑在一堆，商量了一下，就挨着小组串起来了。碰上人他就问：“怎么样，还干得了嗎？咱罢工吧！”“对，吃不住劲儿啦，罢！”每个人都这样回答。他从这天晚上八点钟就开始传，到十点挨个都通知好了。然后，他站在中间正中央，往四周一看，全车间工人的眼睛都望着他。这时候，他鼓足了劲把两手一扬，哗啦一声，七百多台布机立刻停住了。“罢工，不干啦！”三百多个工人一面喊着，一面随手抄起铁条、打梭棍、梭子……一齐往车间门口拥来。这时候，侯光华站在人群里喊：“大家抱住团体呀，谁开车也不行！”

这工夫，几个把头耀武扬威地卡着腰迎上来，指手划脚地喊：“开车，开车！”

“谁喊开车呀，把他的狗腿敲断！”大伙这一嗓子，

把几个把头吓的打起了哆嗦，兩手一搭拉，歪了歪腦袋，往后退了老远。把头們一看使硬的不行，就又变了花招，其中有个叫刘宝禎的帶着苦笑臉，往前迈了一步，一伸脖子冲着人群說：“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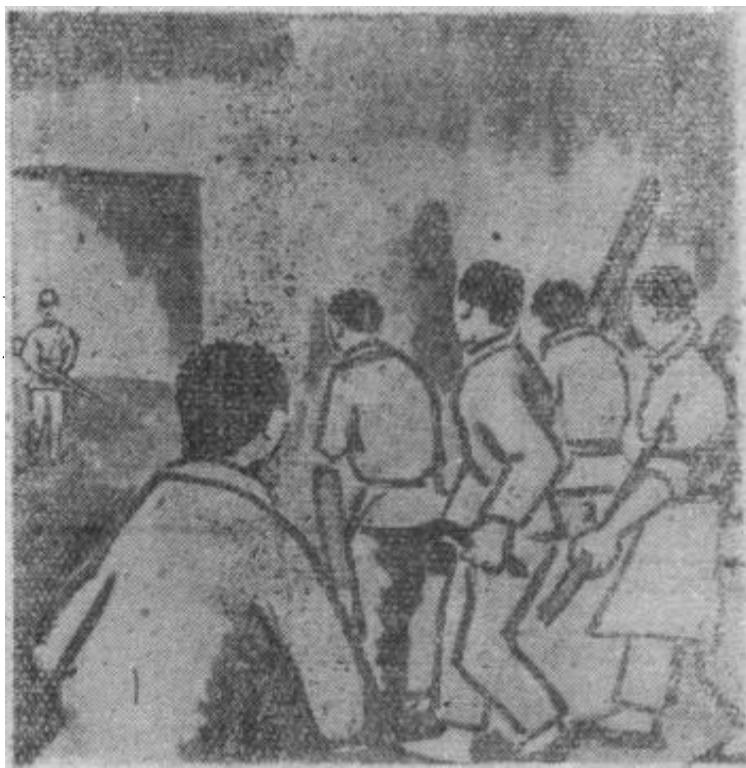


不离算了吧，鬧不出手去，鷄子碰的过碌碡嗎？”“給他开了①，給他开了！开了。”大伙举起手里的武器喊。几个把头一看势头不对，撒腿就跑到“仕上科”②去了，他們把工人罢工的消息彙报給日本，沒过三分鐘，保护日寇的伪警官汉奸王国祥手提着褲腰带，領着十几个光着脚、披散着头髮的伪警察来了。这些家伙剛往車間一探头，工人們就大声喊：“打××的！”喊声还没有落地，伪警察們撥头就窜回去了，一連气冲了三次，都被工人們打退了。这时候，王国祥急的跟热鍋上的螞蟻一样，害怕跟他的主子交代不了，于是，就用電話通知給日本兵营。一会，

① “开了”就是砸开腦袋。

② “仕上科”就是現在整理車間。負責驗布，成包的工序。

二、三十个鬼子端着明晃晃的槍刺子，带着二十多个伪警察，终于把工人队伍冲散了。王国祥一进来，就把站在工人队伍前边的侯光华搡到仕上科去了，跟着又逮了华玉泉、李桂珍、杜玉珍等几个工人。



那时候，在織布工人的嘴上挂着这样几句順口溜：“一进仕上科，不挨揍，就开除；不受罰，就挨罗①”。仕上科，就是当时設在織布車間里的衙門。侯光华被拥进仕上科，还没站稳，王国祥上去就是一陣嘴巴子，几下就把侯光华打晕倒了。这时候，日本鬼子抬起大皮靴子照着他的头上噼哧啪嚓的踢起来了。一刹，他的腦袋上就肿起来十来个核桃大的疙疸，伪副官王国祥这时兩手一卡腰，就象只瘋狗似的冲着侯光华喊：

“快給我說，你們为什么罢工？”

“为棒子面，”侯光华說。

① “挨罗”就是受辱罵的意思。

“好啊，你好大的胆子啊，皇軍正在馬上；实行五次强化治安，你敢領头鬧罢工？快說，是誰給你出的主意？”

“胆子大不大的，中國人就这么老实啊！沒別人出主意，就是我！”侯光華說。

“你好硬的嘴啊，來，給我打！”這時候，侯光華身上只覺着發燒，感覺不出疼來。正打着，王國祥用腳一踢他的腦袋問：“誰，快說！”

“沒別人，就是我姓侯的！”侯光華臉朝地說。

“到底你為什麼領頭罷工？”王國祥問。

“吃幾個爛土豆，黑夜織十二個鐘頭的布，白天還得去推轆軛馬、抬煤，你睜開眼看看，工人臉上還有血色嗎？一個對一個的全成了鬼啦，餓的直不起腰來，眼前冒金花，我們沒力氣干啦！”侯光華說。

王國祥問了個六够，什麼也沒問出來，再這樣延續下去，生怕他的主子不饒他，於是咬着牙，瞪着侯光華，狠狠地說：

“你他媽的活不了啦，來！”他冲着偽警察們喊，“把他架到前邊去，”①

這時候，工人队伍雖然散开了，但仍然堅持不开車，日本鬼子和偽警察們來到車間里，催着工人：

“快開車，快開車！”

“我們餓的肚腸子疼啊，一勁兒拉肚子，沒法開車！”

① “前邊”就是廠里設的刑房和監獄，靠近海河邊。

工人李汝琴等人說。

“巴嘎！”日本鬼子端着刺刀，象野兽一样叫喚，“不开車的，死了死了的有！”

这工夫有的工人捧着爛土豆、豆餅、黃面①走到这些家伙的跟前說：

“你們睜开眼看看，拿鼻子聞聞，吃这玩艺能干活嗎？”

“你們想吃什么？”有个日本人問。

“我們吃面！”工人們說。

“面，漿紗都不够，你們还想吃？”

“沒面就不开车！”大伙齐声說。

王国祥一看，工人再不开車，上司該說自己是廢物了，于是裝腔作勢地說：“你們先开车吧，糧食問題，我們回去研究研究去。”工人們还是不开，这时候把头刘宝禎就自己把車开开了。

正月里，天正冷，侯光华穿着一身破单褲单褂，被关在又湿又冷的小黑屋里，連口水也摸不着喝。敌人想把他活活的冻死、饿死。那想到三百多个工人一刻也没忘了他。第二天早晨也不知道誰，隔着門給他扔进来兩個大白面馒头，一个带棗的，一个带糖的，一会，又扔进来拿手綢包着的热騰騰剛出鍋的几个大土豆，咬一口直燙嘴，还有一次，有个姓王的同事提溜着一大蒲包子捧子面窩窩

① “黃面”是榨淨的棉花籽面。

头，隔着門縫遞进来，隨后說：“老侯，吃吧！死了也得吃頓飽飯呀！”在这个节骨眼上，侯光华虽然渾身成了爛年糕，疼得象刀子剜一样，可是他心里覺着格外痛快，他暗暗念叨：穷哥們真有个热乎勁啊，莫怪十八年前，李先生說过天下工人是一家呢！他們忘不了我。”他的斗争意志更坚强了。

在监狱里，他躺了三天，身上的伤疤剛有点好轉，日本主任小伊藤就把他提到刑房里过堂。兩個伪警察把他从监狱里抬进刑房来，一看，皮鞭子、压杠、涼水全摆好了。他一进门，小伊藤站起来，“叭！”一拍桌子說：

“侯，你为什么罢工的干活？”

“为吃棒子面！”侯光华說。

“不，你是共产党、八路軍的干活！”小伊藤又問。

侯光华一想，当年参加砸裕大的时候，“灰老鼠”^①的手槍队都打过，何在乎这些杠子、涼水呢。再說，跟这些小子們費吐沫也沒嘛用，頂头也不过是把我这一百多斤交給他們算啦。那一年裕大罢工，被手槍队打死的，掉在河里淹死的不多了嘛，人家不也为的是叫工人吃頓痛快饭嗎？想到这里，他使了使劲，抬起头来冲着小伊藤說：

“你說我是共产党，我就是共产党，你說我是八路軍，我就是八路軍！”

“噢！”小伊藤得意洋洋的理了理鬍子又問：

① “灰老鼠”是当时軍閥李景林的队伍，穿灰军装。

“你們的組織在那里，有多少人？”

“我不明白嘛叫組織，就是我一個人！”侯光華把牙一咬說。

“胡說！打！”跟着又是一頓嘴巴子。等侯光華醒過來，只見小伊藤一只腳踩着椅子，大聲地喊：

“快快地說，誰叫你干的？”

“再問也沒別人！”侯光華說。

“快說吧，再不老實說，你的命就沒啦！”王國祥在一旁幫腔說。

“我活不活沒關係，隨你們的便吧！”侯光華說。

這些家伙們審了整整的一個下午，也沒有撈着嘛，就退堂了。

侯光華被押到二月五日這天晚上七點鐘，日本和漢奸們沒有辦法，只好給他來了个開除出厂，從獄里釋放出來了。

侯光華被釋放的消息一傳出來，到他家來看望慰問的工人們天天不斷，大伙為了使自己的同事、兄弟不至于餓死，勒着褲腰帶，給他湊了80塊錢，妥善的安置好他的生活。雖然侯光華等人被開除出厂了，可是經過這場鬥爭，也把日本帝國主義者和漢奸們吓酥了骨頭，日本廠長左藤把他的部下“津寧班”的日本管理員倉元豬打了一頓嘴巴，倉元連吓帶痛，不幾天就死掉了。同時，他們不得不給每個工人增加了二十四斤糧子面，最後的勝利者還是工人。直到現在人們一提起這場鬥爭，目前還在棉紡五廠工作的侯

光华同志就說：“要不是在当年參加裕大紗厂大罢工的时候受到党的教育，要了命我也不敢弄这一手呵！”

(李子生 整理)

我們二十六个粗紗工人

姜汝為

一九四四年的春天，日本强盗更猖狂了。他們到处封锁，处处戒严，工人的生活越来越苦，每天吃的是苦辣棒子面、豆餅、山芋干、棉子面、野菜，把人吃的面黃肌瘦，那里有力气干活！不干又吃什么呢？在裕大紗厂工作那就更惨了，你不进厂工作連工房門都出不去，只好进厂給他們干活。为了生活，我只得黑夜白日的拼命干；白天在厂里工作，下工就到家里拿着一个罐子，买上一斤山芋干、半斤杂面，到新中山打夜去。困極了，走着都能睡着，日本人看見就是一顿毒打。就这样，也还是不能活下去。象我家一共七口人，六个人工作，可是今天吃了明天就沒有吃的，少干一天就得挨一天餓。唉，很难！我們不能再这样活下去。当时粗紗工人，人位不太多，只有二十六个車工，十几个小工子，可是非常團結，不管是誰有事大家都来帮忙。

有一个月关錢时，大家一看少一个截（少一个截就少

一天錢），大家都說：“又少了一個職，這若長了還不知怎樣算計我們呢，不行，咱們得找他們去！”當時我和黃棋安等四個人，找到前樓，樓上一個人也沒有。又跑去找副官王國祥。王國祥這人表面上和和氣氣，心裏很陰險，誰有事找他，他都滿臉陪笑，端茶點烟，你提什麼都好辦，他都應下，等你走後，他就變了心腸。譬如，他趕失業的工人，連人家屋里的家具都給扔到工房外面，根本不管人家死活！我們去找他，他不在。那天正是星期六晚上七点多鐘，我們想一定是吃飯去了，於是又找到飯廳。到了飯廳，站在窗外一看，只聽鬧鬧呼呼的，原來有好多日本人和幾個中國人正在大吃大喝。我們想在這時找他也沒啥好；不過大家一想我們連棒子面都吃不上，他們却整天大吃大喝，真是越看越生氣，越想越着急。黃棋安生氣地說：“走，不干了！”我說：“不干了，你八個不干又管什麼用呢？”黃棋安說：“那我們能不吃飯？”我說：“先別着急，回去跟大伙合計合計。”說着，我們回到又窄又小只能站幾個人的王耀忠家里。我推門進去一看，大家都在，有的坐在炕上，有的站在地下。他們問：“怎麼樣？”黃棋安說：“這氣沒法出，明天我歇了。”大家說：“若歇咱們都歇，別歇一個倆的。”我想，對，就這麼辦，便向大家說：“明天咱們全歇，廠里要找咱們再說。可是誰也不能說誰是領頭的。問咱，就說歇班趕巧了，叫咱們上班不難，我們得吃飽，餓着肚子怎麼干活？”大家說：“對，有不知道的告訴他，明天都到這來，時間是早晨六

点。”

第二天早晨六点十五分鐘，二十六个人一齐到了王耀忠家里。地方很小站不开，再說呆在房里也不好，怕会出别的問題。这时有的說过河玩，有的說上双喜（是現在棉紡五厂）。我說：“咱們到外面蹣去，也別走远了，他們要說咱別的，咱們就說在外面碰上的。”大家說：“对！”我們到了大埝，老苏跟小胖子說：“咱們为嘛在这受这个气？老家（文安）到处都是共产党、八路軍，打的日本鬼子无处躲无处藏，当兵的和当官的都是有罪同受，有福同享。咱們回家当八路去，那够多么好哇！”小胖子說：“对！咱們岁数又适当！”我說：“反正咱們什么也不怕，不行，就去当八路！”小胖子又說：“咱們要是有槍才好呢！”他指着倉庫的日本鬼子，“把他們都打死！”有的說东，有的說西，到了河边，我們在那里坐下，往河里拋砖头玩。忽然，摆渡过来了，从船上下来一个人，这人身穿青坎肩，露着里面襯衫的白祫袖，紡綢褲子，头戴馬辮草帽，手里推着自行车，走上来。他不是別人，正是双喜招工員蔣邦子。黃祺安說：“邦子，双喜用人嗎？我們都去！粗細紗都行。”邦子說：“眞的嗎，要去我負責，每人先給你們五个卷子，上班后每天是九个。”接着又小声說：“还有路（可以偷的意思），肥極了！”“好，咱們都去！”大家站起来就跟他走。邦子說：“你們合計合計，我还有事，头里走，到那你們找我就行。”說着他騎車就走了。我們也往回走。走到工房牆角，就听上面有人喊：“你們

快回来吧！工房都乱了，日本搜查你們了，再不来家，可就受不了啦。”听了后，我說：“咱不能回去。”大家又轉身奔小街。站那一看，警察背上大槍了，大家都楞了。我說：“走，怕什么！”到前大門，黃麻子（警察）胳膊一橫，說：“哥几个，回來別走了，进去吧！”手指大門口。我們只好进去。这时，警長小陳跑进工房找來王國祥。日本石田山倫，手里拿着手槍，后面跟着几个警察，另外兩個日本鬼子背着大槍，刺刀冒光，直奔我們过来。王國祥裝模做樣說：“兄弟們，这不开玩笑嗎？你們誰領的頭？你們这是罢工，这是犯法，有掉头之罪。說吧，誰是头？”我們誰也不回答，他又接着說：“有不合理的事，你跟兄弟我說，我替你們辦，若是不能解決，我王國祥的腦瓜子不要了，我領你們罢工。”劉文屏說：“第一、为什么少給我們一个截？第二、我們棒子面少，吃不飽怎么干活？第三、我們厂里工資太低，比別厂錢都少。”王國祥說：“不就这点事，你們先干活去，我保証一定三天給你們答复，工資一定增加，棒子面加二十斤，那天的截也給你們补上。还有事嗎？沒有事干活去吧。”当我们一进第一道門，就看見在第二道門處擁滿了人，他們是粗小工子、鋼絲工人、布場工人，見我們进厂了，他們都鼓掌欢迎我們，有的跑来抱住我們問怎么样，我們說他們答应長錢长棒子面了，大家听了都很高兴。

原来他們早就商量好了，王國祥不过裝了个好人而已。至于鬼子答应我們的要求，那主要是因為我們團結的

好，当时没有办法。事后，他们就采用了各种手段把我们几个人，分头开除，我就是在厕所吸烟被开除的。楊月桂、刘文屏、吳尊重等人是因下班后在鍋爐洗澡被开除的。我們从此又遭到失业。

“偷”

陈宝树 口述

别看我现在是紗場乙班的班主席，又是个共产党员，可是十几年以前，在黑暗的日子里，我陈宝树却过着牛馬不如的生活。

三十七年以前，我出生在文安县的一个村庄里，那时全家四口人：奶奶、父亲、母亲和我，一家子就靠一亩半坡地生活。文安地势不好，差不多年年闹水灾，一闹灾就没得吃。为了活着，父亲扛过河壩，当过“华工”。媽媽給闔人家当过老媽子。九岁那年，家里又添了一口人——一个少爷沒娘的小閨女，媽媽可憐她流离失所，宁肯自己少吃一口，把她收养了，当作童养媳。

連年水灾，在家乡越过越沒活路，听人說天津工厂多，穷人家无论大人小孩都可以混口吃的。父亲和媽媽信以为真，就把地卖了，带着一家老小来到天津。到了天津，父亲还到河壩上扛活，又托人介紹，把我和那小閨女送到宝成紗厂（现在的棉纺三厂）当学徒。那时当学徒，

整天挨打受氣，还不掙錢，父亲又只能养活自己。实指望上了工吃碗飯，沒料到生活更苦了。日子不多，奶奶就活活的餓死了，父亲跟着外地招工的走了。剩下媽媽守着一帮孩子（那时我又有了兩個弟弟），整天地哭奶奶、哭日子。有一次，媽媽忽然沒了，我到处去找，鬧半天她老人家在亂葬崗上哭我老去的奶奶哩。我过去拉着母亲的衣服說：“媽，咱走吧！兒子學徒養活不了你，討着要着也養活你！”第二天，我就不到宝成上工了，和一群小叫化子走遍了天津市去要飯。

可也不能总要饭呀，十二岁那年，我又到北洋紗厂去学徒。好不容易学会了接头，又受当头的剥削。比如，我看十九塊板（每塊板有八个錠子），可是拿十四塊板的工錢，那五塊板的錢被搖車的裝到自己腰包里去啦！那个年月，只得啞巴亏，要是把头惹翻了，更得吃苦头。尽管忍气吞声，也断不了事。有时，接头慢点，那个搖車的女把头就端着大碗凉水，照着我的腦袋澆，我剛要抬手擦，她又是毛棍把我的手打下去。咱穷也不能总受这个呀！赌气給他娘的摆了台。

我15岁那年，正是日本統治时期，我和一帮要饭的孩子到日本仓库里挑砖、打洋灰活。天下的老鴉一般黑，在这里除同样受工头的剥削，还挨日本人的揍。有一次，有三个穷哥們，实在餓不过了，偷了鬼子几塊餅干吃，日本人为追查这三个人，把我們打得死去活来。可大伙铁了心，認可挨揍，也不叫共患难的穷哥們遭难。晚上，我遍

体鳞伤，连爬带走
地回到家，妈妈见了，忍不住痛哭起

为了全家生活，转年妈妈也到裕大（现在棉纺三
厂）当挑夫，中山钢厂（现在天津钢厂）作了拔
丝工。虽然全家三口人上工，还总是
饥一顿饱一顿，有时就光吃拾来的爛菜帮子。
我就是这样整天当“苦力”，整天吃不饱饭。

二十一岁我上裕大紗厂鍋爐房抬煤去。每月才挣五十
五斤杂粮，这些杂粮除了山芋干、杂合面，就是四分之一
的老玉米面。妈妈由于饿伤再加上累，得了喘病，被厂方
开除了。家里的生活全靠我和我那老婆（我们在灶炕里拜
了个天地，就结婚了）维持。说起我那老婆来，真是个可
憐的好人儿。她从九岁开始，就在宝成紗厂上一小时的
年紀，天天站着于十二个鐘头的活儿，骨头嫩，是瘦了罗
圈腿，连走路都困难，每天妈妈和弟弟架着她去上班，到了
车间还得挨打受气。就这样，她总是把杂合面、老玉米
面留给妈妈弟弟吃，自己只吃山芋干。我心疼她，就省



杂合面饅饃給她吃。那时候，我一天抬十二小时的煤，一筐煤二百八十斤，兩個人一天抬三百多筐，你想想，得付出多大的劳动力啊！为了叫家里的人們吃得飽些，我干完十二个小时的累活，回到家，抄起扁担又到中山鋼厂抬煤、挑砖去。黑間白日地連軸轉，干着牛馬不如的累活，右肩上起了一个大包，又紅又肿，扁担一压，臙包里就流血流膿。

就这样，我沒歇过一天工，因为人一歇工，牙也得歇工。有一次，因为累，肚里又沒食，眼前一冒金星，就暈倒了。

常言道：“人急造反，狗急跳墙”，当牛当馬还閑着半挂腸子，还眼睜睜瞅着全家人忍飢挨餓，我可就豁出去了，我想：“要活下去，在这个年月傻干可不行，一定要‘偷’，对，‘偷’！狠狠地‘偷’他們！为什么他們能活我不能活？”于是就找和我一塊抬煤的胡廷琴去商量。那天，他們全家老小正捧着草籽（是一种野菜，用这种东西磨成的面粉沒粘性，發散，所以用手捧着吃）饅饃吃，看看炕上連个枕头也沒有，我可就說了：“老胡啊！咱倆找点（外快）吧！老这样，忍到多咱是头呀！”沒想到老胡也憋着勁要“偷”哩，沒費口舌，我們倆就成同伙了。

这天黑夜，我二人爬上六場的太平鐵梯，奔天窗衝下防空帘里子（防空帘是双層的，里層是紅色，外層是黑色），綑在棉袄上肩里，就越牆走了。过了兩天，我們留神一看，不知什么时候，防空帘又添上新的里子了。任何动静

也沒有，我們暗暗發笑，心說鬼子真孝順，又把肥肉送到咱們嘴頭上來啦！膽子大起來，我們索性拿起整塊的菜。

又是一天深夜，我倆把摘下來的防空席摺了兩摺，用紗錠帶子纏着，順着河沿大牆走。一慌張，“嘍喳”一声，連人帶布滾到河里去，水齊着脖子，河面還有一層薄冰，我二人不上不下的給卡在那兒了，一個勁打撲通，好不難受。好不容易我踩着老胡的肩膀爬上来，老胡把防空席投給我，我又把紗錠帶子遞到老胡手中，把他從河里系上來。我們手忙腳亂地把這些事情剛剛辦完，遠遠的來了巡邏的，我倆急忙跳到大牆里，用爐灰渣埋起防空席，就溜回家去了。轉天下班回家，我正躺在炕上睡覺，聽見工房弄當里紛紛傳說：“今天到廠里拾煤核兒的老婆兒和小孩兒們好運氣，在煤灰渣里撿了一大捆布，一人開了一塊！”我想：這也很好，老婆兒和小孩兒們的身上補釘羅補釘，淨露着肉，也應該閑件新褂子穿穿了。

說句迷信話，那時候，我二人真有點“賊星照命”，成天價滿腦袋瓜子里沒別的就是一個“偷”，漸漸的我們的眼界寬了，閱歷廣了，膽子更大了；由“偷”防空席改為“偷”紗，由“偷”單批紗改“偷”合股紗，小“偷”不解氣，就大“偷”；一麻袋一麻袋的合股紗往外扛，紗到了小販手里，錢到了我們手中，不光我們家里的人吃得飽了，還幫助了受苦受難的哥兒們。有个叫陳瑞的弟兄跟我一塊干活，他大哥得病死了，買不起棺材，當時人們都窮

得叮当乱响，往那儿借錢呀！我知道了这事，立刻給他送去五百塊錢，他拿这笔錢把喪事办了。

我們干得太露形了，把鬼子也真“偷”急了，就加紧防备起来。夜里，警崗由三个小时一換，改为一个小时一換；巡逻的人增多了，日本鬼子、他的爪牙王副官、陈巡長也都不断出来巡查。風声紧得很。但是为了吃饭，我們还得冒险，还得“偷”。

一天晚上，我們兩人又进厂了。剛走上半截楼梯，就听背后有人踩着地面沙沙响，我立刻把老胡一把拉在墙根隐蔽，不会儿这声音近了。我俩轻着脚步又往上走，剛走到楼梯頂，又从老远傳来“咔咔”的皮鞋声，不会儿，就从下面射来一道白光，我俩赶紧趴下，那道白光扭向窗户又轉向护厂的围墙。皮鞋声和白光往前移动，漸漸的听不真鞋声了。我叫老胡放哨，我先进去。窗户打开刚迈进一条腿，下面突然傳来一个很低的声音：“誰呀？誰呀？”我一听語音不是別人，正是伪警苗三，这人吃过我們的甜头，我放心了，低声回答：“是我呀！苗三。”

“哦！宝树，現在这么紧，你怎么还……？”他的話還沒說完，我赶紧說：“你快走吧，苗三！”他走开了，我这才和老胡鑽进大場，里面漆黑，点着带来的洋腊，用破罐头遮着火光，兩人爬着往前走。从窗外不时射进来一道一道的白光，当我背着裝滿紗的麻袋，从楼梯頂往下走时，这颗心哪，象有秤鉈壓着似的难受。这一夜，关口总算闖过去了。

可是災禍終於臨头了。

一天，天還沒亮，我剛睡醒，忽然從外面闖進來幾個偽警，不容分說，把我從被窩里拉出來。我一想：准是犯案了！他們連拉帶架地把我弄到大門口一間小屋裏。王副官氣汹汹地向我說：“好小子！膽子倒不小，你把偷的紗賣哪兒啦？”我說：“你問的是嘛？我不知道！”

“好！你還鐵嘴銅牙呢！”他那副鬼臉顯得更凶惡，馬上叫他手下的弟兄打我，幾個偽警擁上來，照着我的臉狠打，打得我的耳朵嗡嗡响，眼前冒金星，我心裏說：“好歹毒的家伙們，打吧，大爺豁出這條命跟你們拚啦！”幾個偽警打人累得出了汗，便脫下棉祆接着打。這時，王副官又走來問我：“你跟誰合伙偷的？快說！”我的嘴張得張不開了，只好搖搖頭回答他：“不知道！”他一怒立刻告訴一個偽警：“去，把收買小貨的楊老头帶來！”我一听才明白了，完了！一定是這個糟老头壞的事，每次賣給他紗，他總說：“兄弟，放心吧！刀子擋在胸口上我也不說出你來。”可是事情到底叫他敗露了。不大會兒，楊老头被帶來了。王副官問我：“認識他嗎？”我搖搖頭，頭還沒搖定，“啪！啪！”又是一頓大嘴巴子，楊老头哭喪着臉向我哀求：“兄弟，你就招了吧！要不咱們都完了！”我慢慢睜開眼皮一看，不光是楊老头站在面前，他身旁還擺着一堆合股紗，這回是有人証又有物証。偽警們拉着我到大河沿花窖一間小屋門前。日本人、偽警察們都圍着我，又是一陣毒打；日本人打累了，偽警察打，打得我兩

只眼晃晃忽忽地光看見人影，認不出都是誰來。

日本厂长左藤看了看我，兩眼瞪得象包子一样大，呲着牙对王副官說：“你們統統的打他三天三夜！”他这一放屁不要紧，日本人和伪警察更是凶上加凶，把我打得死去活来。

晚上，我迷迷忽忽地，不知道多咱老胡也被他們逮來啦。他們把我們倆用一根繩子吊在厂長室前面的一棵棗樹上，脚后跟悬在地下，要是累了，想动弹一点都不行。深夜，涼風還很颼臉，臉上和身上的伤口，被寒風吹得殺疼。忽然从远处走來兩三個人影。我渾身一陣顫抖，怕又是來人打我們。等他們走近一看，原来是和我們一塊干活的弟兄們。他們有的拿來棉袄給我們披上，有的喂我們水和吃的，我瞅着他們的臉，心里也暖和多啦；伤口也不那麼殺疼啦。就這樣子，白天被偽警們架走，毒打；晚上，弟兄們就來照顧我們。

三天三夜熬过去了。

我和我的老婆都被開除出廠了。老婆的兩只眼哭得象桃兒一樣，和我一塊走出工廠。這天黃昏，鬼子和偽警把我的全家老小都從工房里趕出來。全家人和破破爛爛的東西都堆在楊莊子渡口，天色昏暗，眼前一片黑幽幽的海河水，真是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靈，那兒是我們的容身之處啊！媽媽哭哭啼啼地說：“寶樹！咱們算完嘍，要家沒家，要事由兒沒事由兒，干脆都投河吧！”媽媽的話，多么叫人扎心啊。可是我說：“媽！咱們不能死！一定要熬

着，咱們熬得出来！”說完，我就在堤道上，用炕席、破棉被搭了一个窩鋪，一家子先在那里藏身。到后来，我才知道卖紗的錢，被一个伪警长一古腦儿从媽媽手中詐走了。

我們一家子蹲在那个窄小阴暗的窩鋪里，談論着将来怎么走好运，不受鞭打，不再过飢餓的生活。可是在那黑暗的日子里，我作夢也沒想到，象我这样一个日伪时期做牛做馬的工人，解放后当了工厂的主人，过着这样丰衣足食的生活。

(許風岩整理、夏 壁修改)

八間房

劉振華、張文升等 口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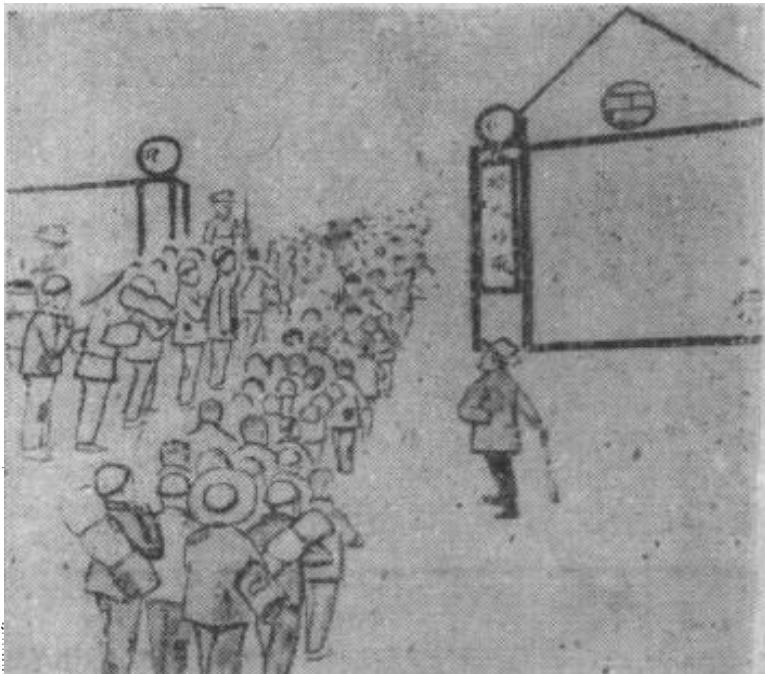
現在咱們工廠大門迎面就是俱樂部。這裡每天都要聚集着很多工人，來來往往出入不停，尤其是每到傍晚，燈光閃閃，青年人伴隨着音樂，伴隨着鼓點跳舞的脚步聲，更使人感到興奮和愉快。

可是這一塊地面的歷史，有些人並不知道，有些人雖然知道也逐漸淡忘了。

早在三十多年前，這裡是聞名全廠的人間地獄——八間房。工人曾經這樣形容過它：

徒工生活苦難言，
三尺皮鞭身上纏，
病倒床上无人管，
八間房里入黃泉。

裕大紗廠（天津國棉三廠前身），建立在1921年。這是大奸王克敏依仗着帝國主義和封設勢力建立起來的。



裕大紗廠建立后，王克敏为了更多榨取劳动人民血汗，就派亲信王相林到河南、河北和北京等地，大批招收徒工（童工）。

王相林是个細高个、長方臉，还留着兩撇小鬍，在

嘴巴底下，还有一撮鬍子尾巴，手里总是拿着一根文明棍，棍子前头，有一个鐵疙疸头，讓人看了發森。

他为了討好官僚資本家，在招工时，大量宣揚說：“到了裕大紗廠，每天吃大米洋面，屋里有人侍候着，誰要来先給三塊錢，管吃管穿……。”于是日子不多，就先后招来了八百多名徒工。

在那个年月里，农民家里沒吃沒穿，加上連年鬧水灾和地主的殘酷剥削，为了吃碗飽飯，他們就把心爱的孩子送到这里。临去时孩子哭着舍不得爹娘，爹娘舍不得孩子，爹娘再三地嘱咐孩子說：“去吧，到那儿有吃的，在家还得挨餓，学滿徒早点回来……”可是他們不知道，这一去可就再也回不来了。

孩子进厂以后，就交給了“朱胖子”。

朱胖子是管理室大头，五十多岁，长着一双賊眼，手

里也拿着一根上粗下細帶有銅疣疽頭的棍子。閑着的時候，他坐在院子里瞅着孩子們，手里還拿着一張彈弓，看誰不順眼，就用彈子給誰一下。

徒工進廠後，先得填寫一張“志願書”，實際就是賣身契。這裡給孩子們規定了各種各樣的條件，來限制孩子們的自由，然後朱胖子過來，把賊眼一瞪，一個一個的把孩子們的衣服換下來，給換上裕大紗廠特製的衣服。這種衣裳，是用破布頭縫成的，上下一身灰，全身長不過三尺。每一套，大小都一樣，有的穿着大，有的穿着小，長短不一，象個八怪似的。儘管這樣，可是誰敢言語呢。

這些徒工，每天要工作十二小時以上，臨上工前先排好隊，前後有工頭押着，朱胖子跟在後面，上工送去，下工再押送回來，象犯人一樣的看着他們。孩子們工作累，疲勞貪睡，早晨天還不亮，汽笛就象鬼叫似的响着，孩子們常常聽不見。這時朱胖子偷偷走進來，不言不語，照着孩子身上，就是一棍子，然後再問：“你們願吃‘片湯’（板子）、還是願吃‘面条’（棍子）？”話剛落地，朱胖子把手一揮，二个小工頭，上去就把孩子拖下來，一邊一個，將孩子小胳膊一擰，朱胖子過來就是四十“面条”（棍子）。打的孩子媽呀、媽呀直叫，完了以後，就讓跪在磚頭上，等到响過第三遍笛，还得去上工。

誰不是肉長的，該死的工頭，就这样一天一天的折磨着十几岁的孩子們，孩子們怎么能受得了呢。他們每天想着自己的家，想着慈愛的母亲，又害怕朱胖子，哭的兩個

小眼紅肿紅肿的，還不敢讓朱胖子看見。在一天的夜里，外面靜悄悄的，劉小寶哭着對另一個孩子說：“咱們跑吧！”可是又想到圍牆這麼高怎麼辦呢？想來想去那個孩子說：“唉，你踏我肩膀好嗎？”劉小寶看了看那個孩子說：“那你呢？”“我再想辦法，快點，一会儿朱胖子來啦。”說着說着，二個孩子摸到圍牆根，劉小寶就踏着另一個孩子的肩膀逃跑了。



劉小寶跑出來以後，東溜西逛的流浪着，沒家可歸，走到東站左右，被巡捕看見，他們認識穿灰衣服的就是裕大徒工，馬上就抓着送了回來。朱胖子接過來以後，就給吊在樹上，上去就是四十板子，打的他死去活來。

孩子被打的倒下了。几天不能上飯團吃飯，同屋伙伴偷着替他拿塊餈餈，誰想一下讓朱胖子看見了。他把孩子抓過來，瞪着賊眼說：

“好呀，你是連吃帶偷，今天我讓你吃個够！”說完以後，沒等孩子回話，就讓兩個工頭一個按着腦袋，一個按着腿，上去就是一頓毒打，打的孩子爹媽亂叫。狠心的

朱胖子：从此便在吃饭以后建立了搜腰制度。

孩子們在這裡，一年一年不准出門。他們連廠里大門朝那面开也不知道。一早披着天空的星星被押送出去，晚上鐵的月亮再押回來，到了工房以後，再也不准出來。屋子裡只有七、八尺長，三、四尺寬，整年整年見不着太陽，兩個屋子給一盞燈，放在牆壁的窟窿里，屋裡那能看見點光？墙上又潮的流着水珠，孩子們一天天累的經不過氣來，貼着枕头就睡着啦，有尿就尿在被窩里，日子長了，每個人身上都長着疥。在那個時候，工頭是不管孩子們死活的。疥，慢慢地惡化成膿瘡，滿身是白泡，痒的厉害，一擦就流着黃水，黃水流到那裡，就爛到那裡，漸漸的孩子們就一個一個的病倒下了。

孩子一得病，朱胖子可就火啦，瞪着兩個紅眼，拿着手棍走進來，一邊用手棍敲着孩子，一邊問：“能干活嗎？不能干活別在這躺着，占着好人的地方，給我進‘八間房’！”

“八間房”在工廠右边，緊連着圍牆，東西各四間，院子裏面積很小，長滿野草，房子裡仅有几塊破板子搭的床，再什麼也沒有了。在這裡每天都要抬出幾個死孩子。

十一歲進廠的張文升和他表弟，每天提心吊胆地躲着朱胖子。他倆經常說：“媽呀，可別得病，要不進了八間房，就活不了啦！”結果也還是沒有逃出病魔。有一次，張文升的表弟得了濃瘡，隨後就把他也染上了。二個人躺在潮濕的工房裡，一天一天得不到東西吃，怕着怕着朱胖子

就带人进来了。吓的他俩象傻了一样，说不出话来，直打哆嗦。这时就听朱胖子说：“看样子一半天干不了活，干脆，找人送八间房算啦！”他刚说完，二个人上来就想搭，吓的张文升苦苦哀求让多留二天，朱胖子象没听见一样，瞪着眼。这时站在张文升旁边的班长一边指着张文升，一边插嘴说：“朱先生，这个孩子没爹没娘，病也比较轻点，让他留两天看看吧！”朱胖子这时答应让张文升暂时留下，随手就叫人把他表弟拖下来，他表弟挣扎着说：“朱先生，我还能活，别……送啦……行行……好吧。”可是工头连理也没理，张文升的心象刀扎了似的，含着眼泪望着表弟说：“你先去吧，我用不了几天也会来的……。”就这样张文升眼看着活生生的表弟，被人搭进了八间房。临出門时，朱胖子还喊：“把門鎖上，别讓狗吃啦。”

第二天，朱胖子和王相林从管理室出来，每个人都拿着疙疸棍子，一边走着一边喊王文書：“老王，那里有个死人，你们埋了去。”接着王相林说：“快去，每人五毛，我拿钱去。”

扫地工王文書，那时才十七、八岁，跟着姚振肃和姚振汉一起干活。他一听又要上八间房搭人，吓得说不出话来，可是为了吃饭又不能不去，只得硬着头皮和姚振肃姚振汉走进八间房。到里边一看，四个鬼畜什么也没有，只有一个光溜溜的孩子尸体，停在破板子上，那个孩子瘦的骷髅似的，瞪着两个大眼，满身是蛤蟆皮似的大疙疸，直挺挺地躺在那里。王文書奇怪地问：“姚大爷，怎么连衣裳

都不給穿？”姚振肅看了看王文書說：“還給他們衣服穿，給個飽吃就算不錯。”

“咱們得找點東西給蓋一蓋呀，”姚振漢一邊說着，一邊走過去。

“對，我去找點去。”王文書說完，就向外邊走去，不一会儿，拿來一些破布片、碎紙和一個木匣子，進門就說：

“你看，這就是朱胖子讓拿來的。”

“这么小，能裝下去嗎？”姚振漢看着木匣子氣憤地說。

“裝不下，朱胖子說讓把腳給掌過來裝。”王文書一邊答着，一邊把破布片和碎紙遞給姚振漢。姚振肅和姚振漢一看也沒有办法，知道說也沒用，只好一邊包着一邊裝，姚振肅包到最后一塊布滴了兩滴眼淚說：

“咱們老輩也缺德，要不还能干这活！”

“我看還有德，咱們還給這孩子包一包，等朱胖子死了，叫他包也包不上。”姚振漢一邊說着一邊把孩子的尸体按在匣子里。王文書听了姚振汉的話，好象解了氣，紧跟上了一句：“咱們也算作了有德的事，別說厂里還給五毛，就是不給，咱也得干。”

“給五毛？還不知王相林那小子吃多少呢！”他們一邊罵着一邊把孩子的尸骨送进了“艺徒坟地。”

“艺徒坟地”是一片荒野，距离厂子不远，这里每天都要埋葬无数个孩子的尸体，有的是用匣子裝着，有的就用

席一卷，刨上炕埋上就算了。八百多个徒工，不到三年就这样被折磨死了五百多。

誰家沒有父母？誰家父母不心疼自己的儿女？这些孩子們的母親，一天天一年年地盼着孩子，眼泡都哭肿啦，也見不到音信。正如老工人們形容的：

孩子在外媽在家，
孩子哭媽媽想他，
走进裕大三年整，
母子永遠分了家。

为了看一眼孩子，他們的媽媽有的卖了东西，有的忍受着地主的高利貸，爬山越嶺一步一步来到了天津裕大紗廠，一心想看看孩子。誰知經過三詢六問，王相林才走出来給了一句：“走吧，你們孩子得病死了！”孩子們的母親一听，心象刀扎了似的，在那个年月里，劳动人民到那儿訴冤？到哪儿訴苦？只有默默地去到孩子的坟头痛哭一場……。

解放以后，“艺徒坟地”和“八間房”，也隨着旧社會的灭亡一去不复返了。艺徒坟地已經变成了第二工人文化宮；八間房变成了我們的俱乐部。这里再也听不見孩子們的哭声，相反的換來了欢乐和愉快。但是，我們也永远不会忘記踏在脚下的孩子們的尸骨。

（王永春 整理）

我十一岁上工

刘德和

我十一岁那年的秋天，随着招工員蔣羅鍋，走进了黑暗无光的裕大紗厂的大門。因为家里事前給蔣羅鍋送过礼，驗工員并没有怎么难为我，开口就問我姓什么，叫什么？多大岁数？住在那，家里都有什么人？但我心里还是扑腾着，嗓音有点沙哑的——作了回答。而后一个40来岁大个子山东人，讓我站在立尺上，量我的身高，我真急了，怕嫌我长的个矮，我心里思量着，眼瞅着量我的大个子，我的脚底暗地使劲，我翘起了脚后跟，身子、脖子使劲地往上挺着，再加上我在家已垫好在鞋底的破棉花，把自己身子拉长了估計高出五、六寸来。听那山东口音的大个子往里边說：身高4.5尺，我心里真暗乐。又讓我站在磅秤上过我的体重，我恨从家里来时，家里沒有饽饽吃饱肚子算点重量，我站在磅秤上便使劲地往下压，想压重秤盤，但是我身子离开地已使不上劲了。但又听那大个子往里說：体重72磅。后来讓我看着墙上挂着的考查眼睛的視

力圖，只試了我一只眼，又听那人往里邊說：視力0.9。這一番檢查，把我緊張得汗順着後背直往下流。最後招工員拍着我的肩膀說：“這次行了！進廠後好好的干活。”我答應：“是，謝謝您。”那個山東口音的大個子向我帶有教育的口氣說：“我領你進廠，見了大頭們、日本先生們要鞠躬，干活時要老老實實地干！”我答應：“是。”他帶着我走進機器轟隆隆響的細紗車間，別人說什麼我都聽不見了，象是傻人一樣。在細紗站着等了一回，從西邊來了一個象狗熊的大高個，戴着綠色的“三道”帽子，穿着洋服，臉上嵌着兩只象牛蛋子一样的大眼，小肚子往外凸有半尺多高，兩只手往後背着。要是三歲的小孩子乍看見非得吓哭了不可。我總算大几岁，沒有被吓哭，但心里也確實有點害怕他。帶我來的那个人，給我介紹說：“這是王大頭王先生。”我沒有聽清楚他的話，也忘記了給大頭鞠躬。那大頭發起脾氣來了，便對帶我來的那个人說：“你給我送這樣的傻人來干嘛？”帶我來的那个人急了，低頭對我說：“你怎么忘啦？你真是記吃不記事的東西！快給王大頭鞠躬吧！”他隨手按了我頭一下，我給王大頭鞠了躬。帶我來的那大個子把我交給王大頭，回頭就走了。現在我唯一認識的就是這怪家伙了。王大頭交給我一把扫地的刷子，用手指了下說：“你就管這一塊地，要扫的淨，要不就不要你！”我點了点头答應一声是。就这样，我當牛做馬的童工時代便開始了。

我抱着王大頭交給我的扫地刷子干了約有兩個來月。

这两个来月的昼夜折磨，使我变成了小老头，失去了童年脸上的光彩，两个眼珠子凹进眼眶，腮帮子也凹进去了，面黄肌瘦，夜晚像电灯一样象死人一样，身上连一点劲都没有。吃上窝头，便强打着比起扫地更累的活“推管”。王大头把我交给一个高个子有点驼背外号叫“难揍”的搖把（落紗长），他交给我一个三个轱辘的推管小車，告诉我：“你管这一塊！”我点了点头，推着小車跟着推紗工去楼下收管去了。合絲的紗管都是用筐盛着，由于我个子矮小和吃不饱肚子身上没有劲，搬不动一整个紗管，只好一排一排地往車里头放，裝滿車推到楼上，再往細紗的管斗内摆。因为車高，我个矮，每逢到車底时我的手够不着車底的紗管，为了挂車底下的紗管，我要肚子压在車帮上伸手去够，一不小心常把头碰在車帮上，碰个大包或碰破流血。就这样也避免不了王大头和搖把“难揍”的拳打、脚踢。

我记得有一次上班，我实在太累了，就和一个叫小錢的扫地工更换了工作，后被王大头知道了，他找着我不问青红皂白，上来就是一个大耳光子，底下跟着就是一脚，打完了以后问我：“你是干什么的？这是工厂！不是在你们家，你要不愿意干你就家走吧！”我忍受着疼痛，含着眼泪，压住心里的愤怒，央求他道：“王先生留下我吧。”但是我说什么也不愿意了。只好眼里含着泪水，拿着被吓除的条子，走出了厂门口。回家后见了亲人，心里一直放声哭出来了。我哭着把厂里的经过告诉了母亲，我的母亲

又是疼儿又是顧全家里的生活，帶有責备的口气說了我几句。但是为了一家人的生活，还得忍气吞声地去托人說情，給王大头送礼。就这样过了兩天我又回到細紗上工了。

这次上工后仍是干摆管的活，但是王大头对我更加刻薄了，他在我的身上吃慣了开除送礼的甜头，由于精神上的压力和干活的劳累，再加上生活上的困难，我的身体更加干瘦起来，同时得了严重的胃病，每逢上夜班吃不下从家帶去的窝头咸萝卜，但是肚子餓的慌，还是用白开水送下去，到过半夜时嘴里往外流酸水。自己也沒有錢治病，厂里更不用提了。日子长了我的身体真是骨瘦如柴，每天听到上班的汽笛响，特別是夜班，吓的我就趴 在炕上大哭，真比进屠宰場还害怕。

每天上工以后，不知那兒不順大头或小头的眼，不是拳打就是脚踢。这是当时童工的家常便飯。我记得夏季的一个夜班，我去楼下合絲（工序的名称）推管，到那一看紗管沒有下来，又看四周沒有日本人和大头們，于是便手拉了一筐紗坐在那兒等着，因为累和餓不多时就睡着了，并且做起吃饱肚子不受气，和早晨背着書包上学校念書的美梦来。突然一只沉重的脚落在我后背上，美梦被脚踹散了。我急忙起来一看是王大头，吓的我魂不附体。我连忙弯下腰把紗管倒在車里头，王大头看我这样更急了，“叭”的一声一大巴掌落在我的臉上。我的耳朵里响起了嗡嗡的叫声，我用手擦了擦眼泪，睁开眼往車內一看，才知道不

是紗管而是管紗。我急忙往外收，但是王大头的嘴和手也沒沒閑着，嘴里罵着，手照着我的后背象擂鼓一样一連就是几下子，当我把紗收出來以后，王大头的食指又落在我腦門子上，戳了几下說：“你他媽这孩子真混蛋，你不知道干什么來的嗎？要睡覺，家里去睡！”我只好含着眼泪忍着哭声，裝滿了一車紗管，推到樓上，當我到樓上時，那個外号叫“雞撲”的搖把等的急紅了眼，不問青紅皂白地奔着我的腰部就是一脚，把我連人帶車踢在南墙上，我的臉和半邊身子被碰破流出了鮮紅的血。我真急了，俗語說：“人急了上房，狗急了跳牆！”心里想我跟他拼了！我照着他冲去，揚手抓住了他的腳部，使劲地拉，而他的掌头就在我后心叭叭的亂打，我究竟是人小力薄，讓他這頓拳頭打的趴在地上。后来被我們共患難的大姐們給說情，才不打我了。在旧社会的工人，特別是我們那一代的童工，身受的压迫真是說不尽，寫不完。

那时候，童工不光要受头們的欺負，“大魚吃小魚，小魚吃蝦米。”內孩子也常常欺負小孩子。

我記得靠着茅房的化面，有一个小伙子，比我們大九岁，胖胖的，圓圓臉，胳膊腿很粗，腰里扎着“腰帶觀”，說着滿口的天津話，他并沒有靠山，仗着身強力壯，把我們都唬住了，對我們說話就象軍隊發命令一样，誰敢道半个不字，就是一陣拳打腳踢。可是他在那些大、小孩子的面前，也是跟我們一樣受氣。

那时我們誰拾着女工丟的梳子或別人掉的錢，都得如

數地交給他，否則他就打你一頓，這樣日子長了，他就給我們立下了一項規矩：不管誰拾到什麼，都得歸他。

有一天，胖子拾到半截鋼鋸條，便到修理場磨出了刀刃，然后再用石头磨快，用紗拈了根繩子纏好了刀把，象是美羅卜的刀子一樣，他跟我們說：“我這刀子飛快，可以給你們剃頭，准保不疼。”當時叫我和小黃等三個人：

“走，咱到茅房試試去！”我們問：“你会剃嗎？”他說：

“不會剃咱學呀！”我們跟他到了茅房，他拉着我的胳膊說：“先給你剃！”我因為沒嘗過他剃頭疼的滋味，心里並不害怕。胖子把茅房的水龙头开开，給我来了个凉水澆头，洗完以后，他脚蹬着洋灰台，讓我攢着趴在他的大腿上，他的左手拤住我的头皮，右手上去就是一刀子，这一刀子下去鋸鋸拉拉地剃下一条子头发来，疼的我直出汗，可是胖子哈哈地大乐起来。在旁边站着的小黃他們還捧胖子說：“胖子，真有兩下子！”胖子同意地問我：“不太疼吧？”我咬着牙回答：“不太疼，就是有点热燒火燎的。”胖子就这样按着我的腦袋一刀子一刀子地剃，下班前总算把腦袋剃完了，又用水給我冲，這一冲可真够我嗆，疼的鑽心。我讓小黃給我看，小黃數了數說：“才拉了四五个口子。”胖子在旁边說：“那沒有關係，過几天就好啦！”這一天只給我一個人剃的。从此，胖子上了剃頭的癮，第二天，到快要下班完活時，又把小黃他們叫去剃了。開始時他一天只能剃一個，沒有一個星期的工夫，胖子的剃頭手艺練熟了，把我們的頭也差不多都給剃完。

了，再剃就得从头来了。

我真尝够了他給剃头的苦头，但是胖子癟头正大，你不願剃，他就打你，我也不敢說不剃，只好硬着头皮讓他剃那沒有長出來的頭髮。在他最火熱的時候，我們一個星期差不多要剃兩次頭。

直到胖子這發飄過去，我們的腦袋才算熬出來了。

小 妮 子

赵立元 口述

一九三九年我进裕大紗厂做工，晚上还得到新中山鉄厂去抬煤，白天黑夜拼死挨活地干，赚来的錢还是养活不了一家人，过着半飢半飽的日子。

我那大閨女叫小妮子，生来就叫人喜爱，天真、活泼，又知道过日子，說話做事和大人一样，要是生在有錢的人家里，早就上学了，可惜她生下来就和我挨餓，八九岁时，她就到漫洼拾野菜子磨面子吃，还总背着我到处去驗工，因年岁小工厂都不要她。

十二岁那年，她在裕大紗厂驗上工了。到了家，高兴的和她媽說：“媽！我驗上工了，明天就給您賺錢來！”她媽看到小妮子这么喜欢，眼泪都落了下来，讓这么小的孩子去干活，作媽的誰忍心呀，可又有什么办法，一家人要吃啊，只得把孩子摟到怀里囑咐說：“到厂里干活要象在家一样的勤謹，听当头的話。”小妮子沒看出媽媽的心事，天真的回答說：“媽！您放心吧，我一定好好的干。”

我下班回家听说小妮子要上工了，心里有说不出来的难过，一个作爹的连孩子都养不起；孩子的身子骨又不结实，进了纱厂可够瞧，不叫日本人打坏，也得累坏了，不叫去吧，也得和我饿死，只有忍着心疼叫她去。第二天就和我一起进厂了。

小妮子这聪明的孩子，到了细纱学接头，不到三个月完全学会了看车。这么小的孩子，一天要干上十二个鐘头的活，吃不饱，又累，上夜班困的抬不起头来，当时的机器又不好用，总是开大花，要是叫当头的看見，就是一顿毒打，孩子连厕所都不敢去。日子长了，小妮子变的和以前不一样了，瘦的光剩了一身骨头架子，也不爱說話，终于积累下一身病。给孩子治吧，吃还吃不上，那来的錢治病呢！病一天比一天重，她终于病倒在炕上起不来了。看到孩子成了这样，我的心象是刀割一样疼。

急的我没有办法，只好去找当头的大老崔要包工活作，好多赚两个錢，给孩子治病。我向大老崔說：“崔先生！給点包工活作吧，给孩子治病。”他横眉瞪眼地说：“要干有利的，利少的就不干了，那就家去干吧！”我当时急的要命，心里的怒火按不住了，咬了咬牙說：“好，不干了！我告退。”轉身就出厂了。

到了家，坐在炕上，一句话也說不出，想呀，真的不干谁后怎么办，大老崔撵工房，住那去呢？小妮子的病……当时心乱成了一团。小妮子看出我的臉色有点不对头，就問我：“爸爸！您怎么啦！”我说：“不干了！”

听见这句话，她可急了，勉强地从炕上爬起来，抱住了我说：“爸！您能看着亲生的闺女病死，全家人饿死吗？”这时我什么也说不出来，好象谁在抓我的五臟，眼泪哗啦地流下来，小妮子很费力地叹了口气又说：“全家都指望您……”她说不出来了，她含着眼泪更亲切地叫了一声：

“爸爸！忍着干吧！”我听到孩子的这一番话，全身直打哆嗦，扶着她说：“孩子躺下吧！我干去！”

看见了大老崔我说：“崔先生，我叫孩子的病愁坏了，和您顶起嘴来啦，往后您给嘛活我干嘛活。”他冷笑了一声说：“还得找我姓崔的来哩。”就这样我又留下了，只好忍着干，那时那有心踏踏实实地干活，人在厂里，心早就飞到小妮子的病上去了，恐怕出了意外；又想孩子不如死了干净，省得和我活受罪。

孩子被病折磨得昏迷不醒了，脸色难看得象香灰。我到家，看见她妈守着孩子发愣，我看着孩子要断气，但当时半点主意也没有。我叫了一声：“小妮子！”她睁开了眼睛看了看我，嘴唇动了动，把眼又闭上了，这时我把她抱在怀里，摇她喊她，她喘气都费劲，嗓子呼噜呼噜的响，她强打着精神睁开了眼皮，抓住了妈妈的手，上气不接下气的挤出了几个字说：“爸——媽——我不好受，你们救救我……”闭上眼歇了会又说：“爸——您要把弟弟妹妹拉扯大……我……”说着慢慢地闭上了眼睛，眼角上流出了最后的两滴眼泪，紧抓着妈妈的小手慢慢地松开了。我流着泪想：苦命的孩子，十几年总也没得过一天好

日子，連餓帶累的給折磨死，作爹的沒尽到責任，实在对不过孩子呀，给孩子买个匣子吧，又沒有錢，总不能用席卷走，只好去找日本人討个木箱子吧。进了厂找到了管帳的許先生，又煩請了很多工友們，說明了來由，他們就去找日本人当头的森山求个裝机器的箱皮，森山很不耐煩地說：“好的好的，給他个小小的！”我一看太小，便向他哀求說：“森先生！孩子大，箱子小下不去，請您給換个大的吧！”森山帶着凶氣比划着大腿說：“什么大大的，嘎嘎嘎就下去了！”這句話把我的肚子都要氣爆了，孩子死的够委曲的了，还叫把大腿割下去，世上的人有誰能忍心說呢，日本人就这样說出來。当时我恨不得咬他兩口，罵他一頓，才解恨哩。又經許先生和工友們向森山說了好多好話，他回头走开了，这时工友們就給拿了个大箱皮。

箱子拿到家把这苦命的孩子很窩囊地放了下去，全家人哭着送到坟地。

以后的生活一天不如一天，一时不如一时，半年的工夫就死去四个孩子。唉呀，我不能說了，說也說不下去了！

(王森林 整理)

妹 妹 的 死

陈玉兰 口述

一九三九年，文安洼闹大水。爸爸妈妈带着我和妹妹逃难来到天津，住在我叔叔家里。住是有安身之地啦，可是得吃呀。我叔叔家里也是吃这顿没那顿，那能养得起我们全家呢！为了养活一家人，我便和妹妹玉梅去双喜纱厂上班（现在的棉纺五厂）。上班那年我十三岁，妹妹才是个十一岁的孩子。进厂后我在台丝接头，妹妹在细纱看车。小妹妹一上班就干大人活，还天天挨打，在那干了两年就不干了，又到宝成（本厂）来上班。

到宝成后，还是在细纱看车，当头的是一个尖嘴猴腮，长着一对三角眼的丧门神——李加和。有钱、有势，经常给他送礼的人，到厕所睡大觉去他都不管，专找穷人撒气。有一次我妹妹上早班，日本鬼子和白蜡们从她车间走，看见我妹妹开花了，小日本瞪着夜猫眼上去就乱踢一通。妹妹疼的象刀割，眼泪象泉水般的涌出来，但是连摸都不敢摸，只好忍着难忍的疼痛，咬着牙接头。李加和为

了在日本人面前买好，棍子象雨点似的没头没脑的又落在我妹妹的身上。更难忍的是一天十二个小时的工作，早晨五点半上班，到晚上六点半也回不了家。在加上每天上班，李加和都派我妹妹去看最难纺的车，所以天天开花，天天挨打。”日久天长把个天真活泼的蹦跳的孩子，折磨成一个面黄肌瘦沉默不语的老太婆啦，妹妹有病也不敢歇班，因为一歇班就会被工厂开除。那时的工厂就是人间地狱，十几岁的妹妹受不住那样的折磨，所以就怕上班的笛响，越怕上班，越觉得过得快，无情的笛呜呜的响起来了，随着笛声是一片哭声。孩子是媽身上的肉，孩子哭，当媽的心象刀割一样。我媽只好忍着泪劝我妹妹说：“孩子去吧，天养着！”就再也说不下去了，双手紧紧地抱住我妹妹，娘俩痛哭。小妹妹泣不成声的哭着说：“我天天挨嘴巴子、棍子，天天卖命去，我不去呀！”媽媽听了这一番话，泪珠一串串地掉在妹妹的脸上。妹妹疼媽媽就不再说下去啦，起身抽抽噎噎的去上班。妹妹走后我媽真的就要找当头的說理去，刚迈门坎又退了回来。天哪！我誰說理去呢？有理沒錢，倒会被抓起来，这是什么世道，简直没有穷人的活路啦！

一到夏天，細紗车间热的象蒸籠一样，晕倒人是常事。虽然这样，当头的連窗户都不叫打开。有一次我妹妹热的头晕，腰袋嗡嗡的响，眼前冒金花也不敢请假，晃晃悠悠的好容易熬到了下班，到家后，就躺在炕上起不来了。连着歇三个班，厂里就开除了。怎么办呢，只好托厂里

的姐妹們去苦苦的哀求当头的。結果又讓我妹妹上班了。

但在六月十一日那天，是正热的天气；也是我妹妹活在世上的最后一天，那是我永远不能忘記的一天。太阳象一团火，沒有一点風絲，树梢連动都不动，在家坐着汗都嘩嘩地往下流，热的人喘不过气来。車間里热的更是可想而知了。我的妹妹玉梅，又暈倒了。李加和看見，上去一把，就象抓小雞一样，揪着我妹妹的头髮，把她給拉起来，接着上去就是几个嘴巴子。妹妹的臉馬上肿的象馒头，但李加和还瞪着他那三角眼，一个劲地喊叫道：“接头！”我妹妹經这一吓，腦子稍微清醒了一点。她在这干了整五年活，如果好着她閉着眼也能接上。这时她强打精神，兩手哆哆嗦嗦的把头結上，袁門神一看她把头結上了，上去又是几个嘴巴子。当时我妹妹又暈过去了，臉刷白，沒一点血色。这时又来了一个滿臉黑胡、长着一双夜猫子眼、肌肉橫生的小日本。他手拿木棍，渾身带着杀气。見我妹妹在地下躺着，便用他的大皮靴狠狠地踢了一脚。“巴格牙路，起来起来的！大大的裝死不成的！”叫完了揚长而去。留下我那可憐的妹妹，一动不动的躺在地上，緊閉着眼睛，面色死白，一小时以后，她才慢慢地苏醒过来。微微地睜开眼睛，呻吟一下，身子連动都不能动。同車間的姐妹們，个个暗暗流泪，她們都能帮她的忙呢；她們也是和我妹妹一样的受着折磨，只不过是沒有暈倒罢了。我那妹妹是多么想回家呀，多么想回到媽媽身边痛哭一場呀！她咬着牙拿出全身的力气想站起来，刚一动，全身就象針

孔一樣。她含着泪向車間姊妹們說：“我离家多近哪，可是就那么近我再也不能看見我的媽媽了。我那可憐的媽媽，我再也不能掙錢養活你了。”我妹妹痛的在地下来回的打滾，李加和在辦公室裏養够了神，出來對我妹妹說：

“你死！廠里有的是人，就不叫你走！”說着又派人到我妹妹車上去紓。就這樣，從上午八點，一直到下午六點，我爸爸才把她背了出來。這時的玉梅，我那妹妹，只剩一口氣了。腦袋搭拉在我爸爸的肩膀上，眼睛也睜不开了。我媽看到妹妹被折磨的样子，放聲痛哭，緊緊地抱住我的妹妹，好象怕別人搶走一樣。再看看妹妹全身都青啦，媽媽哭的更加傷心。“玉梅，我那孩子，你怎么不睜開眼看媽呀！媽對不起你呀！……”

儘管我們怎麼呼喊，我那妹妹也睜不開眼睛，媽媽哭的昏過去好幾回，眼淚都哭干了。“玉梅，你為了養活媽受了這麼大的罪，你還沒長大成人，就掙錢養活媽，媽是吃你的肉哇……。玉梅！媽對不起你呀！玉梅！我的好閨女，你怎么不說話呀，你死也該看媽一眼哪！兒呀……”我那妹妹好象聽懂了媽媽的話一樣，微微的睜開了眼睛，嘴一張一張的要說話，可是張了半天一句話也沒有說出來，一口氣沒來就閉了眼，就永遠離開我們了。死後眼睛和鼻子都往外冒大血塊子，流了一地，整整收了三鉗篋箕，我的妹妹就这样被他們折磨死了。摺指算來她已死去十五年啦。

如果她能活到今天，該多好呢！

(周兰芬 整理)

任 大 起

任大起 口述

黃昏了。任大起跟着哥哥大發，晃晃蕩蕩地走出了新中山的大鐵門。

露着肉的破棉祆，像卦爛魚腸子在身上亂飛亂舞。冻、累、餓如同惡鬼一樣纏着他。他兩腿沒一點勁，渾身打哆嗦，緊緊地貼着哥哥的肩膀走，好象這樣能使他有力氣趕走寒冷、飢餓和疲乏似的。

同到工房里，大起燒火，大發揉糠，蒸了四个糠團子，塞進了小哥倆的肚內。剛想喝口涼水，上夜班的鑼聲又催命了。

布机哇啦哇啦發出鬼叫的聲音。大起的兩腿發顫，每迈一步都皺一次眉头。白天推軖轆馬慢了些，被鬼子蹤的腰到現在還鑽心的疼。眼皮也象抹了蠟膠老往一塊粘。他很想歇一會、睡一覺。

可是，日本人桑原和工头王承义死盯在屁股後頭，象對大瞎蛇。看見他們手里的大皮帶、打梭棍，象看見了鬼

卒們拿着狼牙棒一样，心里总卜卜地跳，耽心着鬼子一高兴就会給他們兩下。

布机还是象鬼叫一样响着。兩头带着鋼尖的梭子飞快地在紗綫当中穿来穿去，說不定什么时候就会从破旧的机器里飞出来。在織布場干活沒挨过梭子打的人，真是百里挑不出一个来。工人們除了防备鬼卒的狼牙棒，还得随时提防着要命的飞梭。

这天后半夜，任大起实在支撑不住了，站着站着就睡着了。他心里想：喝碗热水或許能解解乏，就打了壺水来。他剛端起碗放到嘴边，还没喝一口，忽然右眼被什么东西猛击了一下，一时他覺着眼睛發麻，臉上苏苏的象有許多条毛虫在爬。起初他以为是誰和自己鬧着玩儿，便捂着眼蹲了一会，可是右眼越来越痛了。他把手拿下来一看，啊！滿把的鮮血，脚下滴滴嗒嗒立刻淌了一攤。他猛然明白是飞梭打着眼珠了。頓時，腦子嗡的一声，眼睛痛的鑽心，心就象刀子剜一样难受。他一骨碌滾翻在地，捂着眼在地上来回打滾。一会儿，他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醒來的时候已是在工头的办公室里。他想睜开眼，可是右眼疼得剝心，連左眼也睜不开。他覺着有兩個人在背后抱着他，給他擦臉，擦眼皮。还不住的搖他喊他。他心里象开了鍋一样翻騰、难受。嘴巴一鼓哇哇地吐开了苦水。他想哭又哭不出来。嗓子眼象堵了个棉花疙瘩。他咬着牙、攥着拳头、兩道眉摵成一个扣，身子一劲往后挺，黃豆大的汗珠从發青的臉上滴流下来。

日本人桑原和工头王承义嗚嚙嗚嚙唧咕了一陣，就假慈悲地把他送到医务室。溫大夫看了看說：“这孩子的眼已經完了，我也没有办法，赶紧送馬大夫医院吧。”

桑原听了不高兴地說：“溫的，这个小小的破啦，你的看看，馬大夫医院去的不要？”

溫大夫严肃地說：“桑原先生，这个小孩眼睛大大的坏了。快快地馬大夫医院的去；不然，小孩疼死的有！”說着給大起的眼睛堵了塊棉花，用綑帶纏起來。

大起早就又昏过去了。过了一会，他晃晃忽忽覺着有人用力抱着他滿身血漬的身子，拚命的喊着：“大起！大起！……”他心里有点明白了。听出这凄惨的声音是哥哥大發，他使劲抓住哥哥的手，从牙縫里挤出兩個字來“哥——哥！”然后哇地一下哭出声来……

大發用哥倆蓋的那床破棉被裹住弟弟，把他送到了馬大夫医院，一个穿白大褂的人用棍子把大起的破棉袄和开了花的破单褲挑着扔出来。大發哀求着說：“先生，讓我



进去看着弟弟吧！”

“滾你媽的蛋！这里不是你进来的，穷鬼……”咣当一声大铁门锁上了。大發望着漆黑的天空又涌出了兩行热泪……

大起进了医院，当晚没给做手术。他在病床上折腾了一夜：一会坐起来；一会又爬下；一会头撞墙；一会撓胸口……怎么呆着也不好受。一宿的工夫，床单被他抓破了好几处。

轉天八点才开始治眼。帝国主义豢养的奴才們，他們的心够多狠哪！連点麻藥都不給打，把眼珠子生給剪下来。刀剪一下，大起就尖叫一陣。那叫声誰听了都得心臟碎裂。

五分钟以后大起又死过去了。

大起躺在医院里，多么想杀人哪！在老家的爹娘还不知道儿子遭到这种灾难呢！大起每天見人家有錢的提着鮮貨点心来看病人，自己就臉冲墙头哭一陣。一笑臉上的綑帶就滴滴嗒嗒地滲出血水来。

不几天，一个亲戚給他的爹娘捎了个信。大起的爹娘听说自己的儿子打瞎了眼，心比刀子剜还难受。他們不分昼夜的，一行鼻子一行泪的趕到了天津。好不容易找到馬大夫医院。看門的見老倆口子破衣罗嗦，沒什么油水，就拿他們当要飯的轟出来。老倆口子一連去了七趟，磕头、下跪都被踢出来、罵出来。大起做梦都喊着爸爸媽媽；他的父母哭儿子把眼泪哭干了——可是，誰也沒見着誰的面。

十二天以后，大起出了院。一进门，他看見爸爸妈妈都在墨里，媽媽的眼肿得賽过紅桃。大起一头扎在媽媽怀里放声大哭起来。母子倆摟抱着哭得死去活来。

这天夜里大起媽把儿子紧紧地摟在怀里，一宿也沒睡着。时时还受惊地睜眼瞅瞅窗、望望門，生怕儿子再出什么意外。

大起媽一看到儿子的眼心里就像狼掏一样难受，整天价光是哭。大起呢，一見媽媽哭就天真的說：“媽，你別哭啦！我不是好好的嗎？再过兩天我就去賺錢給你买面子吃。”

“媽的乖兒子，你的眼還沒好呢！媽一定讓你着实養养再去上班。”見自己的儿子这样懂事，媽媽的心里越發难受了。

大起又認真的劝媽媽說：“大夫說我的眼睛还能長出来呢！他說三天以后就長个小小的。”說着就扒着眼皮到灯泡根前去照。左照右照什么也看不見，真着急，他火了。說：“真气人！怎么还不长呢？”

媽媽听见儿子說出这样天真的話語，把儿子摟在怀里，眼泪象就断綫的珠子，扑噜扑噜地落下来。

出院三天，工人科的日本人大彬在工房里碰見了大起，就拽住他說：“小孩，你的好啦！明天上班的有。不上班——‘三宾’給，开除大大的。”

大起听了急忙跑回家和媽媽商量。媽媽含着泪說：“孩子，沒办法，若是真把你开除了咱們不得餓死嗎？……媽

是舍不得讓你去的。可是……”她再也說不下去了，把兒子拉在怀里，眼眶又濕了。

轉天，大起就湊合着進了門。干了一會，布机震得他腦漿子生疼。平常刺個口子還得疼好些天呢，何況眼珠子整個剜了去呢！這時他感到天也轉地也轉，眼前一勁冒金星。低下一擡眼，血湯子轟噠地流在布面上，頓時潔白的布變成大紅的了。

三個月以後，被生活逼得沒有辦法，大起偷了三碼布纏在腿上。下班時被偽巡長小陳翻出來。小陳當眾把他的破單褲由褲腰一直撕到褲腿。一脚踹了他個大跟頭。然後象抓小鷄一樣地把他帶到一間小黑屋子裏，而三碼布却入了巡長的腰包。

关心任大起的讀者同志們，你們想知道現在的任大起嗎？我來簡單介紹一下：

任大起現在已是一個粗壯的大漢子啦，天津解放的當年——一九四九年他就入了黨，後來又當了支部書記。

他不僅是個受人尊重的支部書記；也是個受群眾熱愛的工人干部。他曾先後擔任值班長、保養員等職務。在他做領導工作的這些日子里，一直保持謙虛朴實的作風，和工人們一塊吃、一塊玩、挽起袖子來就一塊干……

他現在在布場技術組工作。專門研究布機的技術設施，改善安全裝備。通過工人們的智慧和他們的雙手，布機上所有危害人身安全的地方都被征服了。現在的織布机

不再是吃人的老虎，却变得象一只驯服的梅花鹿那么老实，听话。

任大起不仅对工作认真、努力，他更爱交朋友——尤其是青年朋友。厂里的青年工人們不認識他的真是太少了。每逢他和青年朋友在一塊聊天的时候，总不断把过去的悲惨遭遇当故事講給他們听。最后，总是露着幸福的微笑說这么几句：“同志們，今天的工厂真是天堂，过去的工厂和地獄不差分毫。你們見过飛機是什么样的嗎？往后你們是看不見了，只能听听故事吧！同志們，咱們可得好好干呀；不然，就对不起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恩典哪！”

（許宗望 整理）

四 个 指 头

梁俊峰 口述

为了掙碗飯吃，在一九三七年的夏天，我从文安县来到了天津裕大紗厂（現棉紡三厂）上工。当时我会木匠活，来厂两个来月就給我一批活。这批活是給原动部作馬达座子。做这活需要用電鋸。当时我們的工头是日本鬼子楊森。我心里想，我本来沒用过電鋸，怎么能做好这批活呢？左思右想难坏了我。干吧，又怕于不好；不干吧，又不行。最后还是硬着头皮干了。

当干这批活的时候，原动部主任日高（日本人）一天来催三、四次，一进車間就把眼珠子瞪得象包子那么大，象瘋狗一样地吼叫。一連催了兩天，一來就朝我罵：“巴嘎，快快地于！”他一边罵，一边还要打人。他一进门就吓得我渾身打哆嗦。干到第三天的上午，我正在精神集中地把一塊二尺長、六寸寬、一寸厚的木头拉开，并用右手把它往電鋸里送的时候，突然他一步迈到我的眼前，又是一頓臭罵，我一害怕，“叭擦”一声，我右手的四个手指

头和木头都一塊被切斷了，跟着我就昏迷过去。我只听见
张师付和李师付叫我几声，再也不知道什么事了。

当他們把我送进医院去以后，我才清醒过来，一看，
我的白褲叉、条上衣都成了血的啦。我当时疼得死去活来。
我們修理場主任高石（日本人）听说我把手指切掉了，就气呼呼地赶到医院，看見我，举起脚来就踢，当时
被送我来的工人給拉住了，工人們說：“他都这样了，你还
打他！”高石当时就告訴大夫，要把我的手掌全部割掉，
而那位中国大夫不同意，就跟他说：“割掉，連吃饭都不
行了。”我也苦苦哀求。后来大夫叫我住院，可是日本鬼子怕花了他們的錢，就說：“不用住院，回去就好了。”手
虽然沒有讓拉掉，可是連一點止痛藥也沒能上就回来了。

沒有地方住，只得找了个亲戚家住下了。黑夜白天痛
得我坐立不安。有的工人替我向厂里要点藥，可是不給，
这个尖腦袋、短短的小日本說：“不要紧，过兩天就好了。”我痛的一个多星期沒有吃下饭。在文安县的三个孩
子和妻子知道我受伤了，想一步来到天津看我，沒有路費
又怎能来呢？我在这受罪，她們在那受罪。

剛剛到兩個星期，日本鬼子就催我上班，因为干不了
原来的活，就用一只左手打水扫地，我一面扫地，一面抱着
伤手，痛得就和針扎的一样。

到现在我还保存着被割掉的四个手指头，我要留給子
子孙孙看，告訴他們：我們这輩人是怎样生活过来的，讓他們
不要忘本。

（张国英 整理）

小老板

高海三等 口述

小老板的名字叫刘仲英，高个子，鼓鼻梁，戴着一副白色的金丝眼镜，歪戴着美国帽，身穿洋服，手里经常提着根粗粗的文明棍，走起路来耀武扬威的，他的脾气非常暴躁，不管是对工人对职员，总是“混蛋”不离嘴的骂人，说打就打，简直象个畜牲。

他的父亲刘伯森是上海的一个大资本家，开有纱厂、纸厂、煤炭公司等九个大企业，天津宝成纱厂是宝成第三厂，它建厂于一九二一年，那时全厂约有三万多锭子，一千多个工人，机器全是从美国运来的，因为没有给钱，美国便理直气壮地派了美国人员登来厂当经理。过了几年，刘中荣才从天津的中国、大陆、浙江、兴业等四大银行借了一笔款还给美国，把纱厂赎回来。他父亲坐镇在上海，所以天津宝成纱厂，便由他继位经营。因为当时他还很年青，是大老板的儿子，所以“小老板”便在工人当中叫开了。

小老板的汽车喇叭在厂门口一响，就象是发出了工



人的灾难临头的信号，工人們在車間里就一傳十、十傳百的喊着：“小老板来了，小老板来了！”这时睡在地上的工人便急忙起来干活。尽管工人們这样謹慎，但仍然有許多人逃不脫

小老板和稽查們的辱罵和毒打。有时他們在深更半夜，趁工人們最困最乏、連門警也都在打盹的时候，“抽冷子”进了車間，看見睡着的工人，冲着后腰就是几脚，接着又是一頓嘴巴子，手里的文明棍也做着極不文明的事情。所以工人們每天上班就象过关一样，一听見工厂的大笛响，腦袋瓜子就疼。

用資本家的眼光来看，小老板真是个“精明能干、年青有为”的老板了，他在二十岁以前就留学过日本和美国，而且二十剛挂零就繼承了他父亲的事业，当了老板。看！小老板是一个多么“風流”的人物啊！每天都有客人的汽車停在他的門前，有时在一个鐘头内就有十几处來電話約他去喝酒、跳舞、进班子、搗鬼，商量怎样对付工人……，各处的請客單就象雪片一样的飞来。小老板对請客的人們是分三等来对待的，在上等朋友的請客單上签

“敬陪”兩個字，表示一定要去；在中等朋友的請客單上簽“知”字，表示高兴去就去，不高兴去就不去，在下等朋友的請客單上一向是簽“謝”字，表示根本不想去。象美國的軍官、慎昌洋行的經理、中國銀行的經理、孔祥熙的儿子，……这当然都是他“敬陪”的上等朋友了。就是这羣家伙，在旧社会里結成了一个黑暗的大罗网，千千万万的工人、市民……在这个殘酷的大罗网底下，累断了筋骨，饿干了肚腸，不知洒了多少鮮血，流了多少眼泪，埋葬了多少尸体。

小老板每天除了在上午十点多鐘到事务所去一趟，办上一兩小时的“公事”以外，整天出入于舞厅、妓院、馬場……过着花天酒地、荒淫无耻的生活，一顿飯就要吃掉当时一个工人半月的工資，喝的是白蘭地、外国汽水，抽的是呂宋雪茄和大烟，他扔掉的一个烟卷头，比工人干一天活还值錢，他抽的大烟都是亲自买来的，而且在抽大烟以前还要把門先鎖上，恐怕傳出去对自己的名声不好。尽管这样严格的保守秘密，“烟鬼”的名声終于还是傳遍了。

小老板究竟有几个公館，娶过多少个老婆，这不用說工人們不詳細，就連他自己也未必能搞的清楚，因为他娶个老婆就象买个洋娃娃那样簡單，抛弃一个老婆同样也象扔掉个洋娃娃一样的容易。光是一般人知道的就有七个，其中除中國女人外，还有俄国女人和日本女人，大半是从舞厅、妓院里买来的，她們都分別居住在日租界、美租界的

大飯店、大旅館里。只有第五個老婆（中國人）住在工廠的附近，她是在火車上被小老板騙來的。在她們住的這個公館里，使喚着一個汽車司機，一個保鏢的，一個老媽子，一個做中國飯的廚子，一個做外國飯的廚子，另外還有一個姓張的老頭專門伺候貓。

小老板和他的太太都有玩貓的嗜好，所以在家里養着十幾個大貓，全都是洋貓，渾身長着很長的灰毛，象哈巴狗一樣的大小，體重有二、三十斤。它們不會表演什麼雜技，也不愛捉老鼠，可是生活的倒很講究，它們住的一間房子很高大，地上是塗着油的地板，在房子一角的地板上鋪了一層沙土，這是貓拉屎撒尿的地方，土每天必須換一次。一個有三面欄杆的大木床，是貓睡覺的地方，上面鋪着長毛大花的地毯，大概主人是怕木板咯着貓的屁股吧！貓每天吃的是大米飯拌魚，魚都是一尺多長的鮮魚，主人是不允許給貓買小魚、死魚和黑魚吃的，因為怕影響了貓的健康。魚是先由廚子給煮熟了，摘去了刺，放在米飯里拌好再給貓吃的。在大貓生完小貓以後還可以喝到牛奶。另外，每天要給貓刷幾次毛，洗一次澡，有的貓不愛吃東西，就馬上請醫生來給打針。不過，這些貓也只有在主人高興的時候，才能被引進客廳去跑一跑，陪着主人玩一玩，平時是不許亂跑的。

小老板還喜好跑馬，在馬場養了十多匹馬，貴的每匹一千多元，賤的也得三四百元，一匹馬一天就要吃掉四五塊錢的飼料，天天有醫生給檢查體格。小老板經常帶着姨

太太坐着汽車到這裡來賭錢。

由於小老板吃喝嫖賭，揮霍無度，工廠便日益蕭條了。銀行老板看風頭不对，就逼着小老板還賬。小老板沒办法，便決定把寶成卖掉。當時有北洋、恒源等好多紗廠投標，可是他却打定主意，誓不堅決不賣給中國人，而和裕大紗廠日本經理植松勾結，偷看了標底，又讓他弟弟領着植松進廠“參觀”了厂房，在1936年便把天津寶成紗廠賣給了日本人。從此，寶成和裕大兩廠便合併成一個廠了，這就是現在國棉三廠的前身。

(郭旭年 整理)

工賊趙奎高

姜汝為

在裕大紗廠里，有一個連鬚胡、和尚頭、嘴下有一撮長毛的家伙，他就是殺人不用刀、吃人不張嘴的工頭趙奎高。在搖紗工作的工人，大多數都受到他的勒索，每逢年節都得給他送禮，不然，你這碗飯就不用吃了。

在一九三六年七月里，有一個名叫鄭从存的搖紗工人，住裕大獨身工房。他每天不下工躺在屋裏說：“中國人叫外國人管着，這口氣我就出不來，不定哪天我一定想辦法出這口氣！”他在廠里找了一根一尺多長的小鐵棍，用紗袋子把它纏好，放在搖紗車的車板上，有人問他弄這個干嗎，他就說：“玩。”有一天，他上夜班，聽說工廠的日本經理植松到廠里來，心里很高興。到晚上九點多鐘，他拿着小鐵棍，跑到前樓，一看沒人，扑了个空，低着頭回來了。剛到厂房樓梯門口，一眼看見日本紗場主任小伊藤，他緊走几步來到小伊藤的面前，然後放穩脚步，把鐵棍藏在背後，叫一声伊藤先生，貓腰鞠了一個躬，小伊藤也給他點

了点头，郑从存见小伊藤低头，回过手就是一铁棍，打在小伊藤的头上，当时小伊藤倒在地上，郑从存低头一看没死，又举起铁棍向下打，忽然有人抱住他的后腰，铁棍没有打下去，回头一看正是走狗赵奎高。两人挣扎半天，日本人小伊藤趁此机会爬起来就跑了，赵奎高看小伊藤跑了，放了手也跑，一直跑到前面，找到副官王国祥，王副官立刻派了几个警察来逮郑从存。这时郑从存正向前楼追来，被警察孙廷贵抓住，交给王副官，当时把他锁在一间小黑屋中，第二天早晨送到白帽衙门，工厂开除充公，他的被窝用品，都被王国祥没收了。

七七事变后，日本进天津，砸了西监狱，郑从存从那里跑出来，到了工房找自己的被窝和东西，已一扫而空，他想这一定是王国祥和赵奎高作的。有些人不叫他要了，他不听，还说：“少一点也不行！”回头就走，来到工厂大门口，警察不叫他进厂，他连理都不理，一直找到王国祥，王国祥见他，吓了一跳，问他：“你干吗来了？”郑从存说：“干吗来了，要被窝。”王国祥说：“不能给你，快走吧！”郑从存说：“不给不行！”王国祥说：“不走就叫人把你逮起来。”郑从存说：“你吓唬谁，我什么也不怕。”这时赵奎高正要到这交日报表，听警察说郑从存来了，吓的他日报表也没交，急忙报告日本人小伊藤。小伊藤得信后，连忙叫了五六个日本鬼子兵，带着大枪赶到王国祥屋里。没等郑从存说话便用绳子捆了起来，先用枪托子捣，皮鞭子抽，然后捆在前楼门口小树上来的打。不

管誰打他，鄭從存不是用口唾，就是嘴裏罵；雖被捆着，誰到跟前他就用腳踢，就这样从早到黑一點也不含糊。當天夜里日本人用一個麻袋，把鄭從存腦瓜冲下裝在口袋里，扔在大河里淹死了。趙奎高為討日本人的喜歡，就这样把中國人出卖了。後來趙奎高被提升為白帽（職員），和小伊藤拜了把兄弟。

一九四三年，趙奎高變得更加凶惡了。當時工人生活沒法維持，只能“偷”點錢到外面換兩個錢來糊口；可是趙奎高每天吃飯時，別的工頭走他也走，可是他假走，他趴在地上爬，真象條大黑狗。工人們就吃飯時才能“上點貨”，趙奎高就是那樣裝着狗來逮你。若是被他逮着，先打你一頓，然后再送給日本。輕者打一頓，開除充公，重了就得送到日本衙門。有一次，我推紗回來等電梯，恰巧趙奎高看見我在那裡，等我坐着電梯下了樓，剛到粗紗，趙奎高跑過來，抓住我的前襟說：“快把紗拿出來！”當時我不知怎麼回事，我說：“嘛紗？”趙奎高說：“嘛紗？別裝儂，快拿來。”我說：“我甚麼也沒有哇！”他舉起手來就是兩個嘴巴子，接着又把我捺在地上用腳踢，當時我剛十六歲，兩嘴巴就把我打蒙了，鼻、口都是血，躺地上只哭。他拉我走，我不敢走，他就打，這時粗紗班頭权煥臣跑來，向趙奎高說幾句話，我沒有聽清，只聽了一句：“他不偷東西。”趙奎高點点头，權煥臣回過頭來，叫我起來干活去，我才站起來，權煥臣打我一個耳光子，說：“快走吧！”我哭着走了。赵奎高向权煥臣笑了笑，象一個大瘋

狗夹着尾巴一摆一晃的走了。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赵奎高又当上了一貫道的坛主，每天仗他的职员名譽，拉厂里很多工人、职员参加一貫道，害的工人更加厉害；工人每逢关錢都得到他那去上供，你沒錢上供，得想办法帶兩個人入道，有一个人入道，赵奎高就得兩塊錢。他三天兩头找道友們要錢，不是买法寶就是造法船。有的工友叫他迷住了，关錢就給他送去，家中沒飯吃，卖了家俱也得給他送錢。老粗紗工人邓喜參加一貫道被迷住了，把家中的東西都卖空，后来患了精神病。有次，邓喜在工房大門口看見一只狗在臥着，他跑过去拉着狗尾巴，手里拿着一把扇子，扇着狗的尾巴，嘴里嘟念着：“上天；上天。”有很多人在旁边看他这情況，都感到痛心。另外还有个工人邢可权，他參加一貫道后，有病了也不請医生治疗，而去找赵奎高求佛，結果，一个聪明伶俐的青年就这样被耽誤死了。

一九四九年天津解放，我們政府替我們除了这个禍害，不然我們工人不知還有多少被这杀人不用刀、吃人不睜眼的赵奎高害死。我們感謝党和毛主席替我們除害。

工人文娛生活的今昔

許宗旺

最近，俱乐部主任和我談了一件事。他希望我能把厂史展览会里所反映的旧社会工人的苦难生活編成新京剧来演唱，并严格要求“自編、自演”，借以更深刻、生动地讓职工們回忆过去，珍惜今天，我很兴奋地答应了。当时我考慮了我們京剧团的演員水平和各方面的条件，覺得虽然有困难，但在兩三個星期內足可以赶排出来。

一當天我就开始动笔了。可是无论如何也写不下去。一拿起笔來腦子里就現出許多往事……

回想一下，除非今天，哪个时代有这样的事呢？領導上大力支持工人的业余文艺活动，而且还讓自己編自己，写自己，唱自己。真是……

日伪时期，慢說无人重視工人的娱乐，就是工人們自己凑在一起說說唱唱也是受限制的，我說這話你也許不信，那我就举几个例子讓你看看吧。

那个时候工人們一天累个七死八活的，誰有心思玩乐

呢。可是也有不少人，虽然餓着半个肚子，还是有这种喜好的。

現在我們劇團的賈玉亭同志，从小就愛拉胡琴，大伙也喜歡聽他拉，但那時候，在人多的地方他却不敢拉；就是不在眾人面前拉，他也要把胡琴筒里塞滿破布，怕惹是非，怕引來了許多听众，地面上或狗腿子來找碴。

又如：最喜歡說相聲、唱大鼓的周云章、劉春亭、劉寶財、劉源等人，那時，也是找个沒人的地方才敢唱的。

你一定要懷疑：說書唱戲又不是做賊，這也犯條款嗎？嘿，那個社會這也是犯法的呀！

周云章他們常聚會的地方是劉源的家里，儘管是偷偷摸摸地，也是有人來干涉的。有一天晚上他們正唱得高興的時候，狗副官王國祥領着個叫三倫的日本人來了，一進胡同狗副官就大罵：“這幫窮小子，誰讓你們唱的？还想活嗎？你們的腦袋不打算要啦！”鬼子也罵着：“巴格牙路，窩藏八路的有，庫啦。”一邊罵着就挨門挨戶的搜。看到這個情況，大伙就來個冷鍋貼鑄鑄——燙了。若不是他們跑得快，被鬼子逮着還不知怎樣呢。

鄭莊子有個算命的先生吳自清，因為會彈弦子，所以經常到工房里和他們一起玩，這年五月十五是吳自清他父親的生日，就把他們哥幾個都約來，借這個機會玩個痛快。給老人做壽樂呵樂呵還有關係嗎？沒想到就真出漏子了。當他們唱到興頭上的時候，派出所的戶口警一步闖

进来，只見他腰里掖着家伙，屁股上帶着繩子，狗屎尿把腿往凳子上一蹣，白着眼喊道：“媽的，遠八路還遠不着呢，你們跑這開秘密會議來啦！”

大伙早又吓得慌了手脚，連忙給他倒了杯茶，畢恭畢敬地說：“先生，別誤會！我們都是裕大紗廠的工人，今天來給吳大伯祝壽來啦！”戶口警故意端詳了大伙一下，裝腔作勢地說：“工人？把你們的‘工本’掏出來給我看一看。”大家都把工本拿出來，他挨個看了一遍，又白着三角眼打量了他們一會，呲着一口大黃牙象要咬人似地接着說：“既然是工人，為嘛不老老實實地在家里呆着，竟敢跑這來私自聚會，你們忘了死啦？”這時主人家吃不住勁了，吳自清的父亲哆嗦着說：“老总，您消消火，都是我不對……”

沒等他說完，戶口警又瞪着三角眼狠狠地說：“放屁！又是做壽是不是？做壽為嘛不通知地面，出了事誰擔？啊？”意思是想从這哥幾個身上找點嘛，可是看了看這間除了炕席沒嘛的破屋子，和哥幾個的窮樣子，也實在沒什麼油水可刮。最後就每人賞了个大耳光算完事。

雖然遭到百般刁難，工人們還是想了各種各樣的辦法來說唱，後來實在沒有办法了，他們就利用下神開鬼來唱，從那時候起，孙悟空、五大家時時扒在他們一個人身上下神，大伙就把神仙圍起來，請神唱兩段听听。

現在賈玉亭不斷談起這些事來，一聊起來他自己也是哭笑不得，他說：“我們那樣做呀，真是被迫得沒办法

了。”

后来连下神閻鬼的办法也吃不开了，实在沒辙了，他們就离开工厂到大直沽三益庄一带的私人票房里去玩。票房是有錢人去的，他們到那也只能是听听，尽管这样，他們也是到夜里十一、二点钟才回来。

同志，那個時間工人們不只是生活上苦，連說說唱唱也是如此的不自由啊！

當今天領導上讓我編劇本的時候，不得不讓我想起這些往事，生活在那個時代，做夢也想不到有今天哪。那末就讓我們看看今天工人的业余文化吧！

現在我們厂不只是滿足了工人文化娱乐的要求，还成立了好多剧团，有京剧、有話剧、評劇、梆子，另外还有歌舞、曲艺、音乐……等十多个团，工人們可以随便进进出出尽情地唱乐，同时俱乐部都有了自己的古典戏裝。

我就参加了京剧团，学会了十多出戏，又会拉又会打，賈玉亭就是我的师付。我們每月都給职工們演出很多节目，每当配合中心工作和政治运动也編排一些新戏，例如鎮反时我和演員高存义編了“护厂功臣”，搞查定的时候，演員陈博泉編了“查定員”等新京剧，演出时真是另有一种味道。現在的任务是宣傳社会主义总路綫，演員曹敬同志編了一段新京剧“兄妹比干劲”，当天就随着厂里的宣傳車出外去演唱。

这天晚上，宣傳地点是在音乐学院附近新建的一所大楼旁，这是去年国庆节盖成的百货公司，門前有塊空地，

对过是我们厂的市内宿舍。我们就在那打开了场子，宣传车一停下，就被人们围得风雨不透，纷纷抢传单，文艺节目一个一个的进行着，“打熊舞”，“跃进大合唱”，“技术文化大革命”……现在该唱京剧了，节目报完，老琴师贾玉亭给他们伴奏，晚风把他那幽美动听的琴音送到每个观众的耳朵里，听起来是那么清脆美妙，这时他的心里是多么愉快呀！他笑得那么美，卸了顶的脑门上发出红润的光，是呀！旧社会不许他高兴不许他快乐，今天他为什么不高兴？为什么不快乐？今天没有周云章的节目，他和我一起在车下维持秩序。

人群里有个系着红领巾的姑娘搀着一位老奶奶也来看热闹了，晚风把她几根银白的头髮吹得在头顶上抖动着，她眯起眼睛问周云章：“你们这是那个戏园子来的？”周云章说：“我们是工人，来宣传总路线的。”他着重地说了一句。“总路线我知道，天天都有来宣传的。”老奶奶停了一下又意味深长地说：“工人唱得可真不错呀！我老婆子活这么大岁数还是头一次看见这样热闹呀！”说完咧着掉了牙的嘴笑了。

周云章听了，瞧瞧我，也跟着笑起来，他笑得也是那么兴奋，跟贾玉亭不差分毫。

⑨在配合“史展览”的时候，袁鹤鸣同志编了一出便装评戏“勤俭持家”，演出效果非常好。评戏的观众大多数都是妇女和老太太，上演那天我也在台下看戏，老太太们一边看戏，一边抹泪，我身边有两个大娘还互相低声嘀咕

着：“唉！嬸子，唱得真是一点不差呀！日本时候我們討來一塊窩头就你一口我一口的分着吃。”“是呀，大媽，我也覺着台上演的是我呢！”“象你，我看也跟我一样呢！这个討飯的籃子、棍子怎么越看越眼熟呢？……”

戏一幕一幕地演下去，随着剧情的發展，她們的談話也在变化，現在台上是姐妹倆因为爭夺皮猴和毛料褲子鬧翻了臉，这时我又听老太太們嘀咕起来：“看看！真是年青人，只知水解渴，不知挖井难哪！”“唉，象这样的年青人还不少呢！掙点錢，整天价大吃大喝，講穿講戴，我可真看不下去。”“還用說別人嗎，我們鄰居有个閨女，別提多瘋啦……”

我正听得有意思，忽然她們不說了，我側过头看了看，她們的神情有些不安，我倒很奇怪，我回头看了看后边，嘿！我明白了，可能那位大娘說的就是她，我身后坐着一个女工，她的臉緋紅，头低得象要扎到怀里，我認識她，她不是我們厂有名的“港人”嗎？……

可不是吹牛，我們的戏多多少少在职工群众中起了作用。我們的戏教育了职工，职工的干劲鼓舞了我們。因此我們越唱劲头越大，这个劲儿，火車也拽不动。

現在，周云章和賈玉亭他們都是五十开外的人了，可是他們的心並不見老，好象年青了。每次上台演出或是我們青年人演戏，总是乐的合不上嘴，心里象开了花，每次演完了戏也总是热情地对我们說：“小伙子好好練吧，多下点功夫，把艺术水平再提高些，这个时代真难得呀！”

周云章老大爷，每天下了班都把老花鏡架上，埋头編寫新段子。他說：“就這個時候我再不唱唱，等沒了牙再想唱也不行啦！”

過去童工們受罪的八間房那里，現在蓋起了一片紅房子，每天吃完飯到那去蹣跚吧，嘿！到處是鑼鼓喧天，唱的唱，拉的拉，看看這個窗戶里也在敲打，那個窗戶里也在歌唱，現在各個團都在編排新戲，我們不仅要唱出過去工人的痛苦，也要唱出今天的幸福，更要唱出美好的未來。

哪怕你不好唱或不會唱，只要往那一瞞瞞，心里就会感到一種幸福的滋味。當然，你若會唱兩句，心里就更覺得美啦！

母女兩代

王佩玉、李惠云 口述

王佩玉說：在旧社會我沒有名兒，人家都叫我李王氏。1937年，我才十八岁，就进了裕大紗廠，在搖紗當養成工。

那时候我公公和丈夫也在廠子里上班。全家六口人，三个做工的。按理說，生活應該富裕吧，可是日本統治時期，工人們賺錢太少了，我們家總是窮得叮當亂响，吃了上頓，下頓還不知往哪兒弄去。在那個世道，當个窮工人也得鑽門子，挖窗戶，隔長補短給當頭的送送禮，要不哇，你就活該倒霉。我們家連飯都吃不上，哪有送禮的錢？這一下，我可遭殃啦，那個搖紗的大頭趙奎高真是凶，淨在我的車上一根綫一根綫地找毛病，不是說我錯了綴，就說少了根數；上趟廁所也嫌時間長，還要罰三四毛錢。不光罰錢，還寒蠱人哪，把挨罰的原因用大布告貼在車上邊的暖汽管子上叫人們瞧。那月我都要挨幾次罰，貼幾次布告，把肚子氣得鼓鼓的也不敢咬聲。給頭們送禮的人，情況

就不大相同啦，干輕閒活，每月还比不送礼的人多关六七塊錢。有些工人怕走背字，就扎緊褲腰帶擠出錢來給当头的送礼。这一来可把这些王八羔子喂肥啦，就拿猪肉來說吧，他們从工人手中收了肉条子，就在肉鋪里存着，願意啥时候吃，就啥时候取。簡直是喝工人的血；吃工人的肉哇！

“閻王好見，小鬼难搪！”大头厉害，还离得远点；小头查車工，整天在弄档里逛蕩，最是难缠。有一个外号叫武大郎的查車工，对工人可坏啦，經常偷偷地瞟着工人干活，只要叫他抓着小辫，馬上到車头上，把皮带打到活輪上去，叫車停下来，紧接着就把赵奎高他們找来，給出錯的工人下結論。我們受的这一層一層的气真是說不尽。

那工夫，邪道門在厂里也闹得挺凶。大头赵奎高，他本人就是一貫道坛主，象个臭綠豆蠅似的，到处拉人參加他的道門儿。他找到我家劝我：“李玉氏，在道門儿可好哩，大水來了，老娘派法船接咱，不挨淹；打起仗来，槍子儿穿不透，炸弹炸不开，在哪吧！”我說：“在道門儿管吃还是特穿，我不在！”赵奎高說：“这是好事咧，为難不在？”我說：“不作那分好事，我們沒有那分在道門儿的錢！”我这么顶撞他，赵奎高看着我更不順眼啦！

这年，宝成紗厂的家家小老板，把宝成卖给了裕大的日本鬼子，裕大和宝成就合成一个厂子了。日本人把裕大一部份机器和工人搬到宝成，我也就跟着过来了，这时管搖紗的总头是小日本横川。

不久，我就怀了大女儿惠云。这时候我真害怕极了，好多女工因为怀孩子都被开除了，我家穷得稀里哗啦，真要开除了可吃嘛呀！哪个女人不爱自己的小孩？哪个女人不疼自己身上的肉？为了全家人的生活，我却瞒着人，用布做了一个圈腰子，狠着心把肚子勒得紧紧的，只怕别人看出我怀了小孩。后来婆婆知道了，就颤巍地告诉弄档里别的老太太们。老太太们就七嘴八舌的劝婆婆：“快别叫媳妇勒了，把小手小脚勒坏了，怎么添哪！赶快劝劝她吧！别出勒啦！”婆婆听了大家的话，就一个劲地劝我，唉！这个理我也不是不懂啊！孩子犯了嘛罪？为嘛在娘肚子里就受折磨？又一想，不勒可不行，前几天徐刘氏不是因为怀孩子被横川看見开除的吗？不能听婆婆的話，还得狠心地勒啊！怀孕的日期一天比一天多，我的肚子一天比一天大，孩子出了怀，用圈腰勒也不中用了。冤家路窄，有一天上夜班，我正在车间落紗，横川走过来了，我赶紧假装弯腰拾东西，可也没瞒过横川的眼睛，他立刻把赵奎高叫来，叫赵奎高告訴我：“小孩的有了，要回家休息休息的。”說完就带我去賬桌算賬，我說：“我还能干活儿，晚走几天成么？”赵奎高說“人家横川是关心你呀，叫你回家休息。”我急了，說：“回家去吃什么呀？”赵奎高瞪眼一瞪說：“別对付了，干脆走吧！”我也生气地说“好吧，我走！請你告訴橫川吧，我不用他关心！”这时候赵奎高早把女搜腰的叫来了。半夜一点鐘我被他們赶出工厂，厂外一片漆黑，連个灯光都沒有，从厂子的大門口到



工房，是很长的一段路，西北风刮的刺骨，我又是害怕又是难过，晃晃悠悠地回了家。

管工房的大老崔，消息真灵通，第二天一早，就催命似地逼我搬家。我苦苦地哀求也白

搭，大老崔这条老狗嘴张得大大的，要噬人哪！和丈夫商量了半天，只好含着泪，把我结婚时候的两件麻线衣裳和一根银链子当了，买了五斤点心送了去，才算把老狗的嘴堵上了。

房子的问题解决了，吃的上哪弄去呀？这个年月，大家都穷得没辙，可不能求亲告友，我就每天带着六七个月的重身子，到杜庄子、吴嘴那一带去拾白菜帮子煮着吃。好歹地把冬天熬过来啦，第二年四月孩子生了，当时家里连一个米粒儿也没有，婆婆走进走出地偷着掉泪，把一只空面袋扫了又扫，扫出一小撮老棒子面，打了点糊塗给我下奶，唉！那个难哪，简直不能提！

我正在月子里，新中山开工了，那里赚钱多，好多裕大的工人都跑到那去干活，厂子里怕工人到新中山去，就把工房的大门上了锁。虽然这样，工人走的还是不少，

我趁这个工厂缺人的时候，没出满月又上班了。

日伪时期，工人一天干十二小时的活。平常厂子的大门总是锁着，只有上下班和吃饭的时间开一会门。那时候那有喂奶的时间，只有趁给大人送饭的时候，把小孩捎进来在娘怀里吃口奶。日本鬼子防工人象防贼一样，不叫工人出大门，也不叫送饭的人进厂子。送饭的人象探监似的把饭和小孩隔着木栅杆递进来，不到一刻钟，工人就得象囚犯似的把饭盒和小孩遞出去，这样，孩子怎能吃足奶？这是上白天班，无论怎样，孩子还可以在娘怀里偎会，要是上夜班，就更惨了，工厂门上了锁，孩子不能进厂，只好在家中哭一宿。又没钱给她买代奶的东西吃，孩子刚生下来还水灵，慢慢地就饿的又瘦又干了。可我这两个奶呀，涨的生痛，干着活奶水滴滴搭搭地往下流，我的眼泪也和奶水一样，把干活的走道洒成河！我隐隐约约地老听见孩子“呱啦”“呱啦”地哭，孩子哭的声音把机器的声音都压下去了！一心惦着孩子，干活哪能不出错；挨罚的次数就更多啦，挨罚的大布告也净挂出来。因为揪心，难过，我的身体就一天一天地垮了。

孩子三个月的时候，天津发大水，厂子里停工了。停工不给钱，就更没有吃。我抱着孩子在厂子大楼的楼梯上避水，大人肚里没食，奶不够吃，孩子饿得哇哇哭，正哭得我心焦，赵奎高大摇大摆地从前面走过来，我就叫他：“赵头，发大水了，老娘娘怎没派法船把你接走哇？”赵奎高知道这是损他，白眼珠翻了翻，气哼哼地走了。我这人就是这

么招大头的恨！

惠云剛斷奶，又懷了二女兒惠文。開除的滋味嘗過了，這次就更害怕；聽老太太們說，可以打胎。我反來復去的想，打胎好比生摘瓜，身子骨糟踐了呢，果真有個三長兩短，“全家人怎麼辦哪？不，不能打胎！”可是不打胎開除了也是沒有飯吃呀，唉！千難萬難難死人！自己拿不定主意，我就找娘商量去了。娘一聽就刷刷地掉淚，說：“惠云媽，你不能這樣作呀！人嘛，都是為了生兒養女，咱們不能辦這樣的缺德事！”娘的話還沒說完，我就趴在娘怀里哭了起来。從娘家回來之後，只得又使老法子，拿布圍腰勒肚子，到了五個多月又被開除了。

生了惠文之後，我的身子就更弱了，也許是日本鬼子快要垮台的緣故，果仁餅山芋面也不好買了，每天吃半飽上班干活，下班回家累的老是喘不上氣來。就是這樣也得不到休息，每天撐着干活，很快地就把我折磨的不成人樣了。我常想，這是哪世造下的孽呀？即使我自己前世作了坏事，難道說孩子也和我一樣的命嗎？不可能，這純粹是世道造成的！這些時候，布場的男工們爭鬧罷工，有些大膽的還“偷”紗，“偷”布，叫日本人逮住了就綁在大門那灌涼水，压杠子，這些人真硬氣，挨打也不含糊。我心裏說：“本來嘛，大爺爺們，誰受得了這分窩囊罪，可惜我是女人，沒他們那麼大的胆子。”有錢的求兒盼女，盼不到手；窮苦人家多兒多女是累贅。惠文才斷奶，我又懷了三女兒。這時候我的想法忽然變了：難道穷人就沒有生孩子

的自由嗎？窮人的孩子就沒有生存的權利嗎？為嘛叫孩子在媽肚子里受委屈，這回我不勒肚子了，叫孩子舒舒服服地躺在娘的肚子里，叫孩子平平安安地生下來！

生了三女兒不久，日本鬼子就投降了，全廠的工人，全工房的家屬都歡騰起來，大家都以為勝利啦，再不受日本鬼子的氣啦。哪知道國民黨來了，換湯不換藥，把頭還是騎在工人头上。物价更是一天漲幾次，錢一个勁的毛，穷人還是連褲子面也混不上。

老家寶坻縣來的人常學說八路軍的事情：怎樣平分土地啦，怎樣鬥爭地主啦，窮人們怎樣分東西啦，我聽了就心里想：天津多咱也象寶坻一個樣啊，寶坻離天津只隔一百多里地，可是兩個天下。一九四八年的秋天，工房里就有人偷偷地說，這回國民黨可快要完蛋啦，國民黨在東北打敗仗啦，咱天津快要來八路軍啦；我們天天盼着。冬天，八路軍真的把天津包圍了，大炮轟轟的響，沒過兩三天，天津就解放了，全廠的工人個個歡喜，大家進廠修機器，搞清潔。軍代表給我們講話，叫我們“同志”，說工人是廠子的主人，叫我們管好工廠。果真不久，當頭的都撤下來了。工人們干活兒更起勁啦！有一個同志說：“李王氏，現在工人當家作主了，你也起個名兒吧！”于是，他給我起了個名兒叫王佩玉。當時我的心氣也很高，心說：“這回可順氣啦，也不挨餓啦，一定要好好干。”那時候，工廠開職工大會我也參加，雖然我嘴笨，說不好話，可就是別人講我也聽得入迷。业余學校招生，我就趕緊去

參加，為的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不当睁眼睛。谁知心劲足，身体不给我作主，十几年忍饥受累的日子叫我作了一身的病。最痛苦的是，出不上气来，一个劲地喘，还直吐血。我是个刚强人，就硬挺着干，跟谁也不说我的病。要是旧社会，谁管你呀，累死了算！现在可不同啦，尽管我不声张，领导上还是注意了我的健康问题，叫老姐妹动员我休养。我说：“国民党那咱还拼命给他们干啦，现在解放了还歇班！”话是这样说，病可越来越重。一九五二年四月，我就病的不能上班了。我在家养病，厂子里的领导和老姐妹常来看我。有一次，工会领导说：“王佩玉，你这病得彻底养，不是三天两天能好的，干脆退休吧。”一听领导这样说，我心里又嘀咕了，退休？家里怎么过呀？孩子們还小。其实领导早看出我的顧慮来了，就说：“王佩玉，你放心吧！你是厂子里的老工人，一定要照顾你的困难，退休以后可以叫你的大女儿替你上班啊！”我一听，领导



上給我想的这么周到，我自己还打的嘛算盤？就按照领导上的意見，在家养病了。这些年，因为生活很好，我的健康恢复得很快，就是这喘病去不了根，这病是日本和国民党統治时期挨餓作成的。因为这病使我失去了工作能力，所以，我再也忘不了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仇恨。

現在我一心盼望我的女儿們好好干，好好地建設咱們的社会主义社会。想想我年轻时候受的苦和难，再看看孩子們現在的幸福生活，我常常感激地流眼泪，要不是共产党、毛主席，我的孩子們还不是和我从前一样？最近，領導上因为我的大女儿在生产上表現的好，叫她到北戴河去休養。以前只有当头的象赵长蘅这种人才能去北戴河，現在一个不滿二十岁的孩子，才作了一点儿成績，就受到这么大的奖励，在旧社会作梦也梦不到啊！

李惠云說：我是媽媽的大女兒，在旧社会虽然跟着媽媽过了不少苦日子，但是对媽媽的痛苦遭遇知道的少，媽媽为什么受苦更不理解，因为那时我年紀很小，不懂事；媽媽又性情剛強，輕易不肯向人談她过去的經歷，她總說：“过去的就过去了吧。一个人應該向前看。”一直到現在，媽媽为了响应党的号召，教育我們青年人，才把她年轻时候的遭遇談出来，这使我想起很多以前的事情。

媽媽因为生我們姐姐，把身体糟蹋坏了，在我记事的时候，她就是个病人。那时，她还很年轻，可是喘起来就象老年人一样，她很瘦，簡直是皮包着骨头。国民党反动

派統治的時候，她的病已經作成了，每天還是干十二個小時的活，下班回來，累得抬不起頭來，仍要強掙扎着洗衣服、作飯。她很慈愛，無論自己怎樣痛苦，在外頭受了什麼委屈，從來沒有象有的媽媽那樣，打罵孩子撒氣。^幸我很小，不能幫她干什麼，可是我常常看著媽那焦黃的臉耽心地想：“可別惹媽媽生气啊！我要是淘氣，媽媽大聲一喊我，她就更累壞啦！”所以我總是聽媽媽的話，奶奶和媽媽都說我从小就是個懂事的孩子。長到六七歲，我就學會了看妹妹，到大炕上拾柴禾，撿煤渣兒，我總是努力地拾柴禾，撿煤渣兒。從不怕累。因為家裡多存點燒的，就省得媽媽發愁啦。

因為媽媽退休，我十三歲就代替媽媽上班了。臨進廠媽媽囑咐我：“要聽領導的話，要聽姨啊、嬸們的話，你小孩子家啥也不懂。”我歲數小，個兒又瘦又矮，比搖紗車還矮一截呢。一進車間，姨啊、嬸們都疼愛地叫我“小不点儿”。她們都是媽媽的老姐妹，對我格外關心，誰走到我跟前都耐心地教我干活兒，不到半個月，我就把並筒的技術學會了，成了棉紡三廠的正式工人。

一連好几年，我都老老實實地干活兒，每月都能完成生產計劃。我常想：我不過是個小毛孩子，姨和嬸們不比我強，我干成這樣也就可以啦；對自己就沒有更高的要求。每月發了工資，我就趕快把錢拿回家去，交到媽媽手中。看見媽媽不為過日子為難受罪，我就暗暗地高興。前几年，我很怕开会，害怕叫我搞什麼社會活動，因為我總

覺得干那些事耗精神，怕影响生产計劃的完成。媽媽看出我的缺点，就說：“小云啊！剛解放那时候，我鬧着病，弄孩子、作飯，还总参加会，还上业余学校。現在家里的事样样不用你操心，你为嘛不爭取先进呢？生在这个时代，你們年輕人多么幸福啊！”听了媽的話，我受到很大的感动，可是对媽媽的意思还没懂透。这时候，咱們全中國的六亿人口都投入到大躍进的浪潮里，十五年赶上英國的口号喊得山响，特別是青年人干劲可真足啊！我不由得想起自己：年輕人要都象我这样，我們的國家多咱才能赶上英國啊！再說我們祖孙三代都是工人，媽媽在旧社会受尽千辛万苦，是新社会才把她救活的，我是她的女儿，难道不爱新社会嗎？这些日子，工厂里搞工厂史，媽媽想起以前的事，更时常对我說：“小云啊！要不是共产党，你早成了沒娘的孩儿啦！瞧你多美啊，我象你这个岁数，是在活地狱里过的啊！那功夫，我的眼泪一缸一缸地流。”这时候，团也抓紧对我的教育，告訴我不要光爱小家庭，最重要的是爱我們社会主义的大家庭。沒有大家庭，就沒有小家庭。我从思想上对这些問題有了新的認識。

紧接着，又是双反运动，横扫五气。經過學習，我非常吃惊，別看我是个年輕的女孩子，身上可有暮气，要不引火燒身，我就过不了社会主义这一关。也不知从哪儿来的一股劲，我深刻地检查了自己的思想，向团作了徹底的交待，狠狠地給自己貼了张大字报。把这些事情办完了，我忽然覺得渾身都是劲儿。这时候，我們工段的生产关键

是回絲的浪費問題。我就想：我們每個並簡工人每天要接多少頭兒啊，要是把我們車間的回絲接在一塊量量，還不繞它地球几遭兒，可真是個大的浪費！我既然反了自己的暮氣，就應該在生產上有个新的表現，年輕人可不能放空炮；于是我就在縮短回絲上打主意。

以前我們接頭為了快，總是把紗拉過來就接，回絲往往是一大團。現在我每一接頭就把紗比齊了才接，剩下的回絲總不叫它超過 0.5 寸（我們的計劃是 2 寸），起初動作慢些，習慣了也同樣快。這件事被我們的副工長發現了，就跟我說：“李惠云，你這回絲短得很，這很好，可是只剩下这么一点点毛絨絨，別影響質量啊！”我一想，副工長說的有理，應該好好驗驗。可是當我驗的時候，不光知道了對質量沒影響，還發現我們這個工序上的紗接頭的地方捻度很大，還可以縮短回絲。一試驗，又成功了，又節省了不少紗。這一下，可把我們的同志支書記樂壞了，他逢人便說：“李惠云在雙反里的表現可真突出啊！主要是她在思想上邁進了一大步！”立刻在我們工段的青年工人里掀起了一个“追云運動”。各班的姐妹們都要求我把操作法表演給她們看。

表演這天，我既是最愛最喜。我的周圍圍了很多姐妹，她們不錯眼珠兒盯着我兩只手怎樣動作。我剛表演完了，一抬頭，忽然發現曉鶯、曉鶯也站在旁邊瞧着我呢，我不由得一陣顫慄，心想：“曉鶯！曉鶯！姐姐們！我這一切都是你們給的呢！今后我還要向你們好好地

學習！”可是我被
感动得嘛話也說不
出來。

最近領導上要
送一批先进工作者
到北戴河去休養，
我就是其中的一
个。當我在家中收
拾行裝的時候，媽
媽又向我嘮叨起老
話來。媽媽啊！現
在我完全懂得你的思想了！我一定要努力地干，在建設社
会主义的劳动中，把你的勁兒也使上！

（袁鶴鳴記、夏 峰整理）



走过的路

刘荫福

八岁来到天津

盧溝橋事變那年，我才八岁。日本鬼子的鐵蹄踐踏在我的老家獨流鎮上，全鎮立刻變成一片血腥的火光，老百姓隨便被屠殺，慘死在街頭上；青年婦女只要被鬼子看見了，就不能逃過他們的蹂躪。這個地方實在不能呆了，老百姓紛紛逃難，我爹我媽也帶著我和二姐、妹妹，全家逃到天津，投奔我的哥哥和大姐。

哥哥和姐夫都是公大紗廠（現在棉紡二廠）的工人，他們掙的錢連自己都不能養活，哪顧得上我們！媽媽只得攬些外活作，我和二姐、妹妹給人家糊洋取燈盒兒，娘兒幾個整宿地抓撓，也糊不上口。沒過二年，爹和媽都連餓帶愁地死去了。這以後，給二姐尋了个主兒聘了，我到公大紗廠當小工。沒過半年，我和哥哥一塊兒被開除了。哥哥被逼得下了關東。我和妹妹住在姐姐家里，沒得吃，我就跑到大洼拾白菜邦子，揀柴禾。冬天，裕大紗廠（現在

的棉紗三廠）招工，我才到那去穿鎗。

漿子吃

那时候，工人的肚子里連山芋干、果仁餅都裝不滿，餓得渾身一點勁兒也沒有，走起路來象喝醉酒似的，晃晃悠悠。就是这样，一天還要給鬼子干十二個小時的活兒，可真是苦呀！有一天，大約夜里兩三點鐘，我正餓得眼前發黑，沒心思干活兒，忽然看見漿紗的老孫和小三他們，站在漿紗機前面，一人捧着一只碗，很高興地吃東西。吃到最後，把碗整個扣在臉上，用舌头一遍一遍地添；有的還拿手指頭抹碗邊兒，然後放在嘴裡吮。吃什么吃得這樣香呀，我的肚子里叫得更响了，餓得直咽口水。老孫一抬頭看見我，趕緊說：“小刲，快來吃，晚了可就沒啦！”我赶快過去，老孫遞給我半碗白呼呼的稀粥樣兒的東西。這時，有一個大哥很緊張地喊了一聲：“來啦！來啦！”人們很快地散開了，只剩下老孫和我，這下可把我吓壞了。老孫直催我：“快吃，快吃！”我一邊吃着，心一個勁的哆嗦，這白呼呼的東西真香真甜呀！象杏仁茶似的。這時，又聽那個大哥小聲說：“好了，過去啦！”我這才放心，問老孫：“這是什麼？”老孫笑迷迷地說：“杏仁茶，好吃嗎？”又說：“傻孩子，你不知道，這是漿鍋里漿紗的漿子，可不許說呀！”我点头答應。

那时候，工人們經常挨餓，要不是偷點漿子吃，真有活不過來的危險哪。

我參加了罢工游行的斗争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跟大老美进了天津，工人們还是沒过一天好日子，东西漲錢漲得厉害，特別是吃的。工人們仍是吃果仁餅，山芋干，連頓樣子面也混不上，偽工会的代表馮老头，胸前挂着个大围裙，裝模作样地在车间晃来晃去，給国民党当耳目，处处算計工人們。工人的生活真是苦不堪言！

一九四六年的五月份快到了，工人們忍无可忍，就由上軸工老尚带头，大家一塊签字按手印，向厂方提出每人給五斤白面过节的要求。大家商量好了，过兩天沒动静就罢工游行。兩天过去了，厂方連个屁也不放。布場來人給我們送信：“可注意听啊：布場的机器一停，你們就別干啦！”我們这群小姑娘别的也不懂，就是知道工人們沒吃的，过节非要白面不可，这个要求完全合理；我还这样想：哼！看你們怎样办吧！大家都鬧起来啦，反正不能都开除。再說干这十二个小时的活儿好膩歪，正好上外邊風光風光；我的心早长上翅膀啦，老是側着耳朵听布場的动静。果然，布場的机器声慢慢地低了，更低了，最后完全听不見了！我們都跳起来，把圍裙一摘，就随着大伙跑出去，还嚷着：“咱們不干了，看誰敢管！”也不知是谁糊了那么多各种顏色的旗子，我們一人打着一个，隨着大队浩浩蕩蕩地走出工厂。为首的几个工人手中还拿着鐵棍子，領着大家喊口号，喊声惊天动地，真有万夫难挡之勇！

我心說：“这才好哪！早該這樣鬧一鬧！”

过了摆渡，刚到挂甲寺，前面的队伍高声喊：“打倒大槍队！”“誰管就打倒誰！”我們警神一看，前面果然有好几个背着大槍的人，立眉怒眼地監視着队伍。当时誰怕这个！口号喊得更响，脚步走得更猛。就是我們这帮小姑娘也都把心一橫，互相說：“咱們这么多人，才不怕哪！死就都死，活就都活！”

过了一会，队伍忽然停住，前面傳過話來：“回去干活吧，他們答應咱們的要求啦！”我們信以為真，就回來了。誰知道這次上了敵人一个大当，他們不但沒有答應我們的要求，当天晚上就把为首的和尚逮走啦！

在反动派的血腥鎮壓下，工人的罢工斗争暫時消沉了，我的心里非常难受，跟几个小姐妹不断地念叨这件事：人家和尚是为了大家呀，虽然他被逮走了，按理說，咱們还应当接着干。可也不知老大哥們打算怎么办。又听人說：別看和尚逮起来啦，可是咱們的人很义气，都去看他，还給他老娘送吃的哪！那时候，我真盼着大家再凑在一起干一下。

有一次，过摆渡的时候，一个工人大哥偷着跟我們說：“老鄭這個技術員可跟別的技术員不一个味，和咱们穷工人特別講近乎，你們說是怎麼回事？”我們想了一想，果然不錯，这人正派的很，不象别的技术員那么洋里洋气的。我说：“他或許是八路的人呢！”大家都說：“也可能！”原来我們工人文安縣的人特别多，文安是游击

区，从文安来的人常給工人講共产党、八路軍的事儿，我影影绰綽地覺得，共产党、八路軍里的人就是老郑这样的。当时我們常偷着談論这些事，在我們工人的心里模模糊糊地产生了一个說不出来的希望。

解放前夕，工人的生活更困难了，为了吃饱肚子，我們跟国民党反动派作过无数次各种形式的斗争，敌人总是在工人的压力下不得不屁滚尿流，你婆娘就答应嘛。可是一轉臉就把手銬脚镣抖出来，槍刺子逼着工人的胸口，咱們的人隨便被逮走，隨便被屠殺。就是这样，我們还是不断地向他們作斗争。

感謝党救了我

一九四八年的冬季，一連好几天，我一进家，就看見姐姐、姐夫愁眉苦臉地对着哭，姐姐总是吃不下飯去。出了嘛事儿，把她愁成这样？問她也不說。还是同院張奶奶把我叫过去說：“傻了头，你姐姐和姐夫为你都要上吊啦！”于是她把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訴我。原来我姐夫的弟弟是个无恶不作的坏蛋，他爹外号叫“花袄、大辮子”，看見年輕的閨女媳妇就眼饑。爹俩硬逼我姐夫把我給了他弟弟，我姐夫哪肯把我往火坑推？他們就下死命地揍我姐夫，还揚言，专等我姐姐坐月子（那时她正怀孕）的时候打她。最近又發出話來：今年要是不把我給他，明年开春就把我“處理”了。我不甘便默，这一听就象掉在深淵里一样。姐姐和姐夫都是老实人，他們都惹得起地痞、坏

蛋？真要落在坏蛋手里，我就只有死路一条啦！越想越心窄，我不由得坐在姐姐身边哭起来。姐姐見我知道了，就哭得更慘，她發愁明年开春这一关怎么过：把妹妹給他嗎？不！死了也不給；給妹妹找个婆家？不行，太小，要受氣怎么办？跟他打官司？无錢无势，上哪儿找講理的地方去？我們整天講一陣哭一陣，觉得实在沒路可走，心象刀剜似的。

这时候，在工房里听姐妹們說：八路軍快打进来啦，为首的是毛泽东和朱德，他們的神通可大哩，到了哪儿，哪儿的人就过好日子就不受气。为了安慰姐姐，我赶快回家告訴她，姐姐怔怔地听着，听到最后，她閃着泪花笑了，說：“我也听见方圆附近的人們說：‘盼着吧，共产党来了，穷人就翻身了，就不受欺侮了！’我們整天地盼着，在那时，我們晃晃忽忽地知道，只有共产党才是穷人的救星！”

就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候，一声炮响，共产党解放了天津，我們全家立刻喘了一口长气，就好象从十八層地獄里被提出来似的看見了光明。

我光荣地參加了共产党

共产党一来，就把我身上的晦气冲刷掉了，淨遇兒順心的事儿，我看見所有的工人都和我一样，腰板儿挺直了走路，大声地說話，象个主人似的。因为軍代表告訴我們，工厂是咱們工人自己的啊！另外，那些派到厂裡來的老千

都跟工人特別亲热，把头們打人罵人的事儿也不再發生啦！心里高兴，在生产上就带勁儿，那时候，我干活儿可真积极，完全改变了解放前在班上作針綫活儿，蘭聊天的工作态度，因为我知道，今天干活儿是为咱们工人自己啊。

一直到現在，我才知道，老郑是个党的負責人，怪不得他給人那么好的印象。現在他常找我談話，他特別愛問我：“共产党好不好？”我就說：“好！”他又問：“怎么好法呢？”我說：“共产党来了，我就不受气了，要是共产党不来，我就活不了啦！”他就这样慢慢地启发我的阶级觉悟，还把我从生产上抽出来参加妇女學習班，听妇女翻身的講課，很快地，老郑就和我談到入党的問題。我姐姐被旧社会吓糊塗了，她的腦子一时还轉不过弯来，老向我說：“可別跟共产党太近乎了啊，要是把你弄走就回不來啦！”当时我想：走就走唄，走多远我也不怕！正在这时，我因为生产成績的提高，当选为市级劳动模范。老郑就把我帶到第一工人文化宮開發奖大会。在那儿，我看見了黃火青主席，他很亲切地向我伸出手來，我哪見过这样大的世面，哪有和首長握手的習慣？吓得臉紅耳赤，越急手越伸不出来，黃主席慈祥地笑了。一直到今天，他还爱揭我的短儿：“刘蔭福啊，当初簡直是个童养媳妇！”那天的大会上，楼上楼下黑压压的坐着好几千人，非叫我上台講話不可，我只得上去，只說了兩句：“我們妇女翻身了，以后得好好地干活！”别的什么也說不出来。

开完这次大会，我的思想更开朗了，我知道，共产党是劳动人民的救星，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我們才有好日子过；我最后下定决心，向党提出参加組織的要求。姐姐不同意，我就不告訴她。今后党叫我上哪去，我就上哪去。

參加組織以后，受到党的教育更多了，在生产上我不斷地突破定額，一連好几年被选为市級劳动模范。这些光荣都是党給的。

在苏联看見了我們美好的未來

一九五一年四月，有一天，我正在車間里干活，工会女工委員来找我，說：“小刘啊，你可真美，要到苏联參觀去啦！”我說：“去你的吧！我还上苏联，瞧我这德行！”女工委員逗我說：“那好，你不去我替你去。”又一笑，說：“真的，我不騙你，赶快放下活儿走吧！”我还是半信半疑，这时車間主任也來啦，說“小刘！快請客吧，叫你到苏联去參觀哩！”我才相信这是事實，当时我的渾身有一股說不出的美勁儿，我真不知自己是怎样走出車間的。

我不想詳細述說在路上的見聞，只談談在莫斯科的感受吧。

苏联人民对我们參觀团的热情接待真是无法形容，比多年沒見面的亲人还亲，見面就把我們拥抱起来。无论走到哪儿，我們都承受着这种崇高的、真摯的友情，我們就象到了自己亲人家中似的，一点儿也不生疏。

人家苏联的工厂真大极啦！从这个车间到另一个车间得坐汽车，我们参观的莫洛托夫汽车厂就是这样，厂区很大，工人不多，人家的机器都自动化啦！他们的生产真是又多又快，快得叫你觉得神秘。刚还是各种汽车上的部件呢，一眨眼，一架小汽车就安装好啦，再一眨眼就“刷”地一下从车间开走啦。我们一看手表，啊呀！才用了两秒钟。大家正看得眼花缭乱，一个苏联朋友告诉我们：“斯大林汽车厂产车用的时间更短，只要一秒鐘就能按装一部汽车。”我们听了，更是暗暗赞赏。

人家苏联的工厂无论轻重工业，设备都是十分先进的。比如莫斯科的纺织厂，就比咱们的纺织厂好得太多了。当我们走进人家那细纱车间和布场的时候，就好象到了清晨的田野，空气十分新鲜，光线非常明亮，空间没有一点棉花毛儿。即使你的精神很疲劳，一进到这个车间，马上就象洗了一个舒舒服服的冷水浴似的，精神立刻振奋起来。

苏联工人的生活可真幸福极啦！有一次，我们到莫斯科大戏院去看戏，看見戏院门口一排排的小汽车停下来，小汽车上走下来的男男女女都打扮得漂漂亮亮，男的穿着笔挺的西服，打着好看的领结；女的更不用提，穿得花枝招展，戴着闪亮的首饰，我正在奇怪这都是些什么人？翻翻阅志忙告诉我，到这个戏院来看戏的大都是工人。我听得呆了。休息的时候，一个非常漂亮的姑娘边跑边跳地飞到我的面前，没容我站起来，她一下子把我抱住，紧接着

就把她身上戴的項鍊摘下來，給我套在脖子上。她拉着我的手，亲切地說：“我是个紡織女工，今天你們到我們廠參觀，我看見你啦，可是沒有空和你說話，現在可跟你談上几句吧！”我一听是同行，就更高兴。我們倆正談得入迷，一声電鈴响，戲目上演了，就只好握手告別。

苏联农民的生活和工人一样好。有一次，我們訪問一个普通农民的家庭，本来他們事先不知道我們要去的，但一进门就被盛裝的主人热情地接待着，他們从立柜里拿出上等的酒、菜、糖果，滿滿堆了一桌子，一定讓我們吃，并再三向我們道歉，說是不知道我們來，沒能准备更好的食物招待。我們回來說：人家沒有准备就一下子拿出那么多的东西，要是准备了更不知多么丰厚呢。苏联集体农庄的宿舍也蓋得很講究，都是高大的光綫充足的楼房。

我們在苏联參觀的時候，莫斯科的人民正在認購公債，我看見工厂里的工人因为挨不上个，認購少了，就不滿足，就給厂长大提意見。人家認購公債那种爭先恐后的劲头儿可真高。要想把國家建設得富強，要想得到幸福的生活，就必須學習苏联人民这种踊躍認購公債的精神！

苏联人民的生活大大地鼓舞着我，在这里，我很清楚地看見了我們祖國美好的未來。

回国以后，姐姐告訴我的第一个消息，就是那个坏蛋——我姐夫的弟弟，被鎮压了。原来他是个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斗争他的时候，从未出头露面的姐姐也到大会上去講話，控訴了反革命分子对我的迫害。我的精神更加振奋

了，在我們的社會里一切阴暗的丑惡的东西都要被燒掉，一切美好的、新生的东西都在茁壯地成長！我的心里真樂啊！我一定要用我的口、我的手建設我們的社会主义！半年來，我到华北各



地去作報告，向人們講述蘇聯人民的幸福生活。人們都惊奇地說：“瞧這個年輕的女工講蘇聯的事兒講得多帶勁啊！”是的，我永遠要用我的聲音歌唱蘇聯，因為蘇聯永遠是我們的榜樣！

我的女工工作

一九五二年六月，我被選為工會副主席，負責女工工作。當時黨委書記認真地向我說：“紡織廠女工特別多，女工工作作不好，就会影响生產計劃的完成。”我反復思考黨委書記的話，決心把这个艰巨的任務擔負起來。

那時，^參我一走進車間，車間主任就皺着眉向我訴苦：“干嘛，女工主席！我們車間完不成計劃都是你們女工，

小孩子媽媽影响的。”

我听了这话很不好受，回来就了解原因。妈妈们的技
术都不坏；人也个个坚强，完不成计划主要是家务事多，
孩子闹，睡不好觉。我们就发动家属尽义务给妈妈们带孩子。
妈妈的觉睡足了，更重要的她们知道领导在关心她们，生产情绪就高了。这个问题刚解决，又来了新的困难：工厂里的哺乳室因为夏天连阴雨多，快塌了，劳保科怕把孩子砸伤出危险，就小心地把哺乳室上了锁，妈妈们只好抱着孩子在墙根那儿喂奶。天凉了，风呼呼地吹，打着孩子稚嫩的皮膚；忽然落起小雨来，妈妈和孩子都挨浇了。我看到这个情况，一时也无法忍耐，就找到劳保科，请他们马上解决。劳保科的干部说：“现在没房啊，让妈妈们凑合两天吧！”我听了，也不知哪来的火儿，拉起劳保科那个有孩子的女同志说：“走！跟我瞧瞧去，请你說句公平話，要是你小孩能在那儿喂奶，这問題就不用解决啦！”这个女同志的脸红了，全科的人都僵住了，但劳保科长还是强调困难，我和他打到党委書記那儿，問題终于在当天解决啦：妈妈们在温暖的屋子里给孩子喂奶，都很高兴。从此以后，妈妈们有了困难，就主动到工会来找我。那时候，我的满腦袋没别的，总是孩子妈妈。只要知道她们工作上、生活上发生了困难，就想尽办法给她们解决。問題解决得很及时，我就和孩子妈妈们一同快乐；問題沒解决，我就睡不好觉。

經過这一項工作，孩子妈妈们生产劲头鼓足啦，车间

里完不成生产計劃的再不是孩子媽媽啦，而是那些沒有孩子的不肯进步的人們。日子过了不久，有很多媽媽成为各車間的先进生产者，后来有些媽媽成为市劳动模范。我再到車間去时，車間主任笑臉相迎，說：“我們車間的媽媽真棒啊！”

女工政治地位的提高

說起女工政治地位的提高，我覺得解放以来，在我的身上充分地体现了这一点。在工厂里，我参加了管理工厂的工作，人民选举我作市人民代表，一九五三年全国普选，又选我为河东区副区长。特別使我感动的是，一九五四年我又以全国人民代表的身份，到北京去和所有的代表們共同討論国家大事。在那次，我和毛主席、刘少奇同志亲切地握了手，我被感动得流了泪，我真沒有想到，象我这样一个小女工会得到这样多的荣誉，这样高的政治地位！这是



我們時代的特徵！

當我正在恐惧着、害怕自己因為能力的限制，不能很好地滿足人民對我的期望時，黨又在一九五四年把我送到天津市工農速成中學去學習，今年我就要進大學啦！為了報答黨對我的恩惠，我一定要永遠作黨的好女兒，永遠把自己的一切獻給黨！

（夏 婷修改整理）

青年工人王德昌

王德昌 口述

原動保全部的高主任，正聚精会神地看着車間兩旁五彩繽紛的大字報。他看到這樣一張大字報，上面寫着：“我在三年前提的，在油管器上面挂上双机头的建議，為什麼我們原動保全部的行政，沒經試驗就說不行，至今仍未解決，這算什麼氣？”下面署名王德昌。高主任細細地看了之後，就把它記錄在日記本上。

鳴放進入整改階段，王德昌接到了一個通知：“關於你提的意見，我考慮在檢修爐子時可以做試驗。”王德昌看了之後，高興得心裏开了花，說：“總算是到了黃河。”

這是怎麼一回事呢？

還是五年以前的事情。發電廠的蒸汽鍋爐，每一季度要檢修一次。其中有一項工作，是洗鍋爐排管里的水鏽。每一口鍋爐，都有象茶碗口那樣粗、長達兩丈的排管180多根。洗水鏽是檢修鍋爐中很重要的工作之一。水鏽的有無，直接關係到鍋爐的安全和節約。

这时正在检修某号鍋爐。行政組長派李師付領導王德昌等四人組成了洗排管小組來完成這項任務。這一天和往常一樣，準備好了工具，到了時間，大伙走上腳手板動起手來。開動洗管器，將裝好機頭的軟軸，伸到管子里去，隨着馬達的轉動，機頭在管子里，象螺旋槳一樣的轉開了，里邊的水鏽被打的卡卡卡地山響。在這同時，伸進一條膠皮管，開開水門，將摩擦下來的水鏽，沖洗到外面去。每一根管子，洗完一遍，用手電筒照照，檢查一下，若還有水鏽就再重洗。每一根排管都得這樣洗好幾遍。一上午过去了，算了吧只洗了十几根。吃完了午飯，王德昌沒有休息，就來到了現場，兩眼楞楞的望着鍋爐的管子口出神，心里想：“老这么干，來回的洗好几遍，也不出活，眼看完成任務是困難哪。”他的兩只眼睛又轉到了洗管器上，定神的望了一會，“要想提高效率，必須從這個東西下手。”他思索着，猛然間想起，油漆匠油東西，用大刷子刷就比用小刷子出活。從這個道理，他聯想到洗管器的機頭，如果再加上一個雙機頭，整個機頭的身子長了、面積大了，到了里邊搖晃小了，那樣不就既洗的快了，又洗的干淨了嗎？”想到了這個，他高興極了。這一天下班，在操作中他又特別詳細的進行了觀察和研究。更証實了中午所想的不錯，最後他才把这个想法告訴了同志們。工友們聽了，有的說：“可能行吧”，有的搖了搖頭，嘴里“嘿嘿”兩聲走开了。

他回到宿舍里，填了一份合理化建議表。他這樣寫

道：“在洗管器頂有的单机头上面，再增加一个机头，制作方法簡便，不用費多少材料，也不用費多少工时，使用起来效率快。”

第二天一上班，就把這张表遞上去了。但是沒有得到行政領導的支持，行政組長冷淡的看了看，提出兩個理由來：一，怕出危險。二，改进的本身沒多大作用。当时就被駁回了。

王德昌是个鑽死門的人，他打定了主意，不到黃河不死心，決定自己制作，自己偷着試驗，一定要看个水落石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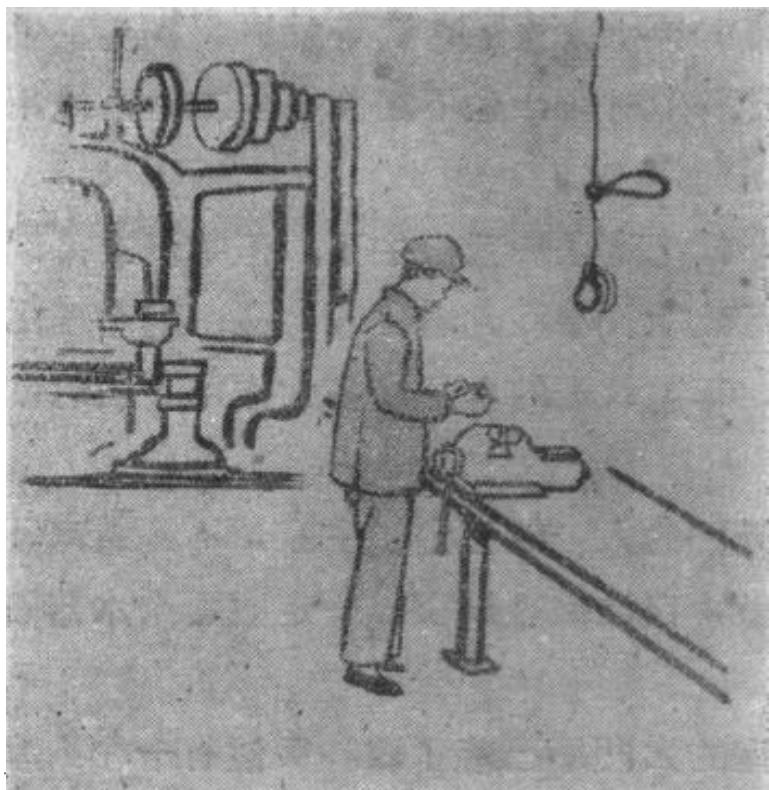
晚上保全修理室的大門早已落了鎖。突然有一个人拿着鑰匙，悄悄地將門打開了。單邊黑的伸手不見五指，那人用手挨着牆，找着電門幵幵灯，只見車床和一切的工具都象睡在那里。他又出來，尋了一塊四分的鐵棍，用鋼鋸截成所需要的短节，按照原来洗管机头的式样，連繩帶鍍加套絲又做了一個，做好之後用鐵好的螺絲將兩個机头串在一起。一看表已經四點了，關了電燈就地胡亂的睡了一覺，第二天早晨飯也沒吃，就上班了。

上班後，王德昌拿着做好的双机头和李師付說：“我昨天做了一夜，做成这个样子，咱们先試試行不行？”李師付看了看說道：“那行嗎？你非得試驗，出了事我可負不了責呀！”王德昌說：“出了事我兜着！”安上一用，嗬！洗出来的管子，就象新安裝的管子一樣的干淨，李師付一看也乐了。結果這一班共洗了70多根，比昨天多洗了

三倍多。

洗管子共分兩個班，接王德昌班的是一位七級工的老师付——孙貴祥。交班的时候，王德昌热情地仔細地把早班的情况介紹給了孙师付。

孙师付托了托老



花眼鏡，側着身子，不在意的看了看王德昌他們洗的排管，心里說：“王德昌，你楞头楞腦地能研究出啥好玩法。我是領導，行政交給我任务，我不能胡來呀。”沉了老半天他終於說：“我們这班不用，亂用机器，燒了馬達麻煩了。”王德昌耐心地說：“我們用了一早起也沒燒馬達，你們儘管用吧，一定不會出問題。”“試試吧！”孙师付不耐煩的說。結果，他們班強捏着鼻子使用了這個方法，也洗了90多根。這件事看來是成功了。但是，第二天一上班，行政組長就找到王德昌說：“德昌，你提的那个東西不行啊，現在洗的多了，有其他的原因，等用長了這個方法，出了問題就麻煩了。”王德昌從前天夜裏就憋着一肚子火，現在再这么一點，馬上就着了，他賭氣說：“你看着辦吧，反正你說了算。”結果這件事就这么擱下了。

王德昌在旧社会里受了很多苦。在他九岁那年，父亲就去世了，一家四口人的生活没法维持，他不得不去给地主干活。母亲也撇下三个弟弟来到很远的裕大纱厂做工。但是尽管他娘儿俩辛勤劳动，一家子还是食不饱肚，衣不遮身。有一次他母亲由于肚里没食，在车间干活的时候，脚底下一滑再也撑不住倒下了，再想站起来，已非常困难，腿肿得象葫蘆肚一般；但在当头的过来查问时，还得硬挺起身子来说：“没什么。”因为要說腿摔坏了，就得立刻被开除出去。这一天她强撑着下了班，一步一步的挪着回到了家。从此以后，每天上下班都由弟弟用推车的小车，从十几里以外的张达庄来回的接送。黄鼠狼单咬病鸭子，事事是穷人倒霉，国民党临完的那一年，他家仅有的两间房又被炮轰塌了，全家逃难，住在一个亲戚家里。天津解放了，王德昌一家的生活起了天上地下的变化。人民政府无代价的贷给了款，帮着他们盖了两间新房。新的幸福生活开始了。工厂里变了样，工人是工厂的主人。领导上为了照顾他母亲的身体健康，在1953年就让他弟弟来替她上了班。德昌自己也在1950年来到棉纺三厂做临时工。过了两年，便正式转到原动机部学习技术了。

解放前后，家庭和自己截然不同的遭遇、变化，这鲜明的对比，使王德昌深深的感觉到新社会新生活的幸福。母亲也常常说：“德昌，要好好干哪！要不可对不起毛主席！”因此，从一九五〇年来厂，王德昌就一心一意的埋头苦干。他工作积极，又要求上进，很快就加入了青年

团，不久又参加了共产党。在党和团的教育下，王德昌的思想更是飞快的提高了，干劲更大了，因此他不断的钻研技术，改进工具。

这两年来，王德昌因为作别的工作，暂时把双机头的试验搁下了，但他心里始终还是惦着这件事。

1957年底伟大的整风运动开始了，展开了群众性的大鸣大放运动，党委号召工人群众以对党负责的态度，对准各级领导的五气进行猛烈的攻击。这时候，王德昌想起了他的双头机，他想：“当时提出来，领导上没有试验，就武断的说不行，这豈不正是领导上的官气吗？”他写了一张大字报，质问了原动保全部的领导。

大鸣大放进入整改阶段，组织机构有了变动，就在这个时候，高主任调到原动保全部来了。高主任是党的支部组织委员，他很重视群众提的意见。他把他们部门的问题，分门别类的进行了研究。然后把整改的意见印在本子上，发到了各个小组。这时候，王德昌和其他同志一样，问题才得到了完满的解决。

这一天高主任通知王德昌，让他带领三个同志，明天上早班，洗锅爐的排管，进行双机头的试验。他一听高兴极了。他找了好几个地方，找他连夜赶制的那个螺絲，不知哪位竟给扔了。他告诉了高主任，高主任马上派人重新做了一个。第二天他们安上双机头，正式的进行了试验。头一天就洗了80多根，高主任知道这消息之后，马上以工会和行政的名义，写了一份捷报，贴在了壁报牌上。

这次洗鍋爐排管，仍是分成兩個班，另外一班的領班仍是孙貴祥老師付。這一天，孙師付上班來，一看通紅的大字報，心里就沉不住氣了。只見上面寫道：“王德昌小組，改進了工具，創造了新紀錄，洗鍋爐排管80多根。”他馬上問高主任：“這是怎麼回事？我們昨天忙的連喝水的工夫都沒有，只洗了二十一根，他們怎麼洗這麼多呢？”高主任笑眯眯的說：“他們改進了一種工具，你們今天也可以試試呀。”孙師付再也沒有言語。這天中班，孙師付那班使用了雙機頭，整洗了五十根。這樣原計劃一星期洗完鍋爐排管，由於兩個班都採用了新方法，只用了三天就完成了任務。這天，孙師付看到了王德昌，認真地說道：“行啊，這東西真快，趕緊提合理化吧！”王德昌笑着說：“已經提完了。”

(王達修 整理)

改造“二十三”部

李景文、董世珍

烏云被東風吹散
太陽照紅了車間
工人臉上露笑顏
齊心大鬧生產
牛馬生活絕迹
工廠大事咱管
在共產黨的領導下
困難似泡沫一般

一九四九年四月間，那是解放後第一個春天。深夜，車間的工人們，仍和白天一樣愉快的勞動着。布場甲班工人劉秉義站在布場大道上，好象在思索什麼，臉上一会儿露出笑容，一会儿又皺起眉头。劉秉義生產比誰也不弱，比技術也數一數二，他的性格溫和，幫助同志也很耐心，所以在群眾當中很有威信。現在，他這樣到底是为了什麼

呢？隆隆的机器声逐渐消失了，这时已是夜深一点，到了吃饭的时间，车间顿时沉静下来，工人们聚集在大道上一堆一堆的吃起饭来；大家一面吃，一面议论今天的生产情况。老李、小王、老韩、小孙，你一言，我一语的说着，这时刘秉义也象往常一样拿着馒头走向每日吃饭的地方。大家正说笑得很带劲，小王突然说：“哟！怎么刘秉义今天还没来呢？”老李回头一看：“那不是老刘来了吗？”小王急忙插嘴说：“刘秉义你快来呀，快坐下一塊吃吧，要没有你我今天可有好菜。”刘秉义说：“嘛好菜？”“酱肉。”刘秉义说：“我的菜也不坏。”小王又搶着說：“每天咱们在一塊吃惯啦，你要不来我心眼里觉着别扭。”刘秉义刚咬了一口馒头，老李说：“老刘，你猜404机号昨天織了多少碼？你可得多猜。”刘秉义说：“50碼。”小王站起来搶着說：“52碼。”

刘秉义接着說：“我提个問題，看看誰猜的着？为什么解放后碼数有很大的提高，而完成整个計劃上还存在着問題呢？”这一句话可把老韩急坏了，把筷子一放象有气似的說：“怎么会完成整个計劃呢？咱们布場共有1000台布机，其中二十三部就有40台是廢鐵，都讓他給背坏啦，那怎么会不影响整个計劃呢？”小孙說：“現在还好的多啦，在国民党的时候，誰歇班就把誰撥到二十三部，我以前就为歇班撥到二十三部去过，誰不知道，二十三部的車不好开，我半个月才織了兩個穗子，机件老坏，把紅牌一立就呆着，二十三部靠近外边門，門也很多，温湿度也不

够，綫也特別脆，經綫停不營事，一斷头就是一樞子，要不就織大窟窿！”一提二十三部誰不头痛呀！大家七言八語的扯起來了。解放以后，都变了，就是二十三部還沒变。

劉秉義很自然的說：“現在我們解放啦，成了工廠的主人啦！我們現在拿个羅絲釘都當寶貝。二十三部，我們現在还能拿他當廢鐵嗎？我們不能眼看着它不能多生產哪！大家想想办法，改造它！”大家誰也不言語，老韓剛要开口說話，机器的隆隆声打破了大家的沉思，開車的紅燈亮了，大家一齊起來都跑到自己的車挡去開車了。

一天过去了。第二天深夜，仍繼續开这个临时小会，劉秉義說：“同志們回去想出如何改造二十三部的办法來了沒有？現在就要看咱們大家的了，常言說的好：三個臭皮匠氣死一个諸葛亮，這個任務就靠我們大家去完成啦！”小孫說：“那些車國民黨時期想了多少办法也不行，咱們能行嗎？”小王說：“你还提国民党，它是用压迫的办法，再說過去是給資本家干活，現在是給我們自己干活啦，那能和過去相比呢？”大家都說：“对，机器是人造出來的，人應該想办法掌握它，不能讓它掌握人呀！”保全工老韓說：“我干了十几年的保全工作啦，我叫它老实听我的，讓它動就動，怎麼能讓它吓着我們呢？我看咱們大家只要开动腦筋想办法出主意，什么困难也會克服掉。”大家又說：“对，決定明天就去！”劉秉義看大家的勁头起來啦，心眼里有說不出来的高兴，就抓住大家的積極性，提出：“我們到二十三部后，要向困難作斗争，哪困難我

們到哪去。要有誓言，不把二十三部改造好决不下車！”

改造二十三部的消息傳到二十三部當車女工孫桂珍的耳朵里。她就和挨着着車的劉桂榮說：“我聽說要改造二十三部，要撥別人來，咱可不能落后呀，別人行，為什麼咱不行？咱和領導請示請示，咱也不走。”第二天，她們果然沒走。她們也要干個樣兒看看，和男工比一比。

战斗开始了，40台車總是停着一半多，可把老韓急壞啦，光着膀子滿頭大汗，拿着扳子修完這台又去修那台，一會蹲下，一會又爬到車底下，忙个不停。劉秉義也幫助拆窟窿，修理小零件，突擊完這台，又去突擊那台，真是干勁十足。這天二十三部比往日顯出人多來了，干活的勁頭比往日也活躍起來。小王等几个人都來看車了，他們互相幫助，也不分車號，那台停了就開那台，那台有毛病就修理那台。但還是開不齊，就有人議論說：放着好車不開來看壞車，少賺錢還不說，多受累呀，也有的人看見車停着就挑大拇指，意思是你們太……

一天过去了，老韓下班回家吃飯，孩子象往日一樣的喊爸爸吃飯，連叫几聲老韓也沒吭声，老韓愛人說：“你又想什麼？还不快吃飯，又想完錢买不到東西是不是？”韓說：“那話？解放後生活一天比一天提高啦，物價會穩定的，不用咱發愁，我想的是工作。”正說着劉秉義來了，一進屋就問：“老韓，咱們今天二十三部干的怎麼樣？”老韓說：“車還是有問題不好開，我看不怎么样。”老劉就出主意，說是別看今天不怎么样，總算是比昨天

强的多啦。大家的劲头算是起来啦，只要大家努力。刘秉义还想，明天纔要是干，还可以用嘴噴水，主要的任务是在技术上减少坏車，把經纐停修好，再給大家明确一下把二十三部車全部打破固定机台这个界限，把这四十台車變成大伙的，那里有毛病，就到那里去修，加强巡迴检查，全体动手，發現車有毛病馬上修，作到不停台。老韓听了連忙点头說：“老劉你說的对。”第二天上班以后，刘秉义就把昨天和老韓研究的問題在碰头会上向大家講了，大家就按着刘秉义指的这个方向在二十三部展开了与机器的搏斗。

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了，車子一天比一天好开了，碼數一天比一天增多了。經過四个月的努力，二十三部的生产出現了新的气象，每台車日产量平均达到四十四碼半，远远超过了原計劃。二十三部机台由廢鐵变成了优秀机台，完全被工人馴服了。二十三部爭得了全布場車間的紅旗，刘秉义、老韓、小王等同志都非常高兴。

报 仇

李景文

这是我一生中印象最深的一天。下二点班的红灯着了，我忙着穿好了衣服，愉快的走出车间。抬头一看通向大礼堂的洋灰马路上，下班的工人，三一群、两一伙的，又说又笑的象流水似的涌向大礼堂。小张喊我：“老李快走啊！要不一会又没座啦！”我紧走了几步，和小张一起走进了大礼堂。里面开会的人几乎快坐满了，我和小张急忙找了个座，不一会儿功夫礼堂完全挤得满满的了。

今天的礼堂可不象往常，讲台正面悬挂着巨幅横联标语，上面写着“民主补课斗争大会”。礼堂两边的墙上贴满了标语，有的标语上写着：“打破顾虑，站稳立场，大胆揭露检举封建把头，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提高政治觉悟……”

墙上的电表指针已指向二点三十分，行政领导宣布开会，大家的议论声一下子停下来。当领导宣布今天的大会是对长期压迫我们，长期骑在我们头上的大封建把头刘耀堂进行严肃处理的时候，大家的鼓掌声震动了大礼堂，

当掌声沉静下来的时候，就把工贼刘耀堂带到台上，这时他尖嘴猴腮的样子似乎看不見了，看見的只是他的禿頭頂。过去穷凶恶極的家伙，一貫作威作福的工贼大把头，今天在工人面前低下头来，他害怕得兩条腿都直不起来了。

台下工人們的气憤簡直压不住，有的喊：“叫他跪下！”正在这时，过去被刘耀堂开除过几次，挨过打，头髮还被揪下一撮子的陈玉珍跑上台去，打了刘耀堂兩個耳光，气的連話都說不上來就暈了過去。大家七手八脚地忙着把陈玉珍送往医院急救，領導上为了掌握政策，不讓打刘耀堂，便向大家宣布說：“你們可以自由發言，訴訴苦，把你們大家多少年来受过的苦水完全倒出来，党給咱們大家撐腰。”

第一个报名發言的是老工人陈林，他是一个老实人，嘴也不能說，但是受的折磨可真不小，虽然他的嘴笨，但是在这个大会上激發了他的憤怒，他一上台头一句話就質問刘耀堂：“你太惡啦！你想不到你也会有今天吧？”

陈林从十一岁上就在宝成学徒，他母亲在裕大揀花，生活混不上，吃了这頓沒那頓，母亲就對他說：“咱們想辦法湊点錢給刘耀堂送点礼，买几斤点心給他，要是你在裕大驗上工，那不就多賺几个錢，好維持咱娘倆的生活了嗎？”話是这么說了，錢从那里來呀？不妨試試去，万一定要驗上不就省了母亲遭难了吗？第二天他就大着胆子去驗工。可巧，一进厂就碰上了刘耀堂这个坏小子，他瞪起两个大眼珠子，倒背着手問陈林，“你多大啦？”陈林說：“十

一岁。”刘說：“这么点儿想来上班，不行！快滚回去。”連驗也沒有讓驗，陈林就回家了。他母亲等他等的直着急。一进门就問他驗上了沒有？他說：“刘耀堂嫌我小，說不行，十一岁不够年龄。”母亲說：“你这个傻小子！你不会說十二岁嗎？”第二天又去驗工，又碰上刘耀堂，又問他多大啦，陈林就說十二岁啦，刘說：“一夜就长一岁，去吧！干去吧！”为什么昨天不行，今天就行了呢？陈林一想，准是礼物給他送到手啦。

剛一進厂，看六根毛棍，因为个小，干活总是开大花，因此，天天挨打，吓得陈林連厕所都不敢去。有一天別的把屎拉在褲子里，也不敢言語，只好帶着屎干活，一直忍耐到下班才回家去。那时候一听见上班的气笛响他就头痛，因为怕挨打，有一次他上夜班，因白天睡不好覺，进厂后打了一个盹，被刘耀堂看見了，上去一个大嘴巴子打的他眼里直冒金花。刘耀堂还說：“再要打晚上家里打去，明天别来了。”陈林忍着痛繼續干活。但是刘耀堂死盯着他不走，因为他个小，往車上放塞管，沒小心掉在地上一个，刘耀堂發怒的說：“好小子，你要造反呵！打完你，你还不服气嗎？你还摔摔打打，你摔打誰呀？”这个老小子湊过来照他臉上，左右开弓，大嘴巴子一連打了五六个，打的他鼻口流血，最后狠狠的照眼上来了一个拳，打了个烏眼青。打完之后，两手一背走开了。下班回家以后，母子倆痛哭一場，陈林母亲說：“刘耀堂这个狠心狗肺的东西，每天我在厂內劳动一天，下班后还到他家給他洗衣服，

抱孩子，不知受了多少累，还买不过这个老小子的心来，仍然見了我儿子就紅眼，不是毒打就是开除，这还有我們穷人的活路嗎？今后有工夫我还呆一会呢；从今以后不給这个坏蛋去受累啦！他这样的人迟早落不了好下場啊！咱們每天吃不飽，还得給他送礼，从今以后也絕不再給他送礼。”

陈林一看母亲气成这样，为了痛爱母亲，以后每天挨打的事情就再不和她講了，可是他母亲却給了他很大的勇气。

第二个發言的是女工李玉荣。她說：“我受刘耀堂的气更大啦，在日本时期因为开大花，叫刘耀堂抓住头髮打嘴巴子，打的尿了褲，也不敢还言，誰要和他还言，他就說誰是八路軍共产党，他想开除誰就开除誰。刘耀堂在日本时期就靠日本人的势力欺压工人，和日本厂长佐藤是盟兄弟，和其他把头赵奎高、高家龙、陈振山、呂嘉禾也是盟兄弟。在1928年，我們工人为了生活，进行了兩次大罢工，刘耀堂对工人假团结，曾召集了四五十名工人，到他家开会，他說‘誰要看見罢工关車的就馬上告訴我，’他想叫我們出卖自己工人弟兄，我們那里听他这套呢？刘耀堂还向日本人买好，曾陷害項瑞英、項瑞印姐妹俩是共产党，后被日本特务抓去。还有王淑田是个学徒工，因車間溫度过高，头晕，向刘耀堂請了兩次假都不准，直到把他热晕过去，才給他家打了个电话，由他繼父将他背回家去，弄到医院拿冰水冰也不見效，一天就死去了。女工王

大妹和劉玉琴也因重病不給假，恥恨身死。那個時候誰要不給他送禮，就開除誰，被他開除的不知有多少人。李小改有一次因干活把手碰破了，劉耀堂說：‘那怕什麼？’就把車上的黃油給他抹上了點，‘去吧！干活去吧！’後來手就爛了。我今天不仅把我的苦水吐出來，也在這個大會上替死去的姐妹們控訴！劉耀堂 現在解放了，你還想像過去那樣欺負我們嗎？在共產黨的領導下，是萬不能啦，現在我們工人階級當家作主啦，我們現在已經站起來啦 最後我要求政府對這個萬惡的分子嚴加懲辦，給我們報仇！”

……大會的氣氛越來越激昂，人們高呼口號：“打消顧慮，大膽揭發！”“給死去的同志們報仇！……”

正在這時，台上出現了人民法院的工作人員，當場宣布：大封建把頭劉耀堂罪惡多端，長期騎在工人的頭上橫行霸道，引起群眾公憤，根據群眾要求與他的犯罪事實，宣布將劉耀堂依法逮捕。

會場上工人們的掌聲象暴風雨般經久不息。隨着兩名人民法警將這個萬惡的把頭，在工人面前拷上了雙手，押出禮堂坐上汽車飛奔出厂。

通過民主補課運動和斗争大會，提高了我們的政治覺悟，進一步体会到黨對我們的溫暖。就是現在，每一想起民主補課的情景，心里就立刻增加了几分力量，感到我們生產如果不好好搞，对不起党？

革新能手孙宝魁

孙宝魁 口述

模范就有模范样，
英雄就有英雄胆，
不怕难来不怕苦，
外行硬把内行套，
昼夜苦战二年整，
砸断化学神秘锁，
化学镍子制成功。
振动全国美名传。
要问此人他是谁，
就是劳模孙宝魁，
要问他文化有多高？
初中还没有上完。

迫出家門

早在三十多年以前，那时孙宝魁还是个小孩子，父亲为了养活这家人，忍受着痛苦，用高价租种了地主四亩地，一年到头不够吃，父亲每逢别人红白喜事时去帮帮忙，给人家扛个活，做做饭，再要不够了，就把他娘几个送到老娘家去。天长日久还是不行，父亲一赌气，就离开了家乡——香河，跑到了天津卫。

到了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怎么办呢？只好流浪在街头上，给人家扛活当苦力。慢慢的熟习了，就拉胶皮，逐渐求人告友找个地方做饭。母亲在家也过不下去了，就带着宝魁和妹妹找到父亲这里。在那个年月里，他父亲就是饿着肚子，也养活不了他娘几个呀，宝魁没办法，上街去拾煤核，母亲给人做点零活，再拾点菜叶，就这样将就活着。苦难的日子一天一天的压着他们，父亲因为日以继夜的劳累，又没东西吃，慢慢的就病倒下了。眼看着家里老小挨饿，急的宝魁直哭。没有办法就求人找了个事，到楊庄子裕大紗厂（现在天津國棉三厂前身）学徒。

宝魁刚十六岁，听说有地方吃饭了，就高兴的说：“这回我可能养活爹了”。谁想到满不是那么回事。进厂以后，日本人就把他送到木管去学徒，刚一进厂工资是一毛八分钱，别说养爹，就是自己吃咸菜也不够呀。一天让他干十二个小时活，不好就是一顿板子，打的他头上大疙瘩套小疙瘩，自己还不敢言语。这样鬼子还不解气，又让他

去掄压力。一个小孩子，那能掄得了呢，不掄就是一頓板子，没有办法，他只得哭着找来一条一尺多长的板凳，这才和压力一样高，狠心的鬼子就讓这么小的孩子掄了三年压力。他个子小，力气又不足，哪能受得住呢？累的宝魁回家趴在炕上起不来，每回一听上工笛响，就吓的倒在媽媽怀里哭。可是媽媽又有什么办法，只好哄着說：“孩子，沒办法，沒有吃的，咱家又沒房子沒有地的，等你长大就好了！”可是自己却偷偷的落泪，每天領着妹妹出去拾菜叶吃，有时逢上好点的，就拿回来給宝魁留着，大家都瘦的象干柴似的。

最慘的还是在民国二十八年，那正是天津鬧大水的时候。父亲由于劳累过度，沒錢医治，几天就死了。父亲的死給宝魁更增加了痛苦，家里要錢沒有錢，要东西沒有东西，大水象凶神似的四面八方包围着楊庄子，有誰來管呢？实在沒有办法了，他找到一个什么于九爷，好話說了八車，这才借了一塊門板。宝魁把它釘了一个盒子，把父亲的尸首裝殓起来，由鄰居帮忙，抬在砖堆上放了二个月，水下去了才埋葬。这时家里更加困难了，自己一看沒有办法，只得下班后再到新倉庫一帶給人扛草做苦力。一天工作十二个小时，晚間再去扛草，日夜折騰，一个小孩子那受得了呢，經常干着干着活就暈倒了。母亲一看实在沒有办法，整天哭的兩眼肿肿的，忍受着痛苦，又把自己的十四岁的閨女送到了裕大紗廠。就这样一年年还穿不上衣服，媽媽常說：“几时才能熬到头呢？”

換湯不換藥

日本投降以后，孙宝魁心里很高兴，他想这回可好了，再也不用受气了。谁想满不是那么回事，正象有的工人形容的那样：

日本投了降，
出来个国民党，
把头爪牙真猖狂，
有事无事串閭轉，
工人真是遭了殃，
一年当中三大节，
节节都得把礼上，
要不就別想进厂。

宝魁說：“这真是換湯不換藥”。日本剛剛走了，国民党的接收大員又耀武揚威的跑来了。他們象瘋狗一样，进厂就咬上了工人。在那个时候，哪有穷人走的路呢？他不来还好，这一来，狗腿子、爪牙、流氓可猖狂起来了。进厂就成立所謂“工会”。这哪是工会，实际就是把头爪牙的聚集所。他們在这里时时刻刻算計着工人，一个不好，不是打来就是罵，开除成了家常便飯。每逢三大节——五月份、八月份和春节，他們还要在工人身上作买卖，用低价买来的东西高价售給工人，誰要不买，可就成了对头。到了一定時間，你还得給工头打点“人情”，要不就別想

吃这碗饭。

一次宝魁在木管部里正干着活，伪工会上主席李洪君嘻皮笑脸的拿着文明棍走进来说：

“孙宝魁干嘛呢！”

“涮油漆啦！”宝魁随声应着。李洪君得寸进尺的走到他的跟前小声说：“唉，有油漆吗，给我来点！”孙宝魁一时转不过劲来，抬起头看了他一眼，就向他说：“你要它干嘛用？”他说：“嘿！你不知道我娶媳妇吗。”宝魁一听就楞啦，接着说：“你娶媳妇用厂里油漆干嘛？”李洪君一听事不对，苦笑着脸说：“哎，我不是胡闹吗，你当是真要啦！”他说完转身走出来，从那天起他就盯上了孙宝魁。一天下午刚下班，一群爪牙跟上了孙宝魁，等他一出厂，就给包围了，一个人上手就把孙宝魁揪住，随手就要打他，这时一个人拦住说：“先别打他，李主席喜日子快到了，还用他呢！”那人说：“好，今天让你多活会，你心里要放明白点，李主席喜日子快到了，误了事我再找你算账！”这群爪牙转身走了。孙宝魁第二天一上班，李洪君装着一本正经的，走到他跟前说：“晚上有空给我油汕门去！”就这样，孙宝魁白天上班，晚上到李洪君家给油漆门窗，一连干了好几天，不但分文不给，还得赔上油漆，事后又给他送了点礼道了歉才算完事。气得孙宝魁说：“这和小日本在的时候有什么两样啊？我们受气还有个头吗？”

解 放

一九四九年，天津解放了。孙宝魁高兴的說：“这总算熬到头了！”

解放，这是多么令人兴奋的事呀！裕大紗厂隨着社会的改变，也改变了過去的面貌。在共产党領導下，工人成立了自己的工会，接着就取消了几十年来的万恶搜腰制度。工人們可以自由的出入了，再也不受任何人的限制。厂里为了照顧工人，建立了疗養院、保健食堂、职工医院、托儿所、幼儿园、圖書館、俱乐部……等等，极著的提高了工人阶级的地位和生活水平。

孙宝魁当上了工会組長和技术員，亲自参加了工厂的管理，生活得到了改善，再也不愁吃不愁穿了。他亲身感到了党的温暖。他总說：“党对我这么好，我用什么报答党呢？只有好好的工作了。”

創造洗槽机

一九五一年的三月間，在一个星期六的傍晚，孙宝魁吃完飯，松心地向原動部澡塘走來，他剛走進鍋爐房門口，突然發現一堆木管（粗紗管），他奇怪的过去看了一眼，并向工友問了一声：“这是干嘛用的？”“生火！”一个人不怎么在意地回答。孙宝魁一听又接上了一句說：“这不可惜了嗎？”那人粗声粗气的說：“可惜也沒办法，大房檩子还燒火呢，別說一些破木管了！”宝魁一听不对

劲，紧走一步，拿了个管子看了看说：“别烧，这东西修修还能用！”那个人不耐烦的说：“修嘛！这破玩艺还修？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日本在时都修不了，别說咱啦。”宝魁一听这话心里象被石头堵住似的，一声不响气呼呼的走出厂来，到家把手巾一甩，趴在桌子上象受了委屈似的，刹那间在他思想里出现了日本鬼子野田凶象：一个张牙舞爪的日本人，站在他的眼前，指着宝魁鼻子说：“我们日本人在时，你们可以进厂干活，我们要是走了，你们别说织布、造梭，就是连线也纺不出来。”宝魁想着想着掉下眼泪，拳头敲打着桌子激动的说：“难道我们中国人永远这样吗？不！我们一定要造管，要织布！”他情不自禁的喊出来，迈开大步头也不回，又向厂里走去。他走到那堆木管旁边，伸手拿出个管来，走进了自己的办公室，左思右想，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他看呀看呀，发现粗纱管底部槽有点毛病，如果经过洗刷和修理还可以用。第二天一早，他就找到了工程师，把自己的看法细细的说了一遍，谁想这位黑鬚子的胖老头没有听入耳，只给了宝魁一句话：“坏了就坏了吧，还修嘛？”宝魁一想能这样算了嗎？不，我是工会组长，应该管这事。于是他转过身来，奔向工会，找到了主席、共产党员邢可慎，把事一说，主席马上大力支持说：“你这想法太好了，如果用人工修可就费事了，你研究研究是否可以用机器操作？你只管大胆的想、大胆的做吧，有什么困难你就找我。”孙宝魁一听，得到了领导的支持，信心可就更足了。

从那天起，宝魁就打算琢磨上廢紗管了。他自己也想：要用人工，这六千多管子几时才能修好？如果能够想出个洗槽机来可就好了。有了这个想法之后，他象入了迷，天天夜里独自一人，趴在桌子上画圖，常常一夜一夜地也搞不出个名堂。日子久了，老婆可就煩啦，他要开灯，老婆就要关灯，有时造成口角。老婆說：“你一天穷画嘛，还想怎么着。”宝魁有气的也說：“反正你早晚会知道！”你一言我一語，鬧的不太合适。

几个月之后，宝魁把洗槽机模型想好了，可是解决不了管子内壁起毛的问题，为这愁的他几天吃不下饭去。一天的下午，他下班回家，路途回理髮室门口，看見理髮师的推子来回移动，收缩力很强，他就联想到自己的洗槽机，如果能根据这个道理，不就可以解决槽内壁起毛的问题嗎？他高兴的又返回了工厂，重新改制了模型。自己一試，左右收缩問題倒是解决了，可是前后不能移动，这怎么办呢？这可又把孙宝魁难住了。他饭也没顾得吃，又进了车间，看着师傅們在纏管。不知怎么，他冷丁發現师傅們在做活时，脚前后有节奏的移动，他象發現了什么宝贝东西似的，聚精会神的看着，自己又想：如果根据这个道理，在洗槽机上接裝一个轉珠卡子不就解决了嗎？他把自己的想法跟工人一說，大伙很高兴的說：“能行，咱们試試看！”工人们连夜为他赶做洗槽机，第二天一試驗，果然成功了。大伙高兴的說：“这回可节约多了！”六千多管子，几天就修理好啦。孙宝魁和大伙一样，高兴的睡不着

覺，看看自己修好的管子想道：“中國人現在不但能紡紗織布，這回還能造管呢？”

打這之後，孫寶魁確是在精神上得到了很大的安慰。後來他又連連不斷的創造了許多種新工具。

創造中國白色大漆

早在一九五六年，廠里任務非常緊張，可是車間里經常發生錯紗的現象，由於錯紗造成不少浪費。這究竟是什麼原因呢？經過查對，發現很多錯紗是由錯管造成的。原來紗管顏色不顯，大小一樣，工人一忙就容易造成錯紗。孫寶魁一看，造成這麼大的浪費，就覺得做木管的也應負責。於是他就想：要是顏色明顯容易區分不就好了嗎？可是自己又一想：本來大漆色種就很少，中國大漆只能配紅的，日本大漆雖說比中國好，可是也只能配些黃、綠以及其他淺色的。要想配成多種色，就必須要有白色大漆，可是白色大漆到哪兒去找呢？日本在時也曾研究過，但是沒有成功。自己又想，這東西要長期用進口貨也不行，難道我們就不能造點好的嗎？於是孫寶魁就琢磨上了大漆。

一天的晚上，木管部裏靜悄悄的，只剩下孫寶魁一個人。他坐在椅子上，拿着中國大漆和日本大漆對比着看，他越看越入神，一時想起日本鬼子在時野田曾說過的一句話：“日本造的大漆，也是用的中國料，不過你們中國人可就造不了。”孫寶魁也曾問過他這是為什麼，他說：“沒什麼，可就是不能告訴你們。”寶魁越想越生氣，發誓

說：“我非搞出來不可！”

當天晚上，他就把兩種大漆做了試驗，在他第一次加熱時，發現中國大漆發混，經過過濾找出許多雜質。他把這種漆漆出後，發現光度不好，接着他又做第二次第三次……經過兩個月之後，他發現中國大漆加熱到一定程度，就出現了水，把水過濾後，再加10度到40度的熱量以後，大漆又逐漸變為金黃色，而且慢慢發出光來，把它漆出以後，不但光好，而且勝過日本大漆。

中國大漆試驗成功以後，使他信心就更大了，他又想起了白色大漆。開始他把立德粉配在大漆里，一試雖然起了一點變化，可是沒亮光。他就想怎樣能讓它發亮呢？一次他看見玻璃，感到這玩艺不錯，就把它搞碎磨成粉末，摻在大漆里，試驗后光雖好點，可是粗得沒法用。自己有點灰心，就把它放下了。黨支部書記知道以後，對他說：

“白色大漆對我們來說很有用處，有了它咱們就不至于造成這麼多的錯紗，一個人作事总有失敗和成功，只要用心鑽，什麼事都能成。”寶魁說：“我的文化低呀！”黨支部書記又給比例子說：“高玉宝文化比你也不高，人家還能寫書呢。只要肯干就行！”這些話象給了寶魁新的血液一樣，使他的信心更足了。這時正赶上他老婆坐月子，他發現很多蛋皮堆在土箱里。他想：用玻璃太粗，這玩艺不行嗎？他就把丟下的鷄蛋皮一個個拾起來，把它晒干，磨成粉末，配在大漆里，經過試驗一看不行，不但是漆軟，而且光度還沒有加玻璃的好。這可怎麼辦呢？可把寶魁難

坏了，一天天愁的飯也吃不下去，覺也睡不好，老婆看他逐漸削瘦，心里也痛他，每天回來都要買好的給他吃，一次他吃着飯，發現桌子上有個細磁茶碗，他一看它的光和色都很好，順手把它放進口袋里。飯后他又回到廠子里，把它砸碎，也磨成粉末，配在大漆里，一試驗不行，他又摻上一點蛋清，結果倒是出現了一點白色，但是效果不大。自己一生氣，走出工廠，正好路過第二工人文化宮，他順腳走進了圖書館，在那裏翻閱着圖報，接着就找一些化學書看了看。在一本書裏，他突然看見有這樣記載“……立德粉和硫化礦加上太白粉可以製造白色球鞋。”他一想：可不正是太白粉是專門提白的呀！于是他象懂得了什麼新鮮事一樣，飛快的跑進了工廠里，把黑色大漆拿出來，配上太白粉……試驗效果很好，經過攪拌以後，出現了漂白的大漆，他把它漆在木管上，發現又有点渣滓，他隨手又摻上一點磁土，他知道磁土是堅固的東西，經過一夜的試驗，就在一九五七年一月一日正式試驗成功了。消息傳出以後，全國各地都來參觀這個獨一無二的“中國白色大漆”。他為我們國家又一次增加了光彩。

創造化學梭子

一九五八年是“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時代，工農業都在大躍進，紡織業當然也不能例外，它要給全人民生產出更多更好的棉紗棉布，來滿足人民的需要。生產的高速發展，生產中機物料的消耗也就大起來。梭子，是在紡織

业中不可缺少的东西，市面上是供不应求的情况。怎么办呢？这就必须自己想办法。厂子里搞几把梭子倒还可以，可就是没有原料。因为这种东西不是一般木料可以作的。所以厂子里一再号召大伙技术革新，孙宝魁当然也不落后，就积极的响应了。开始他琢磨这种东西是否可以用化学原料代替呢？自己虽然是有了这种想法，可是不好意思说出来，怕搞不成让人笑话，所以自己就不声不响的悶着干。干了一个时期，也没搞出个名堂来，自己也很别扭。一天厂里买来了一批化学板，他就跑到材料科问这是从那买来的，人家告诉他是从北京买来的，他又追问材料员说：“这是用什么原料作的呢？”材料员说：“是用尿素和福而加林作的。”孙宝魁听了之后，就拿钱买些尿素和福而加林，试验了二十多次，也没有成功。不但如此，而且还不能溶在一起，自己实在没有办法了，就买一些化学书，一点点琢磨，一碰生字就问问别人，后来看到书里说石炭酸可以做塑料，他经过几次试验还是不行。没有办法了，他又找到了材料科，问人家那有作料的，人家告诉他，天津电木行做，他就开了一封介绍信，找到了天津电木行。

这个电木行，是一个刚刚公私合营不久的厂子，他拿介绍信一问，谁想人家一句也没有告诉他，他扫兴的又走回厂子里。过几天他愁的没有什么好办法，就下定决心再去看看，这次他碰见一位妇女，据说是经理的太太，她或多或少懂得点化学原料，人都称她为郭太太。她虽然懂点

塑料，可是誰也不告訴。孙宝魁問她說：“化學板是怎么做的？”她說“很簡單；”要問她塑料怎样配的，她只說一句“火候”，你要再問她多大火候，他只說“凭經驗！”除此以外，你再也問不出任何材料来。为了解她这一点材料，宝魁每逢星期都到这里来，不是帮人家干点活，就是和人家搞好团结，天长日久，这位郭太太也就不耐煩了。

一次，孙宝魁和这厂里采購員錢福林打上了交道，兩人說長道短的慢慢就扯起他买材料的事來，孙宝魁問他：

“你經常买什么材料呀？”他說：“我过去买些石炭酸、福爾加林还有安母尼亞。”宝魁一听有安母尼亞，心里就暗暗的記住它，再問他对到什么比例，他可就不知道了。宝魁回來以后，前后化了五十来塊錢，买来各种化学材料，一点点的配着。時間长了，老婆就問他說：“你最近总要当家，錢你把着，为什么总吃不到好菜呢？”宝魁一听，就支吾着說：“我不是留錢給你买新衣服穿嗎？”她一听这个也就不追了，可是她那知道宝魁用这錢搞試驗了呢。日子一长，党组织發現了，为这事还說过他，給了一些补贴，并且还給他找来大摺材料，从物质上精神上給了他很大支持，甚至有时讓他脫产来搞研究，这对他革新起到重要作用。在一次試驗压力时，党支部書記李长荣常常跟他干到深夜，具体指导，亲自动手帮助他安裝，这对他起到很大的鼓舞，他感动的說：“要是沒有党的支持，我早就不搞了。”党就这样日夜帮助他，终于找到了配塑料的規

律。一天，他把自己配好的料，拿到天津电木行，郭太太一看吃了一惊說：“你們工人可真行呀！到底叫你搞成了。”他一边看着一边問：“你是怎样配的呢？”孙宝魁毫无保留的說：“我是用1:1的石炭酸和福而加林，用 $\frac{1}{10}$ 的安母尼亞配的。”郭太太說：“我們过去用的安母尼亞比你們少，看起来还得向你們學習呢！”宝魁說：“这倒不然，你們有經驗，我們不过才摸索着干呀！”郭太太接着說：“不見得，你看我們的質量还不如你們的好哪！”从此以后，她們就更客气的来对待宝魁了。孙宝魁找到这原理之后，就用厂里的破布碎紙綫头等，經過壓力，在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三日，創造了空前未有的第一把“化学梭子。这样一来，可以給国家节省大批木材，而且还保証了質量。随后他又創造了塑料的大理石。他这种苦鑽苦干的精神，启發了厂里很多工人，成了职工們的一面旗帜。几年来由于党的教育，他的觉悟也大大提高了，今年11月間他被光荣的批准了火線入党。現在他日夜不倦地在工作着。不久的将来，他还会發明創造出更多新的东西来。

（王永春 整理）

“五好”党员刘淑珍

张国英

刘淑珍家住在葛沽附近的一个小村子里。她经常吃不饱，穿不暖，两个哥哥都在地主家扛活，大哥有时从地主家里偷着带回一塊兩塊谷子面做的饽饽給她吃。那年日本人虽然投降了，可是新来的蒋介石“中央軍”并不比日本人好一点，照样在乡下胡作非为，燒杀淫掠。刘淑珍的父母看看已經长大的闺女，心里非常耽心，他們想：“十七岁的大闺女，放在家里，說不定什么时候会出乱子呀！”再加上生活非常困难，因此就决定讓她跟着姨姐来到“中紡三厂”，当了一个筒搖成車間的筒子学徒工。刘淑珍就这样离开了虽然穷但是温暖的家，和其他小徒工一样，挨打受罵的在国民党的統治底下过了三年的奴隶生活。

解放以后，刘淑珍的父亲分了地，后来又入了合作社，生活越来越好，刘淑珍自己在厂里也当了主人，她的阶级觉悟很快的提高了，工作也越来越积极，一連几年被評为

先进生产者，并在一九五六年光荣的参加了共产党。

这一年，我們的棉花減產了。棉花跟不上紡織工业的生产需要，为了多快好省的建設社会主义，领导上号召工人們节约用棉。刘淑珍参加了一次天津市紡織厂向局報告完成节棉計劃的报喜大会。她听到天津各紡織厂节约了棉花，心里很高兴，心里想：众人拾柴火焰高，节约用棉得从一点一滴的小处下手，因此，她就在自己車間找节约的窍門，經過很長時間的觀察和思考，她發現在筒子工序上回絲多，浪費大 是主要的关键，因此决定在实际工作中摸索經驗来消除这种浪费現象，第一次試驗，她采用插紗挂線时握持管紗線和筒子上的綫头对齐的办法来縮減接头回絲。这个办法虽然縮短了回絲，可是，因为找筒子上的头太慢，特別耽誤生产時間，所以也不能推广，于是就又在自己的車上想出接头时用右手縮筒子上的綫头的办法，这回試驗起来就不象原来那么慢了，可是又感到这个办法虽比第一个办法强，但兩根綫头只有一根是短的，針對这种情况，她又繼續鑽研，在操作上又想出筒子上的綫头可以縮短，經過一番熟練，果然效果很好，既能减少回絲，又能加快操作，接头回絲由 1.3吋 減少到 0.6吋。到 0.6吋时再不敢短了，因为綫头上的綫有些發毛，害怕影响質量，她的回絲从过去每天平均出3.4錢，減少到0.6錢。

她把这种情况及时向领导上报告以后，领导上就組織工人們學習刘淑珍的先进操作法，开展了节约回絲的生产竞赛。领导上每天公布每个人出回絲的数量，有很多工

人在刘淑珍的帮助下节约了回丝，可是也有的工人不願學習這一經驗，怕影响产量，老工人張大轉就是这样，她學習了刘淑珍的工作法以后，她出的回丝一天长，一天短，不巩固。刘淑珍当时担任小組的技术检查員，看到張大轉执行工作法不巩固，就特別注意張大轉的操作，可是張大轉在刘淑珍检查时，她执行操作，并說：我和你的回丝一样长，刘淑珍同志看了半天也沒看出毛病来，刘淑珍同志当时一連检查了好几遍，可是总也看不出她的操作方法有什么毛病，張大轉看到刘淑珍老检查她的操作，她心里發了火，粗声粗气的跟刘淑珍說：“你看，我的回丝不是和你一样嗎？你干嗎老检查我？”刘淑珍同志只好仔細觀察張大轉，經常了解她的生产情况，原来張大轉在刘淑珍检查她的时候她执行先进工作法，可是当刘淑珍走了的时候她又用她的老法子干活，于是刘淑珍在一天下早班的时候，就带着自己的鉤刀和一个紗在更衣室里找到了張大轉，她說：“大轉，別走！咱們再研究研究操作法吧！”張大轉很不高兴，和刘淑珍說：“你不上业校，我还上业校！”刘淑珍从腰里掏出了鉤刀和一个紗讓張大轉再表演一下操作法，張大轉拿出刘淑珍的鉤刀就开始表演操作，当張大轉的繞头結好以后，刘淑珍發現張大轉的兩只手都往外拉線，而不是右手往內拉，因此不但回丝长，結头接的还不紧，原来張大轉嫌刘淑珍右手往怀里拉，动作有些别扭，費事，就不按她的办法去做，所以張大轉执行刘淑珍的工作法，产量就下降，張大轉怕影响产量，也怕影响自己的

計件工資，因此，她就不願意執行這個工作法了。當時劉淑珍就跟她說：“產量要緊，可是節約也要考慮，光顧產量，浪費了國家財產這不是一對一嗎？動作熟練就好了，產量不會下降的。”劉淑珍說完以後，就趕忙跑回家拿書去土業校了。

張大轉經過劉淑珍的幫助，回絲很快的就達到了計劃。有的老工人強調自己腦筋慢，手笨，不願學習新的操作法，劉淑珍就攏着手教她們，一直把她們教会為止。就這樣，全車間合絲工人都學會了劉淑珍的操作法，給國家节省了大量的財富。

劉淑珍不光勤于教別人，她也勤于學習別人的長處。1958年2月份針織廠工人在使用三廠的筒子紗的時候，發現松筒子很多，嚴重的影響了針織廠工人的生產。當時，兩個廠的領導上就決定召開座談會，兩廠工人互相交換了意見，筒子車間工人的代表了解到針織廠工人的生產情況以後，一個個心裏都很难過，決定回到車間開展消灭松筒子的運動，劉淑珍當時因為產假，沒有參加這個會議，產假期滿上班的時候，她聽說要消灭松筒子，就虛心請教車間出松筒子少的郭劉氏，當時別的工人都說郭劉氏松筒子少，是她的一號車好紗，沒什麼可學的，可是劉淑珍沒有理會這些話，却想着，既然郭劉氏的松筒子少，就一定有窍門，果然她虛心向郭劉氏學習了操作方法，回來就在自己的車上進行試驗，使勁用手按一下車上的筒子，讓它和滾筒挨緊了，另外用三個不圓的筒子做試驗。經過學習、

試驗，松筒子也減少了。以後劉淑珍又听说許楓欣完全消滅了松筒子，他又每天上班早來、下班晚走的向許楓欣學習消滅松筒子的先進經驗，許楓欣是解放後進廠的新工人，論技術，論經驗都不如劉淑珍，可是劉淑珍不管這些，她說：“只要人家有經驗，不管是誰，我都願意學。”平時，劉淑珍聽到別人對自己的工作提出意見時，她总是從心眼里感到高興，就是在她給別人表演先進經驗的時候，她也不斷的征求別人的意見來改進自己的操作，抱着這種虛心學習的精神，劉淑珍同志很快的學會了郭劉氏和許楓欣的操作法，並且加以綜合改進，使工作法更加簡便，就這樣她完全消滅了松筒子。全廠的工人們在劉淑珍的帶頭下，松筒子大大減少了，提高了產量和質量。

秋天，廠里搞高速化運動，要苦戰才成。工作越來越緊張了，劉淑珍有好几个孩子，並余給孩子們做棉衣的時間却越來越少了，因此，她決定把幾個大孩子的棉衣服送到副業組，兩個小孩子的棉衣請奶奶給慢慢的做。苦戰當中，劉淑珍同志不斷向自己的婆婆介紹高速和苦戰的意義，使婆婆思想上有很大提高，晚上劉淑珍因為參加了車間苦戰和煉鋼工作，經常回家很晚，奶奶說：“你們這叫苦戰呀！那我也苦戰，你在廠裏苦戰，我在家裏苦戰。”於是奶奶天天晚上睡一覺起來，半夜還給小孩們做針綫活，因為安全關係，房間的電燈線很短，電燈有一人多高，奶奶今年七十歲了，眼睛不吃勁，不在燈檠下就穿不上針，她就把凳子放在炕上，自己高高地坐在凳子上作活，劉淑珍晚上

回家發現了這種情況，馬上就提了意見說：“苦戰要注意安全呀！您這麼大的年紀，坐的這麼高，要是一打盹掉下來不就壞了嗎？”可是奶奶不在燈底下就穿不上針，也就沒法做活，於是劉淑珍就叫十一歲的大兒子和九歲的大閨女幫助奶奶穿針，有時一穿就穿個十來根，奶奶就一顆一顆把它插在紙上，當孩子們都睡了的時候，奶奶就一顆針一顆針的縫下去。這樣，劉淑珍兩個小孩子的棉祆、棉褲，六個孩子的破袜子及一些補補衲衲的零活，全由奶奶做好了。劉淑珍為了照顧奶奶的身體健康，總是幫助她作一些重活，如挑水、洗衣服等等。因為劉淑珍很痛愛自己的婆婆，婆婆也非常痛愛她，在劉淑珍苦戰時期，奶奶總是把六個孩子照顧得好好的，不讓孩子們影響她的覺，因此劉淑珍不論上白班或夜班，不論是煉鋼或苦戰，總是精神飽滿，干勁沖天。今年劉淑珍產假後沒有歇過一次班，有一天她得了重感冒，一会儿冷，一会儿發燒，头痛得很厉害，穿着棉祆還在堅持工作。別人勸她休息一天，她說：“細紗車間等着咱們的紗管用，干一點是一點！”

劉淑珍同志對國家財產非常愛護，她聽說一個紗管七斤小米，她的車底下紗管就很少；她看到紗管就拾起來，她怕踩壞了或者推車給壓壞了。

六個孩子的媽媽劉淑珍同志不僅生產上是能手，在文化學習上也稱得起是個標兵。平時遇有不會的生字，在家問她大兒子，在外邊就隨時隨地的請教別人，她雖然孩子多，但能妥善地安排家务，利用一切可能騰出的時間抓紧學

習。在飯后抽煙、喝水和給孩子吃奶時都進行學習，一分鐘也不輕易放過，晚上孩子們都睡了她做作業。星期日，她70歲的婆婆幫助做飯，丈夫幫助看孩子，她還要洗衣服干一些家里的活，可是她還騰出時間來複習功課，在學校學習，她沒有一次遲到早退，出勤達到百分之百。她在廠里不僅第一批摘掉了文盲帽子，而且達到了小學四年級的文化水平，可以看大字報和生產簡單材料，還能按日作互助小組生產成績記錄，被評為廠級、市級脫盲積極份子。今年九月河東區委進行優秀黨員評比時，她得到了紗場全體黨員的一致擁護，當選為河東區黨委“五好”黨員，為我們黨員和工人樹立了一個良好的榜樣。

党給我帶來了文化

何春堂 口述

我今年53岁了，是鋼絲保养天軸組的工人，也是天輪學習小組的一名老學員。

我从小就想念書識字，看有錢人家的孩子們整天背着書包去上学，自己就眼热，可是自己家里那么穷，哪有錢供我上学呢？我从十二岁就开始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了，那时整天跟着父亲跑东跑西，到处寻找制硝的土，天天頂着星星伴着月亮一挑又一挑的往家担，全家就指着熬硝生活，但是一天累个七死八活，連頓飽飯还吃不上。

十五岁那年，进了裕元紗場（現國棉二厂），在搖紗学徒，干了一年多，因得了伤寒病就失业了，为了生活，还没等病好利索又进裕大（現國棉三厂）做天軸加油工作。1925年李培良先生在鄭庄子庆元里成立了一所平民学校，白天教穷人家的子弟，晚上教工人，都不收学费，我听说这是专为咱工人的学校，就参加了学习，上课時間是每星期一、三、五下班后两个鐘头。头一天进课堂，就

給我一種亲切的感覺，我們的老师李培良先生，待人是那樣的热情、和氣，就象自己的亲兄弟一样。开始講課了，學員一個人發給一本油印的識字課本，還有一支鉛筆。“工人要做工厂主人”，“天下工人是一家”，“團結有力量”等課文，我們一遍又一遍的讀着，越讀越帶勁，越想越有理，心里开了窍。“你們一定要記住：五一劳动節是咱們劳动人民的节日，是工人拿鮮血換來的。”“工人必須團結起來，大家擰成一股繩，一定要組織自己的工会，有了自己的組織，就有人替咱們說話了，資本家欺負咱，咱就可以聯合起來和他斗争……。”李先生的講話都使我們听得入神了，虽然一天只学到几个字，可是我們工人們非常乐意去，學校就是工人的家，就是工人斗争的指揮部，从那里不仅学会識字，更重要的是学会怎样生活，怎样和資本家、反动派进行斗争。在他領導下，我們的工会很快就組織起来了，大家推选了項瑞芝等做代表，向方日本人提出了四个条件：一、要求給工会办公的房子。二、要求工会給工人增加工資。三、要求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四、要日本人签字，公开支援广州、上海日英紗厂工人罢工的斗争。这些合理的要求都被拒絕了。为了爭取斗争的胜利，工会組織了工人罢工。罢工的洪流推倒了大牆，冲进了厂房，和反动軍队展开了英勇的搏斗；裕大紗場被工人砸壞了，一直停了三个月才开工。这場革命的風暴过后，李培良先生离开了这里，我在平民學校的學習也就結束了，前後总共上了兩個礼拜的學，而且离現在已經过去三十多个

年头了。但是在我的腦子里却仍然閃耀着永不消失的光輝。

此后，悲慘的生活又繼續了二十几年，一天累个臭死，換來的只是挨打受氣、餓斷肚腸，那里還有心火念書？再說，在旧社會工人就和牛馬一樣，除去干活沒你的事，誰還管你識字不識字！

啊！太陽出來啦！一九四九年共产党領導全国人民得到了解放，工厂再也不是吃人的活地獄了，它成了為國家創造財富、為人民創幸福的乐园。几十年來的理想實現了。實行了八小時工作制，實行了勞保條例，工資普遍提高。我全家八口人，有四個人工作，我愛人也是國棉三廠的老工人，大兒子和兒媳妇在自行車廠工作，二孩子也上中學了，全家過着丰衣足食的生活，真是過去連做夢也想不到的事。1951年我得了腹膜炎，眼看就要完了，在紡織醫院住了兩個月零9天，國家給花了兩千多元的醫療費。這個病如果是得在解放前，我還能活下去嗎？我用什麼來報答亲爱的黨呢？就得苦干！發揮工人階級忘我的劳动精神和高度的主人翁責任感！解放前，資本家拿我們當牛馬，我們不給他好好干活是對的，他來了就干會兒，不來就泡會兒，可是這一套用在今天就不對頭了，我們今天干活是为了給全國人民造福啊！所以，解放這麼多年來，我就是有多大勁兒使出多大勁兒，保證了車間安全生產，沒給國家耽誤過一分鐘，沒有坏過一次螺絲。

党为了提高工人的文化，使工人在文化上也來個大翻

身，成立了工人业余学校。以后又連續發动了几次群众扫盲运动，有很多同志都先后摘掉了文盲帽子，进入了中学、大学學習，可是我在这方面却落后了，自然我也知道有文化好，可是又覺得这么大年紀啦，腦子也慢了，眼睛也不給使換了，老來老來還上什么學呢；不識字不是也照样干了这么好几十年嗎？心想，不管怎么样，也得把孩子們培养起来，讓他們都掌握了文化，不再象我不会写不会算的，当一辈子睜眼瞎子；也就心滿意足了，几年来我一直沒有参加學習。

我們天軸組总共三个人，都是文盲，老沙同志比我大兩岁，他連自己名字都不会写，刘元平同志比我俩年青些，文化程度和我一样，过去識几个字有限。1958年4月党委發出爭取提早實現无盲厂的号召。車間在党支部的領導下开展了扫盲工作，鋼絲保养青年工人王子昆（共青團員）积极响应了党的号召，來动员我們上学，他說：

“扫盲也是党的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工人沒有文化，革新技術、提高生产就有很大困难。将来工厂实现了自动化，不識字就更不行了，你們都是老工人，过去受剥削和压迫，沒有學習的机会。現在党号召我們向文化进军，为什么还不赶快行动起来呢？”我們听了覺得很对，我想我們在生产上从来也沒有拉过后，在文化戰線上能甘居下游嗎？不，得干！可是學習時間怎么解决？王子昆同志說：

“你們三个人組織一个小組，我给你们鬥，利用早晨上班前和中午飯后休息時間學習，學習地點就在天軸組。”

“好！你把文化都送上了門，我們还有什么說的，干！我們保証學好，爭取早日摘掉帽子；”我們說。“學校發給課本，就是缺塊黑板。”“有了！這不是一塊很好的黑板嗎？老師就在这上邊教不是滿好嗎？”我指着洋灰地說。

“哎！你們三個人的練習本也有了！”老師望着地上高興地說。

4月29日，學習開始了。老師從保全部找了一些粉筆頭在洋灰地上寫字，教我們認，然後我們也用粉筆頭在地上練習寫，地上寫滿了，濺點水擦干淨，不大会兒就又寫滿了，口袋里總不離粉筆，不管走到那兒，抽空就寫。十個字里頭有兩個字記不起來就急得要命，有時為一個字就愁一身汗。三個人互教互學，遇到三個人全不認識時，我就把字的筆畫記在腦子里，到車間去遇到熟人就問。有一次“鑼”字怎麼也想不起來了，到車間找人一問，才知是鋼絲鑼底的“鑼”，心裏感到有說不出來的那麼痛快。下班回到家里也是手不離書本，就象入了迷一樣，有的字不認識就問我的小孩，有時問得次數太多了，他就不耐煩了：“您這麼大岁數啦，還总問我們，我們的功課還完不成呢！”我想，干脆還是自己愁吧！別和他們斗這個氣了，可是有些字不問就是不會，如果當天不解決，簡直連覺也睡不着，鬧來鬧去還是得求他們幫助。

在學習中，我們的老師那種熱心教學的精神，真是讓人佩服，他每天中午急忙的吃完飯，利用剩餘半小時的休息時間來教我們，有時他到外邊去開會、參觀，回來晚了

就不去吃饭，饿着肚子教我们，得了病也不停课。有一次他得阑尾炎住院了，就布置我们作全面复习，刚一出院病还没完全好，就来给我们上课了。为了帮助我们早日脱盲，他采取了大量突击、分散复习的高速化教学方法。从每天教二、三十字逐步增加到五十字、八十字，为了争取在“八一”以前脱盲，每天突击一百五十至二百个字，由每天教一、二次增加到三次，就这样苦战了三个月，我们的文盲帽子就都被摘掉了。当我们获得河东区扫盲协会“扫除文盲先进集体”的奖励时，我兴奋的说不出话来。我想这都是党给我们带来了文化，使我们不仅在政治上、经济上翻了身，而且在文化上也翻了身，我要永远听党的话，继续干下去！

以前一字不识，厂里贴了布告和大字报，大家都围着他看，我连边也不敢沾，现在摘了文盲帽子以后，眼睛亮多了，胆子也大了，每天上下班都要留神看看有没有新贴出的大字报。厂里工人写的诗歌、编的快报都能读了。眼前的字也能写个差不多了。记得有一件挺有趣的事：我们天轴组的屋子，原来是原动部的仓库，我们搬到这里来不过几个月，记得刚往这屋搬时，老沙认识字还很少，他见到一面白粉墙上用色笔写着一些大字：“注意：移动马达时要按次序排好。”另一面砖墙上用粉笔写的“鸟羽”、“中央”等几个大字，他就惊慌失措起来：“哎，这是嘛？是誰写的，别是反动标语吧！咱可得赶紧向领导去报告啊！”我当时比他多识了几个字，觉得他很可笑，连忙

把兩面牆上的字都念給他聽：“注意……”“鳥羽、中央”還不都是電浪的名字嗎？”他這才平靜下來。我心想，如果再早几天搬進來，我和老沙還不是一樣嗎？此後，我們學習的勁頭就更大了。

識了五百個字以後，我們的熱情更高漲了，光讀課本覺得不能滿足了，我們三個人又訂了份天津工人日報，天天讀報、看大字報，學與用就結合起來了，心裏也豁亮了，干勁更足了，工作上比過去有了飛躍的發展。作機物料預算，過去只是凭腦子記，凭嘴說，有時忘了一項，利用時還得追補，給工作造成損失。學習後，作預算時三人合計好寫個單子交給材料員，工作上顯得特別便利。過去，因為我們不會寫不會算，馬達輪都是技術人員掌握，生產高速化後，我們也識了字，記記尺碼也不成問題，這項工作就由我們包下來了。

有一次，我們讀了工人日報上介紹的漿紗不用面粉的經驗，得到很大啓發，我聯想到天軸加油利用廢油代替新油的問題。過去用過的油都只好擦地板，經過研究，采用廢油過濾的方法，高領導提出9個月不領新油的建議。6月份作了試驗，效果很好，8月份領導上批准了這項措施，為國家節約机油1000多斤（合一千多元）。

我們在高速化中，還研究了鋼絲電動斬刀問題，三個大老粗硬搞起科學研究來了。若不是通過這次學習，樹立了敢想敢干的風格，那還敢同这些东西打交道啊！我們首先研究了電鈴的原理，拆開電話機，研究它的構造，經過

4个月的苦战，已經制成了电动斩刀小模型，效果很好；可是制成了大的电动斩刀就有問題了，究竟关键在那里？我們还在研究，决心要找出完滿的答案来。在研究过程中，党给了我們極大的支持和鼓励，领导上給我們找到一些重要的参考材料，不过感到最大的困难就是文化水平不够用，不会計算，不懂得电学方面的理論知識。从这里我更深深地体会到學習文化絕不是單純識几个字的問題，也絕不是个人的私事，它对提高政治觉悟、发展生产、革新技术有極其重大的意义，所以我們下定决心要乘胜前进，在摘掉識字盲帽子的基础上，力争在三、五年内或更短的时间內再摘掉文化盲和科学盲的帽子，使自己迅速地成为一个又紅又专的工人阶级知識分子，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作出更大的貢献。

(郭旭年 整理)

劳动模范赵起山

許宗旺

赵起山进这个厂子做工已經二十一年了。为了学技术，在旧社会他不知吃了多少苦头，受过多少打罵。他想学，可是沒人教給他，他的一身本事能耐全是偷来的，自己守着机器琢磨出来的。

解放后，党重視了他，培养了他，才使他的技术得到很大的發展。經過自己苦心鑽研不断努力才成为受人尊重，群众热爱的赵师傅。一九五八年还被評为天津市先进生产者，荣获了第一个五年計劃技术革新成就国家二等奖。

几年来，他在技术上的成就和創举是非常突出的，也是惊人的，光合理化建議就提了一百多件。較大的創造發明也都是超世界水平的。最成功的兩項是：“浆紗伸长指示器”和“穿扣自动掏綫机”。为了研究这两个东西他不知牺牲了多少睡眠；也不知有多少頓飯忘了吃。他的創造發明也就是他的腦汁和心血的結晶。

穿扣工序直到現在仍然还是半自动化的手工操作。女

工們为了多掏繩子活，她總上班早來下班晚走，甚至把手指头都磨破流出血。怎样才能減輕工人的体力劳动，迅速提高生产效率呢？这是赵起山早在一九五二年就开始动腦筋的一个課題。从那时起他好象跟穿扣机結成了形影不离的朋友；又象是个看相的先生整天給穿扣机相面。他上班来看，吃过饭看，下了班还看，一天到晚围着它轉。工人们不知赵师付近来得了什么病，都以为他有点魔症。可誰又能了解他的心事呢？

一个月后定了腹稿。根据他所計劃好的一套，用草板紙做成了个模型。模型做得以后，他才把自己的心事向領導上吐露。領導上很重視也很支持他。于是，真的掏繩机就开始制做了。

模型好做，要做真的困难就来了。首先自己不会画圖。要叫机械部加工零件。用嘴說人家听不懂，讓人家看模型，紙的模型跟真的机器出入又很大。这怎么办呢？还好，这一关很快就闖过去了。

和他一起工作的有个宋秀清。此人会画漫画又熟悉穿扣机，很能理解他的心气和素圖。赵告诉他这个机件是什么样子，多大尺寸；那个机件多大尺寸又是什久形状。宋秀清都很快地按照他的意思画成了立体圖形。

因为宋秀清也很喜欢鑽研技术，又挺願意帮他的忙，就做了他的助手。从此赵起山就不再孤单了。

掏繩机做成了，安装試驗吧。这一天負責人都来了，有技术員，有科长，一向支持他的党支部書記李长榮同志

也在場。

这时老赵心里很紧张。他想：要是我自己在这裝還沒有什麼，大家都在這看着，倘若不成有多不好哇！

心里越是想，手头就越發慌。好象今天工具都不听使喚。虽然心里不稳当，机器总算安裝好了。接着赵起山一拉小閘把，掏綫机就轉起來了，一切運轉都很正常。他的心情就比剛才平靜多了。望了望后邊的人，站在后邊的人們也都微笑的瞅着他。好象對他說：沉住氣，准能成功。

机器轉動了，接着就掏綫，這一掏綫不要緊，登時赵起山的額角上就滲出了汗水，接着一顆顆汗珠出現在他头上，这时他心里不仅發慌而且也懶散起來。暗暗怨道：机器呀机器，怎麼这样不作驗，你就眞的當众出丑了……

赵起山着急也不能怨他，本來計劃掏綫是兩根兩根的掏，可是現在却一縷一縷的挖，有時候鉤刀空轉還掏不上綫。你說怎能不教老赵出汗呢？他覺得自己很窘，好象做錯了什么事一样难过。甚至他天真地想到：大伙一定要責備自己，那就任他們說好了。

“可是沒人責備他，第一次試驗不成功又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呢，李長榮同志拍了拍老赵的肩膀說：“怎么，不高兴了吗？我看很好。世上沒有研究一件東西一次就能成功的。何況你这个小家伙第一次出世就会掏綫，这还簡單嗎？我想再試幾次准能行。這次試驗我就給你評八十分。”書記說話总是好詼諧的。逗得大家笑了一陣之后，接着說：“蘇聯有腳踏穿扣機，青島也制成了腳踏穿扣機，可

是这个自动掏錢机还是舉世無雙的哩！你一定要再努力。需要什麼告訴我，保證及時供應。怎麼樣，我做你們的供給處長有意見嗎？啊？哈……”說着他自己也笑起來。

支部書記的話給了老趙很大鼓舞，暗自下了決心：怕什麼？有黨支持一定能成功。繼續干，別泄氣！

老趙又繼續動腦筋了。毛病在哪呢？他仔細端詳着他的小機器，用手撥弄着轉盤鉤刀。一天，兩天……時間过得真快。一晃一个礼拜过去了。在這一個礼拜中，老趙的眼睛熬紅了，嘴唇上起了泡。腦子沒有白費的，他总算找出門道來了。他斷定毛病准在轉盤鉤刀上，就朝它下手！

星期天老趙照旧把紙模型擺在桌上反復琢磨着。飯熟了，老婆喊他來吃飯。他說：“沉一會，你們先吃吧。”老婆已習慣了這句話，望着他半喜半怨的說：“總是不忙，沉一會。沒見過你这样的人，沒午沒晌的一坐就是一天。吃頓飯象王請諸葛那样難。”

天已正午了，太陽當頭直射大地。老趙在屋裏悶得滿頭大汗。他也有點不耐煩了，打盆涼水擦擦臉才跟着涼快些。心想，总在屋裏死憋也不好事，出去散散步，換換散散腦子，順便到文化宮圖書館借本紡織學來看看。

天氣干熱。一縷風絲都沒有，走在太陽地里晒得人肉皮疼。老趙走進路旁樹蔭涼里，雖然人在路上，可是他的心還沒有离开那桌上的模型。一邊走着一邊琢磨。樹梢上知了不停的叫着又攏亂了他的思路。

他真煩死了。一不小心膀子撞在樹干上。一栽歪险些

跌倒。

好，撞得好。这一撞把老赵的腦袋撞开了窍。当他身子一栽歪失去平衡的时候，他發現他的胳膊搖擺起來。等站穩了又使劲摆了几下。不由暗喜。行，这个原理可以利用到我那个轉盤鉤刀上去。轉整圈不是掏錢多嗎？我讓他來回擺動轉半圈不就行了嗎。

于是文化宮也沒去，跟着就返回來了。

為了慎重起見，他決定再去和老父親商量一下。他的父親趙仕，在紗廠干了四十多年，頗有經驗，也有办法。過去在一些合理化建議上曾給了他不少幫助。

趙仕正趴在桌上用圓規和木尺划着、量着。趙起山一進屋就把自己的意思告訴了老父親。老趙仕听了以後，摘下花鏡想了一陣說：“行，這個办法行。我們車間粗紗機上不就有了擺動拉杆嗎？”說着就拿起筆來畫了个樣子。還怕趙起山看不懂，就這樣、那樣，連說帶比的講了半天。

這下趙起山心里可有底了，他樂得象個孩子。馬上找宋秀清來画好圖交給領導上了。

几天以后，新的、搖擺式的轉盤鉤刀制成了。再試試看吧。這次試驗效果很好，算是基本成功了。老趙高興，宋秀清也高興，黨支部書記更高兴。高興的是我們有了新工具，不僅減少了体力劳动，解除了工人磨破手指的痛苦；也提高了生產效率。

領導上指派專人做生產試驗。事後老趙又針對生產過程中所發現的毛病，進行了幾處小的修改，這一創造就完

全成功了，而且推广到了全车间。

繼自動穿扣掏綫機之后，趙起山又創造了漿紗伸長指示器。

一九五八年，技術革新運動象海潮一樣澎湃全國，也涌到老趙心里，在他身上激起了巨浪。巨浪象一株高大的植物，迎着東風開放了翡翠和水晶的花朵。

漿紗工人們會為紗綫的伸長不均勻而苦惱不知有多少年了。為了解除工人的苦惱，趙起山就又開始第二個大課題的研究了。

伸長不均勻是怎麼回事呢？沒進過紡織廠的人是不懂的，也許我說了以後你會更胡塗。無論如何是要交待一下的，盡我的能力來解釋吧。

一個漿紗工人看一台漿紗機，他要隨時掌握上漿大小，含水多少，也要調整伸長是否均勻。每匹布所用的綫是有定長的，如果伸長小了綫就不夠用的；可是也不能大，假如大了，把綫伸的過長了或是細了，綫出來就不結實。所以漿紗工人要掌握伸長很不容易。除非是把整軸綫都漿完才能核算出是大是小。至于怎樣才能事先就估計好呢？這就是趙起山的事了。

老趙還是按照他的老办法辦事。查机器相面、苦思、制模型、找宋秀清画圖。伸長指示器和自動掏綫機情況可不同，這是個儀表，它不能直接生產，它的任務是及時告訴當車工人伸長標準是否正常，是否合適。

老趙考慮的結果是根據漿紗機轉動的速度，在它上面

按个仪表，看那表上的指针就可断定线的伸长情况。可是做仪表得精通电气知识呀！老赵哪会这个？没关系，找师傅。老赵就找来了电气车间的同志一起研究。

想呀想做呀做的仪表制成了；但是试验几次都失败了。

这时有些落后工人就纷纷议论起来：

“这不是瞎闹吗？我干了这么多年也没见过浆纱机上安电表。我看这是大姑娘坐月子——費劲不討好！”

“我看也是。这么多年都没有人能解决伸长不均匀的问题，你赵祖山就行？嘿嘿，这个表摆哪儿也是聋子耳朵——佩搭！”

“赵师傅研究的这玩艺儿还不错哩，没事转转可以给我们开心解闷呢！”

老赵没把这些话放在心里。你说你的我干我的。可是心里也很着急。试验了这么多次都不行，怎么能不着急呢！

是个月黑天，一点月光也没有。秋风阵阵吹着，黄叶随风飘落，晃晃悠悠落在树下、墙角。有几片也轻轻扫过老赵家的玻璃窗。

这时老赵正在灯下深思。锤子、剪子、刀子、榔头摆满了一桌。近来老赵好象是瘦了，气色也显得那么难看，眼睛里充满了血丝。

现在他最伤脑筋的就是齿輪不准。如果牙輪轉一下撥一个齿，那指针就会准确；可是现在就是对它没办法呀！

他痛苦的想着，默默的想着。

他的孩子今天突然發高燒，燒得还很厉害。女人抱着孩子坐在床上不住的嘟囔着：“我看你多咎算个完。每天弄到深夜，孩子燒得这样，你还象是沒事人。飯菜已經熬过三回了，你也不吃，我看你能憋飽了不，”

他望着窗，托着腮，想呀想的也不知想了多久。迷迷糊糊打起盹来。屋裡很靜，只有牆上的挂鐘喀喀嗒的响着。不时孩子也哭兩声，那是發高燒的緣故吧。

当、当、当，挂鐘敲了三下。老赵蒙蒙眬眬睜开眼，一看三点了。老婆又催他快睡。他似答非答的說了声：“知道啦。”

老婆睡着了，可是老赵还是坐在那儿。这回沒有望着窗外，却死盯盯地看着那挂鐘出神。不知怎么，現在他对那挂鐘又發生了兴趣。

他一边望着一边想：我那个牙輪要是象鐘表一样，一齒一輪地走得那么准就好了。对呀，我何不摘下来看看呢？他这样想着就忽地一下站起来直奔挂鐘而去。

老赵拆开了挂鐘，注意地研究了起来，里面大輪套小輪，小輪咬大輪；这么轉又那么轉。嘿，对！老赵越看越有門，越看越高兴。心里顿然豁亮了。精神也来了，刚才的困意已去了个一千二净。

等他把鐘重新裝好以后，外边天已蒙蒙亮了。

这一夜他連枕头也沒沾。好歹洗了洗臉。瞅瞅孩子又囑咐了女人几句，便跨上自行車朝厂子奔去。

太阳已从东方探出了头。一抹朝霞映在老赵身上。老赵今天骑车显得特别有劲。脚下越蹬越快。

“成功了！成功了！”

人们狂欢的笑着跳着。青年徒弟们甚至把老赵抬起来。老赵呢？自然更高兴了。老赵高兴的是：自己又为党做了一件事。有了伸长指示器，工人可以顺利的进行生产，纱线可以保持标准的长度，织出布来会更结实，人们穿着会更满意。他给人民做了这样一件事怎能不乐呢？乐吧！痛痛快快地乐吧！

喜讯象长了翅膀，飞出车间，飞遍全厂。随之而来的是贺喜的鼓乐和人群。厂党委也给他送来了贺喜报。

赵起山連續創造兩項超世界水平的技术改进，一下子引来了许多客人。连日来，有不少兄弟厂的代表前来参观访问。人们看了以后真是夸不住口，赞不绝声。

为了展示工人的智慧和力量，市里举办了一个“天津市工业技术革新展览会”。老赵的两项也被列入其内。并聘他做了讲解员。在展览馆里老赵热情地接待着一队又一队的观众；也满面春风的送走所有参观的人。每当讲完一次之后他总说上这么一句：“请您留下宝贵的意见！”

有这么一天，一个消息，一个不平凡的消息激荡着老赵的心。上午有一些外宾参观了之后。负责人宣布：“今天不再接待任何参观的人，下午有政府首长来。”

谁呢？讲解员们你问我，我问你，谁也猜不出是哪位首长来。

午饭后，負責人召集全体講解員开了个紧急會議。他說：“同志們，報告你們一个好消息！”說這句話的時候显得特別激动，兴奋的臉上泛着紅潤。

“快說吧，从上午你就悶着我們，都快急死啦！”人們催促着。

“毛主席來天津視察，你們知道不？”

“啊！？毛主席！”人們几乎喊起來。

这振奋人心的消息象一股電流，立刻傳遍了每个人的心臟、血管和周身。

“同志們別亂哪，聽我往下說。”等人們平靜下來之後，那負責人又接着說，“正是因為今天毛主席來，我們才开这个紧急會布置布置。第一，毛主席来了大家不許亂走動。各人堅守崗位听从指揮。还有……还有，还有什么呢？就是这个吧，要知道，毛主席是最不喜欢不守紀律的人呀！”

人們各自回到自己所負責講解的地方。等呀等的，等着那幸福的时刻。这时每个人的心里都是那么不平静，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老赵的心里更象长了小手，这小手用力摇撼着他的心臟。心哪！越跳劲越大，甚至自己都能听到那咚咚的声音。

人們等啊，盼啊，可是毛主席还不来。有个顽皮的小鬼耐不住性子了，溜到門前偷偷向外張望。他的这个违犯紀律的行动马上就傳染給所有的人。大伙身不由己的都走到門前去。外边有什么呢？除了茂密的树木和鮮艳的花草外

什麼都沒有。毛主席呀，連個影也沒有哇！尽管是这样，人們还都爭着向外望。如果不是負責人發現了喚他們进来，他們还不动弹呢！

又是等呀等的，也不知等了多久，当他們有些急了的时候，忽然門外一声笛鳴，毛主席到了……

慈祥的老人順序的仔細的看着所有的展品，并不住的問這間那，有时还微笑的点点头。工夫不大就来到赵超山跟前。这时他忘記了自己是講解員，本应清清楚楚地把他的創造講給老人听；可是，他一句也說不出来。站在那儿活像个木头人。起初还能看清毛主席那健壯的身体和慈祥的臉龐。可是眼睛越来越模糊。他不知毛主席在他面前站了多久，也不知是誰替他做的講解，等毛主席走过去才發現自己的眼睛里充满了幸福的泪水。

喜訊竟傳得这么快，老赵剛回到厂里，人們就都圍过来，簡直把他圍了个風雨不透。人們的問話使他一时回答不清。“毛主席身體結實嗎？”“毛主席和你說什么啦？”“毛主席囑咐我們些什么呀？”“你和毛主席握手了嗎？”……

哎呀，这些問話也正是老赵后悔不及的事！所有这些他事先都有准备；可是——可是当时……現在叫他怎么回答大家呢？直到現在他的心還沒平靜下来。

自見到毛主席以后，老赵身上的劲就更足了。这个劲可以拔山也可以填海。

为了不辜負党的培养和毛主席的关怀，老赵决心再做

出惊人的成績。

現在，他又開始了一項新的技術研究——穿扣自動接頭機。他決心在一九五八年年底完成。這個改造要是成功以後，穿扣車間就完全自動化了，徹底改變了人工操作的狀態。女工們可以不再擔心手指流血了。

和他一起工作的人，有時半开玩笑的和他說：“老趙哇，快些研究吧！成功以後就可以坐上火車馳鶻地上北京，在懷仁堂裏去見毛主席了！”

老趙微笑地回答：“嘿，別逗了！我這點小成績怎麼能上北京去見毛主席呢！”

雖然他嘴裏這麼說，心裏可是甜丝丝的。

永不息逝的火花

赵长荣

棉紡三厂的西北角，有一座淺灰色的大樓，这里就是扩建新紗場的厂房。大樓旁边有一排紅色的砖平房，順着往前走就看見中間的一間寬大的房間，不斷射出電藍光，这就是棉紡三厂修造場的燒焊組。

周德林就在这里工作，他年紀不大，个头不高，中等身材，圓圓臉兒，兩道濃眉，一对圓圓的大眼，他不很胖，但很健康，黑黑的臉膛，胳膊伸出来硬棒棒的象根棍子。他今年二十五岁，是个預備黨員，性情直爽，爱好体育活动，藍球打得很好，一年多以前是厂級的藍球代表队队员，田徑运动也很出色。

他今年已是兩個孩子的父亲了，可自己却仍象孩子般的乐观活潑，他在燒焊組已經十三年了，学了滿把的好手艺，在工作中，不管有多少活，要的多么紧，也沒有皺过眉头，叫过困难，总是那么乐观，活越多，他越感到不够干的，“多面手”开展以后，他还能学些車鉗工的技术。

从大躍進和工人參加管理干部參加生產勞動以後，他更深刻的感到工人是工廠的主人，而干部又是一個普通的勞動者，他們和工人一起勞動、解決生產中的問題，支持工人的創舉。如翻砂十房箱，要不是領導支持主任跟着干，就不一定能成功。工人是主人，發明創造有人支持，為什麼還不大胆的干？領導說過：大膽的干，干好有功勞，干不好還有苦勞呢！吃飯時他在廠里的宣傳材料上看到全廠各方面的躍進情況，又看到本車間車鉗工的躍進情況，有的超額几倍完成了躍進計劃，有的創造了很多多刀多刃的新工具。星期天他到勸業場去买东西，在電車上，看到電車公司也正在開展服務良好月，對他照顧的無微不至，他很受感動。回廠以後，他也在燒焊門口設立一個用戶意見箱，開展服務良好運動。第一次接到的是修造場、鉗工師付們的信，他們批評燒焊生產質量低不能滿足生產的要求，特別是燒完的軸不好調直，燒完的粗紗重鉛裂縫，從此周師付就根據這二個問題苦苦鑽研，每天下班以後不回家，在車間里轉轉悠悠的好象有什么事情沒干完似的，摸這摸那，端詳每天使用的工具和燒完的機件，車間有三五成群的人在一起談論，他也過去听听，看看別人是否在給燒焊提意見。

關鍵明確以後，知道燒的質量不好，但又怎麼辦呢？這在周師付的腦子里增添了新的問題。無論是燒焊、開會、吃飯、睡覺，他都在想着這個問題。他琢磨了很多辦法，後來做了一個卡盤（燒軸強制器），試驗了幾次，可

是缺点很多，不能根本上解决問題。急的他整天围着屋子轉，也想不出轍來。

从鉗工提出燒焊質量不好的批評以後，可把周師付給急坏了，特別是他看到各工種都在躍進，他覺得自己簡直是落後了。他回头看了看新做成的燒軸強制器，沉默了一会儿，自言自語地說：“有了強制器，有缺点；但也有些頭緒了。咱技術低，沒有理論知識，文化又低，要苦苦鑽研才行，我一定要造出一台自動化的燒焊機，那可以解決質量低的問題了。”說着他就画了一張草圖，交給鉗工劉師付看，劉師付看完說：“行！”這一下更鼓舞了他造机器的信心。

說干就干！當天下班他就找材料，東找一個牙輪，西找一塊條鐵，一有時間就到廢料庫去找材料。他就象中了机器迷似的，邊找邊干，邊補充邊改善地每天干到十一、二點鐘。第一次試車沒有成功，他又接着研究，還翻了許多參考書，夜里常常堅持到很晚很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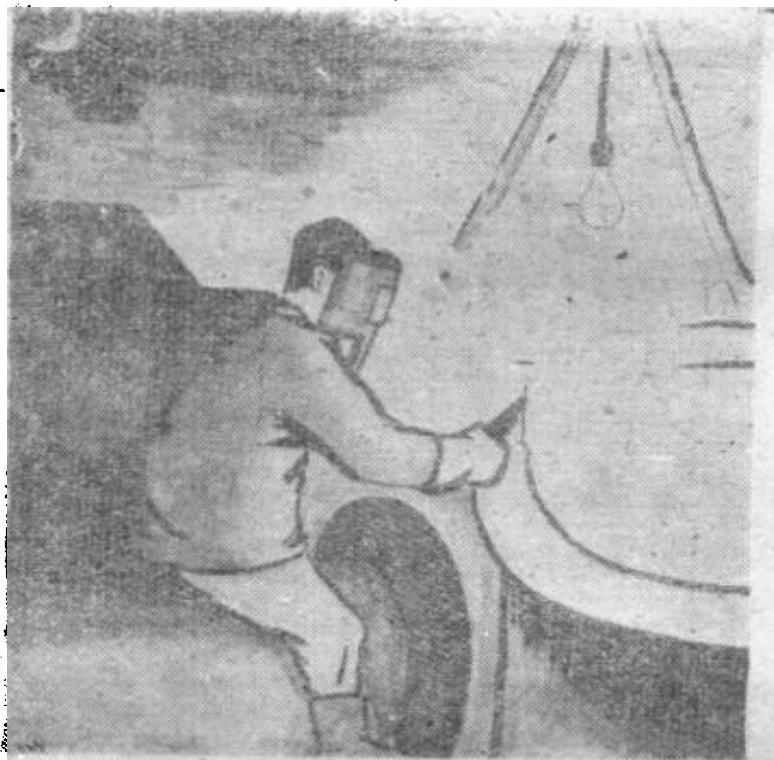
他每天苦戰，有時自己干，有時請老師付們幫助，干了有一个多月，自動化東風燒焊機成功了。經過試驗，裝上焊棍自己就能燒焊了，燒出來的質量也很好，想再改造一下，把換焊棍也改成自動化，正在研究時因為以鋼為綱的大躍進，棉紡廠的高速化運動開始了，就沒有再繼續進行研究。

大躍進使得人們的生活也改變了，八九月里的天氣已

有些涼意了，有的人因为紧张連单衣都不穿，只穿着棉紗背心，但周师付却因为紧张穿上了棉衣、皮背心，为的是防止犯他那風湿性的关节炎而妨碍工作。

燒焊組的活，从車間高速化以后增加了几倍，又要赶制鋼厂的冶炼設備运料小鐵車，任务比从前大多了，他总感到時間不够用。他的家就住在厂旁边的三工房，离他工作的地方也沒有第一百米，为了爭取時間他搬到厂里来睡，省得回家耽誤時間，影响工作，搬到厂里睡，什么时候有活什么时候就干。

燒焊組，从紗布車間高速化和接受鋼厂小鐵車的任务以来，已經連軸轉了几十天了。他自己呢，却是从今年夏天大鬧技术革命开始，每天苦战到深夜十一二点，最近又和同志們連夜干，算起来連夜战的日子不下一百天了；可他的精力还是那么充沛，干起活来活象小老虎，晝夜苦战。不論是黑夜，还是白天，只要从修造場走过，老远就看見，燒焊組門前，大礼堂后边閃灼着的翠藍色的电火花。周师付在那里，全神貫注



地啦喳啦地燒活兒，真叫人有点丈八的和尚摸不着頭腦兒，這小伙子也怪有趣味的，每逢人們問到他，你上什麼班時，他總是乐呵呵的回答說我哪個班都是。

真是火上加油；越渴越吃鹽哪，津鋼的第一批鐵車要的很緊，燒焊組為支援鋼帥，就經常干到深夜一二點鐘，紗布車間又實行高速化，機件增加几倍，可是燒焊組的人還是先前那麼多，沒有增加一點。黨支部書記李長榮在緊急會上說，第一批冶煉設備運料鐵車，要在九月十號前交活。書記講完重要意義以後，要求各工種提前完成，保證津鋼新建轉爐提前出鋼。周師付聽到自己能直接為鋼而戰，滿心眼里高興，他反復回昧著書記的話：“沒有鋼就不能改變我國一窮二白的面貌，就不能實現工業現代化，農業機械化，具體到棉紡工業，沒有鋼就不能造機器，棉紡工業就不能發展，就不能滿足人民穿衣的要求。”特別聽到改變祖國面貌這句話他十分激動。深深刻記在腦海里的解放以前的生活影子，又一幕一幕重現在眼前。解放以後，工人不但挺起了腰板，當了工廠主人，在生活上也有很大提高。

現在紗布車間正開展高速化，全廠職工要用棉紗棉布的增產，適應今年棉花的丰收，車間高速以後，焊活增加幾倍，可人還是那麼多，電焊機還是一台，怎麼能完成這樣大的任務呢？只有苦戰。有一天五點來鐘漿紗車間送來一套暖气排管，說是漿紗機加速後溫度不夠，緊裝。行政上說：現在焊口活多，要等几天才能接活，車間不同意，

正在交涉中被周德林听见，他问了一下知道是高使用；他对浆纱同志说：“放下吧！明天早晨你来拿。”他苦战一夜把几个排管完成了。

过了不几天小铁车的料下来了，全组展开了奋战，白天吃饭倒班轮换，晚上要突击到十二点，大伙决定休息的时候，周德林还要收拾这，收拾那，等人们走了之后，他又接着干了三四个小时才去睡觉，天一朦胧亮就又起来了。八月三十日，小组听说厂党委会在八月三十一日召开党代会，就开了个小组紧急会议决定苦战通宵，完成第一批冶炼设备向党献礼。并决定有病的孙志元除外，孙志元一听不叫他参加苦战很不服气的说：“你就怕累坏了我，你每天连轴转，你累坏了怎么办呢？”怎么动员孙志元也不走，终于大家苦战了一夜，第一批小铁车完成了。向党献礼以后，在九月份的一天晚上八点钟，全厂开了一个庆功大会。党委书记、厂长都参加了，会上奖给电焊组一面红旗，开完会又组织了六十几个人，推着做成的铁车，在锣鼓声中，轰隆轰隆的推出了厂门。



鐵車排成一串，滾在洋灰馬路上，比行駛在鐵軌上响的多。周德林打着一面紅旗站在第一輛車的前邊，紅旗隨風飄揚着，直奔鋼廠走去，去給鋼廠報喜。

燒焊的任務越來越大，呆了几天，第二批、第三批、水泥球磨機等更緊急的任務都相繼下達到電焊組了。周德林考慮到在任務繁重、工作量大、晝夜苦戰的情況下，保證產量就必須在保證燒焊的質量的基礎上，有力提前完成本工種的活兒，讓下道工序有充足時間加工，不至于因時間影響鐵車質量。這一年時間對他來說就更寶貴了，他干起來活常常忘了吃飯。廠里吃飯時間過去了，他迫不得已只好跑回家去吃，但每頓飯總共也不過十幾分鐘。

在晚上，差不多每天都為睡覺問題，和黨支部書記、車間主任、伙伴兒們發生爭執。白天大伙馬不停蹄地拼命干，晚上徒工們考慮到他比誰都累，都勸他先去睡會兒。他考慮的却是，徒工們年歲小，一定要先去睡，應該多睡會兒。爭論一陣以後，徒工們總是說不過師付，只好先去睡，睡上兩三個鐘頭之後，起來再叫他睡，他却經常不睡。有時睡一会儿也是躺在椅子上翻來覆去睡不着。他腦子里除了質量、期限，還怕徒工們出點什麼事故。這樣他每次躺一個小時，就又爬起來再去幹活。

一天，周德林兩眼屎搽滿了沙子似的疼痛，一見光，淚水就不住的流。按照過去的經驗，睡上一会儿就会好的，可是他不忍心打聽，在橘燈明滅着轉了好幾個圈，一陣陣深夜的秋風吹的供熱病稍微好了些，他就又干起活

来。轉天，眼病更重了，一見光亮什么也看不見，这时候他心里如油煎，十分焦急，心想：早不鬧毛病，晚不鬧毛病；偏偏在任务紧要关头鬧毛病……不！說嘛也不能拖延。焊工晚了，好多工种都得窝工；任务不能按期完成，那是一种罪过。跟着他找来一块凉冰，用手巾包上，用冰冰一下眼睛，眼一涼，睜开能看見东西，就焊一下，然后再冰一下，再焊一下……。这时候，伙伴們都劝他去休息，他仍旧不去。最后，党支部書記亲自找他，严肃的說：“你一定要去休息！任务是紧，可身体更重要。”党支部書記說，徒工們也都齐声帮腔，連劝带拉地把他送到休息室，睡了两个小时，睜眼一看，能看見东西了，又跑回焊工組，嘴里一个劲的說：“不困了，不困了，不痛了，不痛了，……”一边說着拿起焊具，搶着又干起来了。

焊工組的任务象山一样重，可周德林总觉得活儿不够干。一天他听说厂里扩建工程焊冷風管的活儿，要从厂外找人焊，一个工一天三十元（包括一部份焊条等材料）。一算这一批活儿得二十个工，需要六百塊錢，他赶忙去找領導要求把这批活包下来自己做。結果別的任務沒影响，只用了七天时间，就完成了这批任务。在完成这批任务的过程中，他那舍己为人的共产主义品德，感动得孙志元流下了眼泪。

事情是这样的：十月中旬的一天，孙志元在露天操作本厂新建鋼鉄设备的焊接活儿，忽然天上烏云密布，風雨

交加，冷气逼人。这时候正在室内工作的周德林，一看气候这样冷，赶忙和孙志元换了个个儿，他说：孙志元身体很衰弱，抵抗力小，最容易感冒。可他却忘了自己的关节炎怕凉。

立刻，周德林这种劳动不计报酬、工作不讲条件、忠心耿耿为党的事业奋战到底的动人事迹，轰动了全厂以及全国青年。一九五八年十一月被评为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十一月十七日去北京参加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

我画画的經過

秦孟齋

我11岁在慈善小学上学时，有位70多岁的楊老師，寫得好，画得也好，总是有很多人求他写字画画。那时我很喜爱画画，总想跟他学本領，可总不敢說。后来他叫我每天下學后到他的休息室寫一張毛筆仿。有了这样的学习机会，我很高兴。在他屋里見到墙上挂着一幅挑山，画的是一个老头牽着驥，題的对联是：“人間多是画，写画在人間”，这几个字我認得出，却不明白是什么意思。楊老師画工笔也画大写意，我写完仿就看他画，站得老远的，生怕他不滿意。他对我說：“先在家練習，过几年再教你。”我回家看見鄰居誰家茶碗茶壺上的画好，就借来临画。

到了13岁，因家穷得再也上不起学，就去做工了，所以始終也沒正式跟楊老師学过画。白天上工，下工回家自己就画兩張練習，虽然每天干活12小时，也总沒忘了画，有一次中午吃饭时在街上看見有一幅画的，越看越高兴，就每天都边吃边在外面隔窗看一会，直看了一个多月，到开支

时买点纸笔也学着画起来。虽然人象画得并不象，鄰居亲友们还是称赞我几句，这也就增加了兴趣。到日本鬼子侵占了天津，全家处于少吃没穿、更累更苦的境况；过了两三年又被日伪招“华工”送到东北，就一直没画了。

天津解放后，厂里组织美术组，我参加了学习。开始时只画，不愿把画贴出去，总觉得自己没学问，东西摆不出去。经过下厂来的画家田零、孙桂桐等同志多次解释动员，才贴到墙报上。那时画的人，不是身子大了就是头大了，手也总是画不好。虽然这样，工友们都爱看，在实际中也鼓舞了同志们的生产情绪。从此，我不仅画画兴趣更高了，还加上了政治责任心，每天下了班都画到晚九点或十点。那时画家们住在厂里，教我们画画怎样配合生产和政治运动，怎样掌握表扬批评，也讲怎样画人物动作和构图，给我们启发帮助很大。他们住了一个月就走了，真是舍不得让他们走，我们跟厂里要求两三次，才答应以后还回来。后来马达、力田等许多同志也到厂里来过，教我们画连环画，开始常常抓不住典型事迹的要点，经画家们帮助修改，才画出来，贴在厂里，很受工友们的欢迎。象11幅的连环画“新的劳动态度”，还在天津日报和工人日报发表了，我见了报，到晚上12点也不困，见到工友们都这么说：党和国家这样重视我们、培养我们，这是过去做梦也想不到的事。

这次我厂党委会组织了工人创作组，大家分工共同写厂史、画厂史。这个任务很重，要求也比较高，必须真实

生动，能画的人终究还是很少，每个人都必须尽到最大的力量。

分工给我画的有发生在日本统治时期的一件事。先由党委宣传部王子经同志给我介绍了梁俊峰老师付的手被电锯切断的经历，下班后我找到梁师付，他介绍了当时的情形。那时日本人在厂里横行霸道，看谁不顺眼，上来就打就踢的事，我也碰的很多，所以他一提，也引得我心里一炸一炸的难过。那时日本监工一进车间，人们心里就打鼓，有天，梁俊峰正干活，日本监工来了，看见他就瞪起眼要动脚踢，他心里一慌，让电锯把四个手指头切掉半截，痛得他抱着手跳，日本鬼子还一个劲地罵。他痛得昏倒在地上，工友们大着胆子来救护他，送他进厂内医院，大家向大夫说了些好话，才给他上了点药，转送到东亚医院。医院也是折磨人的地方，在院子里排队，排到七十多名，梁师付连冻带饿手又疼，晕过去三次。幸亏有陪他的工友和排队的人们照顾，才没出意外。好不容易挨到了，厂里日本人又跟大夫说干脆把手锯掉，梁师付一听就哭了，想起一家九口靠这手吃饭，没有手，一家就不能活了。急得沒了法，求了半天情，大夫才答应不锯，两个穿白衣服的人将梁师付按住，连麻药都不给上，就把伤了的每个手指又剪去一块，上点药，就让他回家了。他疼得身上冒大汗直哆嗦。伤痛过一天象过一个月一样，可是没几天，厂里就让他上班去，不去就要开除。剩下一只手干活，木工作不了，也要扫地打水。

对于这件典型事例，我主要是想表现出旧社会工人过着的饥寒交迫的日子，敌人拿我们当牛马，机器吃我们的肉，生命都没有保障。全篇以表现过去工人的痛苦、敌人的残暴为重点。画的时候我也想起我从13岁到解放时25年中所受的那些苦，我现在两腿也有病，就是在东北做苦工时作下的；还有一回日本鬼子挨个拷问我：“‘露西恩’的明白不？”我说“不明白”，他一把揪住我的头发，连皮带血拉下来三四缕，把我打蒙了。现在才想明白，那时大概正是苏联出兵打日本时，敌人慌了，赔死还踢腾。想起这些，我对敌人更加愤恨，在这套连环画的前面，我画了一张“报头”，把整个故事内容包含在里面：在电锯上面日本鬼子向一个工人发横，电锯上沾染了工人的鲜血，电锯前面是被切断指头的一只大手。同志们认为这样表现很真实，还特意给今天的摄影师照了张照片贴在“报头”的左上角。这几张连环画，是我们集体对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揭露和控诉。

“二五大罢工”是我们厂的光荣。1925年时我还小，在高林洋行当徒工洗羊毛，还没到这个厂里来。我进这个厂以后就常听工友门讲这次罢工，每提起来都是越说越有劲。日本占天津以后，大伙更没心思干活，怠工时把车一关，老工人就滔滔不绝地講起来，给我印象极深。党委让我画这一段，我又找了当时参加这次罢工的老同志李德富、何春堂等，他们详细谈了当时用什么砸机器、打仗拿什么家伙、兄弟厂来支援时撞倒的那堵墙是啥样……弄清了，就

把前后过程分成十八个小节，找出重点确定画十幅，然后起草。在这十幅画里，主要表現工人們被資產階級和他們的走狗們逼得忍无可忍，在党的領導下怎样挺胸直出，从水深火热中爭取解放的情形。在斗争中工人第一次表現出是真正的英雄豪杰，重点要画出那种不顧一切向資產階級拚个你死我活的革命气概。从前跟馬达、田零学画时，他們一再告訴我，場面确定后，应着重画出人物表情动作，令人一眼便認出正面的人啥样，反面的人又是啥样。画的时候，我便特別注意画出工人們在激烈斗争中的英雄豪杰的气度。其中有一幅北洋、裕元的工人乘摆渡，渡水强渡海河支援我厂的画面，我画成草稿后，一起画画的一位青年同志給塗顏色、勾線，画出来失掉了去同敌人拼死活的气氛，我只好又重新另画。画画嘛，必須先領会內容，思想、情緒必須都卷进画里面，不能用划船玩去的心情画罢工斗争。

我也想把罢工斗争場面画得又生动又激烈，把斗争事例多画几幅，因为不熟練，时间也紧，画得离完全满意还差很远。展覽会在同志們中間起了很大作用，那主要还是全厂工人在几十年中所走过的道路和光荣的斗争的本身教育了大家。为了更好地用画来宣傳工人阶级的高貴品質，宣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我們工人美术队伍还必须不断努力，更加扩大。

附录

一九二五年天津“益世报”上 的罢工新闻摘录

一九二五年天津工人群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为自身解放，为支援上海“五卅惨案”而掀起的英勇斗争，以及中外资本家和反动政府当时对工人进行了怎样的残酷剥削和镇压，不論帝国主义的口舌“益世报”企图怎么歪曲事实、混淆是非，在字行間也不自觉地透露出了一些真象。今重加标题，分条摘录如下：

蓬蓬勃勃的罢工怒潮

前日（九日）下午六点，郑家庄宝成、裕大、挂甲寺北洋、裕元各紡紗厂，男工約兩万余人，同时包围各工厂，要求增加工資，及取消苛虐罰則。有四乡第五警察署巡官韓秀峰，大直沽巡官陈某，及各紗厂巡官范某馬某等，率警五十余名，同各厂守备警队，彈壓工众，由韓秀峰巡官，發令开槍廿余响，致激动众怒，用砖头瓦片，向

警察遙击，警察受微伤者数人。上述各厂所用之工人，每日工资三四角不等。工资既微、而罚则极严。稍有过失，即罚扣工资。如请假，不论病事，扣去两日工资。且昼夜工作，夜工无吃饭时间。该工人等积恨已久，随组织天津纺织联合工会。前有宝成纱厂、工人要求增加工资罢工之举动，然次日即恢复原状。该纱厂按工人所要求之数目计算，每年需洋六万元，因之对于罚则，更形严厉。于本月八日夜间，有女工吃饭，离其工作，被稽查张某查见，将该女工申斥后，罚去一日工资。各工替该女工代求减罚一半，张某不允，致与众工口角。张某对众工云，你们如再以罢工要挟，即再罢工，一律开除，亦不能减罚。致众工愈弄愈僵。众工即联合各厂，提出取消苛虐罚则，及加增工资等条件：第一，四角以上增五分；第二，四角以下增七分；第三，各工人因事或病告假，不许不准；第四，不许无故罰各人工资，亦不许打罵各工人；第五，晝夜十二点，須停車机吃饭；第六，自罢工起，至上班止，須补助工资；第七，开除女工，須得上工；第八条，不准开除各罢工工人。各工厂聞知，即于九日午间，召集各纱厂代表，在北洋纱厂宿舍会议，对付办法。因是日正值星期日，各厂白天休息，晚六点夜班上班。各工人白天，已联合議定，于上班前，要求工厂承認提出之八条。如不允，即实行罢工。至六点各厂女工均未赴厂，男工共有兩万余人，各将各厂大门围住要求。各工厂即电請附近警官保护，当有土城巡官韓秀峰、大直沽巡官陈某，帶警赶到，

同各厂巡官，向工人交涉。韓巡官因工人态度强硬，即令巡警拘捕代表。众工围护，不令捕綁。韓某即發令开槍示威，槍声一發，众工秩序大亂，以砖瓦向警察抵抗。一时人声鼎沸，勢極凶險。韓巡官即用電話，向警厅調取保安队。忽由門外飞来一砖，将韓某头部击伤；并將宝成管理工人部之玻璃門窗家具，均皆砸毀。有一警以槍托向工人威吓阻擋，被工人将槍搶去。后經陳巡官等，向前劝諭，始行停住。至八点余鐘，保安队撤回。于昨早各工人又围各厂大门要求。

(八月十一日)

礪裕大事件

前日（十一日）下午日俄界日商裕大紗厂工人因要求增加工資未遂，正在醞釀罢工，忽來軍隊數十名，并有日本人七、八名，不問情由，連向工人方面开槍數十响。当击斃工人八名，伤者无数。事為寶成紗厂工人所知，立即全体罢工，出厂援助裕大工人，扣获开槍日人及軍士等數名。嗣有类似軍官者一人，据称奉督署令，將扣获日人奉軍領回，并簽字為証。但行凶槍枝尚未交其帶去。受伤工人，迟至昨晨始有人煩慈善醫院昇院治疗。現本埠各紗厂均又全體罢工。

(八月十三日)

白色恐怖，逮捕工人四百多人

“十一日裕大紗廠演成工人與軍警衝突，逮捕四百餘人，解往督察處研訊……” (八月十四日)

白色恐怖擴大淫威

“……已逮捕之五百余人，現在東門內保安第十九、二十兩隊營舍內收押。……昨晚又在東南城角附近捕去十多名工人，復在裕大工廠附近捕去五、六名云。

“李督办昨日令行督察處，懸賞逮捕印刷工會代表陶卓然三百元，學生干事楊鳳樓、楊洪濤各二百元……聞學
生會及各界團體中人，近日仍不時有秘密會議，討論援救
被捕代表及工人……” (八月十七日)

北京革命學生同情工人

北京學生調查裕大案

北京學生聯合會，舉代表三十余人來津，于昨日赴大
直沽裕大紡織廠調查肇事情況，因保安隊拒絕，未得入
內，遂在附近一帶講演，態度極為激昂，講演多時，始行
返去云。

(八月十九日)

天津学生联合会負責人因同情工人斗争而被拘捕

昨有学生联合会之某某君上呈李督办公云，呈为恳请釋放被拘代表……该代表等竟被拘留，甚謂已受严刑审問者。……闡罪在煽动罢工之嫌疑問題，……目下工人之对外罢工，亦系爱国应有之举。……（八月廿二日）

北京爱国各界派代表来津調查

“……北京学生联合会……北京各校立案后援会……中华留日国民外交后援会归国代表……上海工商学代表……湖北旅京同乡立案后援会……北京救国会……中华国民对英备战大会……组织援助法案代表团，来津調查……”

（八月廿七日）

再接再励，天津学联召开联席會議

“本埠学生联合会……于昨日下午四时，召集各校代表，討論援助被拘代表方法，……”（九月十七日）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法国国际工人秘密会……代表威耳氏，昨日来津，定今日来贻紗厂附近觀察工人家屬之状况……”（十月廿二日）

被反动政府逮捕的各界代表出獄

“裕大罢工風潮，为李景林逮捕之各代表，已經出獄，茲探得各团体代表之姓名如下，計天津总工会安幸生、楊葆如，学生联合会辛璞田，陆荷，各界联合会呂聰人、李散人、李希逸、黃琴父、李公权、楊衡南，天津紡織总工会紀北海、周心农，裕大紡織工会賀志、張玉升、項瑞芝、魏石、裕元紡織厂崔貴昌，海員公会天津支部陸苗根，聖約翰大学离校学生王光恩。另有赵各庄五矿代表袁大师等五人，亦于是日釋放。……”（十二月廿八日）

播种

王林

1949年天津解放初期，王林曾经根据老工人姬兆生、项瑞芝、左振玉、刘清洲、王长林、白振东等同志的口述，整理出一部分天津工运史料，题名“播种”，发表在天津日报付刊上，后又在天津通俗出版社出过小册子。兹附录于下，以供参考。

播种者

一九二四年（民国十三年）秋天，有两个学生模样的人到小刘庄和郑庄子工厂区，开办工人夜校。当时叫做“平民学校”。这两个学生模样的人，一个是小个子，长脸，白净子。另一个是高个儿，高鼻梁，分头，近视眼带着眼镜。那小个子姓李，名字叫培良，在河东郑庄子庆元里成立了个平民学校。这个带眼镜的大高个子姓卢，叫绍亭，在河西裕元纱厂工人宿舍里开办了个工人夜校。八月筹备，十月就正式上了课。

当时工人苦得很，一天要连作十二个罐头的话，早进

晚出，差不多十四个鐘头。工資又低，還時常挨打挨罵，動不動就被開除，生活和生命都沒有保障。厂子里不象今天有洗澡塘子，在車間里干活出一身臭汗，也沒有個地方去洗。如果天天到工厂外的浴塘子里花錢去洗澡，又沒有錢。所以那时候的工人身上总有一股怪味儿，資产阶级不說是自己虐待工人的結果，反倒罵我們是“臭工人！”

李培良和盧紹亭对工人和藹可亲，起初立在道口上，見工人下了班，就宣傳識字的好处，劝工友們上平民學校。平民學校里有象棋、軍棋、話匣子，好象个俱乐部。工人到了平民學校，教員和學生總是先敘敘身世，談談工厂里的情形。工人那一个不是从小受穷，輩輩卖苦力气的，还有些从农村討飯到了都市的。一提到工厂里的情形，更要罵罵道道發些牢騷。工人以為斯斯文文的教書先生不会愛听这些，可是這兩位平民學校的教書先生大大兩样，不但愛听，而且用着非常同情的腔調問他們：

“世界上离了我們工人和农民，就都得餓死冻死，为什么我們反倒被餓受穷，挨打挨罵，难道世道永远这样下去嗎？”

上平民學校的学生越來越多了。教員教几个生字以后，就講故事。故事講的很多，有人类进化史的故事，有俄国十月革命前农民和工人受苦的故事。可是講到十月革命的胜利和工人阶级夺取了政权的时候，工人們不再当故事听，有的兴奋得一拍胸脯站起來說：

“他們能那样，我們就不能那样嗎？”

工人再也不能忍受牛馬般的生活了！

平民學校這兩個教員，并不是一般的斯文文的教書先生。他們是中國共產黨天津市委會派到工厂区秘密開展工人運動的黨員。他們根據着工人群众的覺悟程度，先領導他們在工厂組織工会。在平民學校成立後第二年，即一九二五年春天，寶成紗廠（後和裕大紗廠合併，成為今日國營棉紡三廠的前身）、裕元紗廠（就是現今的國營棉紡二廠）、北洋紗廠、華新紗廠（就是今日國營棉紡七廠的前身）都先後成立了工會。除了職員、大頭子、“堂管”（小頭目）以外，工友都參加了工會。其它各業工人，如土產、印刷、海員、鐵路也都成立了工會，並且醞釀成立全天津各工會聯合委員會。

天津工人第一次舉起了自己的旗幟

一九二五年五一劳动節到了。共產黨天津市委決定在這一天公開舉起工人階級的旗幟，大規模紀念這一個偉大的節日。事前各工廠工會都做了充分宣傳和布置，到了五一節這一天，為了防止軍閥統治當局的阻撓破壞，工會小組長化裝為零地把會員帶到了指定的大會場——南開廣場。

工會的旗幟平日只是掛在屋子裏，在天津這是第一次飄揚在晴朗的天空裏。工人群众平素只是在各个角落，在各个潮濕的黑暗的車間裏，牛馬一般低着頭給資本家和帝國主義者賣苦力氣，在天津這是第一次看到自己的天空，看到高舉起來的自己的旗幟，看到自己階級的偉大力量。

距离会場远，晚到一步的工人，看到南开大廣場滿滿地都是工人和学生，都是高举起来的旗帜和排山倒海的口号声音，更是兴奋若狂地說：

“哈哈，都是我們工人哥兒們！”

工、学代表做了簡短的演說，队伍立刻出發了。一路游行，一路喊口号。在这个近代化的都市里，在这个被万恶的帝国主义和軍閥政客統治着的都市里，在这个用工人的血汗所建立起来而不許工人长出一口气的罪恶都市里，天津工人第一次在大馬路上呼喊出来了自己的声音，第一次向全天津、向全中国和全世界表示了自己的力量。

从南开廣場，經過南馬路、东南城角、东馬路、大胡同、金鋼橋，一直游行到了河北天緯路。租界地的帝国主义駐軍勾結着中国軍閥官僚，要想用殘暴的武力破坏工人和学生这一偉大的壯舉，可是看到工人和学生队伍的整齐和庄严，縮在阴暗的角落里也沒有敢动手。

讓帝国主义者和軍閥走狗們發抖吧！

工人阶级自己的旗帜举起来了！

战斗的号角吹起来了

一九二五年在中国首先吹起战斗的号角的，是上海日商紗厂的工人。五月十五日上海日本資本家开槍打死了工人領袖顧正紅，立刻引起了爱国人民的强烈反抗。五月三十日上海学生游行示威，又遭到英帝国主义者的屠杀，激起上海全市工人罢工、学生罢課、商人罢市，激起全国人

民的反帝国主义高潮。吓得帝国主义者和中国军阀政客更加发抖的是广州市和香港的工人大罢工（就是“香港大罢工”）。天津共产党组织领导广大工人和学生，也做了有力的支援。

在郑庄子庆元里平民学校里秘密活动的共产党员李培良同志，这时候就通过平民学校的学生，教会了工人这样一首歌曲：

“日本鬼，豺狼成性，
残杀我工人，
血肉横飞。
嘿，嘿，嘿，
热血染尸骸。

有学生，帮帮我工人，
群众抱不平，
奔走号呼，
凛，凛，凛，
正气满乾坤。

可恨的帝国主义，
压迫弱民族，
协力同心，
醒，醒，醒，

打倒他們享太平。

中國人，四萬萬多，
大家團結起，
不買英日貨，
勃，勃，勃，
民氣壯山河！

在七月初的一天，全天津工人和学生又做了一次壯大的游行。路綫仍然是从南開廣場，經過南馬路、東馬路，一直到达河北大緯路。日本帝國主義者的駐軍和中國軍閥的軍隊、警察、宪兵、保安隊，並排立在東南城角日本租界口上，架着機關槍，端着帶刺刀的步槍。企圖把游行示威的工人和學生威嚇住。但是，示威游行的群眾，一見萬惡的日寇軍隊，和無恥的中國軍閥武裝，氣憤填胸，“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口號，喊得更響更激昂了，高舉着的大旗更象一面一面進軍的大纛，搖得山响。

參加示威游行的寶成紗廠的工人群眾，在會場上受到教育，并且受到鼓勵，回到自己工廠再也不能照老樣子牛馬一般地干活了。他們成群結伙地找到工會里去，要求罷工，要求同盟罷工支援上海和廣州、香港的工人階級弟兄，驅逐屠殺工人弟兄的日、英帝國主義者出中國。

李培良早就接到上級的指示：結合工人的日常要求，配合全國的革命形勢，組織同盟罷工。于是和寶成工會里

的黨員姬兆生、錢富貴等研究，怎樣根據群眾的情緒，發動鬥爭，並且研究了如何逐步提高工人的鬥爭情緒，和保證工人第一次鬥爭的勝利。姬兆生等回到寶成工會，和工會代表們正在討論開展鬥爭的辦法，忽然有白日班車間工會小組長來報告，說門房開除了个小女工，小女工要求工會給她做主。工會立刻決定派代表姬兆生、錢富貴等三人向資本家辦交涉。廠長、總管、稽查一見工人代表出頭辦交涉就發了火：

“不提工會還好辦事。一提你們工會，不開除也得開除！”

工人代表平心靜氣地跟他們講理，他們却惱羞成怒地問：

“你們是不是要罷工？”

工人代表回答說：

“这点小事，值不得罷工。我們的意思，是要求這個女工照常上班。”

大驕臉上戴着一副“摺眼”的陸總管，一瞪眼說：“是不是不許她再上班，你們就罷工？”工人代表把臉一拉，沒有立刻回答，帶“摺眼”的驕臉總管，接着威脅工人說：“罷工不怕，你們說罷三天，我們就关门关三個月，餓死你們！”

“餓死我們？”工人代表冷笑笑。

小矮個子瘦猴張稽查，一見陸總管威吓不住工人代表，立刻向門外推工人代表：

“走！出去！以后再說，我們還有事呢！”

三个代表回到工会，立刻把交涉經過和資方不講理的情形，傳達給各个車間支會和小組。同時，工会的黨員姬兆生、錢富貴向李培良同志報告了情況，李培良同志指示他們再接再勵，繼續派代表向資本家交涉。並且估計這次斗争非罷工不能解決問題，叫黨員們通過工会組織，迅速在各个車間組織糾察隊，準備維持罷工以後的革命秩序。

工人代表第二次到了廠長辦公室，見到大驕臉陸總管。陸總管沒有等工人代表說話就先問：

“你們是不是還是為女工上班的事？”

“不錯。”工人代表們回答。

“他媽的！”陸總管一拍桌子罵着說：“不是給你們說了嗎？不行！就是不行！你們罷工就罷工！再說別的，就叫警察把你們收拾起來！”

“好吧！”工人代表一擰脖子走了。

工人代表回到車間做活，立刻向各車間支會串通明天早起兩班同盟罷工。

第二天早起五点多鐘，夜班下了班有一部分工人出了廠，到廠門南水泵集合，又有一部分工人在廠門北集合，分頭向上白日班的工友報告工会代表和資本家辦交涉的經過。白日班工友聽到資本家對工人代表蛮橫不講理的態度，氣得直跺腳，同意立刻罷工。工会代表一見夜兩班都同意罷工了，趕快按班按科組織起糾察隊來。接着把全體工人帶到鹽坨地去開大會。開大會的時候，工友們個個

爭着發言，提出了許多要代表向資方交涉的條件，這些條件歸納起來，有下列幾項：

- 一、不許無理開除工人、罰工人；
- 二、工資每人每天增加二分，恢復一年前原工價；
- 三、不許打罵工人；
- 四、十二點吃飯，休息一個鐘頭；
- 五、吃飯用車，廠方要給蓋飯廳。

正在開大會，資本家派打包間職員劉某來分化工人，工人群眾立刻趕走他。條件商量定以後，工會代表問：

“總管夸了海口啦，代表再去交涉，他就叫警察來收拾。扣起我們來了怎麼辦？”

“全都去！”群眾憤怒地呼喊，“看他扣誰！”

工會代表冷靜地解釋說：

“全都去也不好辦事。這麼着吧，你們在辦公樓外邊等着，我們進辦公樓去交涉。交涉的結果立刻報告大伙。”

“好！好！”

群眾扛起大旗立刻向工廠大門擁去。工廠大門出入工料，平日並不關閉。工人上下班搜身的工廠小門，是在工廠大門里邊辦公樓對過。群眾走到工廠大門外，一見資本家真叫了軍閥警察來，把大門關閉上，並且有巡和軍閥警察把着大門，端着槍吓唬工人。大伙一看更生氣了。有的工友拾起馬路上石子向里投，有的工友呐喊着用力撞大門。

在这个大门南边，有个出入骡馬車的豁口子，只是用木板子挡着。軍閥警察沒有注意这个缺口，另一部分工人却突破这个缺口，一直向办公楼包围去了，把守大门的厂巡和警察一見工人抄了后路，立刻向办公楼逃退，正門同时也被群众撞开。

兩路工人包围了办公楼門口，正要派代表上樓办交涉，立在樓梯上的軍閥警察，奉資本家的命令，突然向工人开了槍。工人听见槍声，立刻怒火冲天，呐喊一声，衝进办公楼。找資本家，資本家的代表人一个也没有。找开槍的警察，开槍的警察和厂巡，見到群众力量太大，张慌失措，打开后窗戶逃跑了。群众的怒火沒处消，立刻向办公楼的桌子板凳出了气。

有的工人还要去工厂砸机器，工会代表姬兆生等立在搜身門口劝阻了大伙，并且指揮糾察队把群众带到鹽坨地开大会。

在大会上，群众控訴了資本家叫警察开槍打工人的罪行，并且宣誓不获胜利，决不复工。这时候已經午后二点多鐘了，上夜班的工人还没有吃早飯，白日班也早該吃午飯了。于是代表宣布散会，回家吃饭休息以后，傍晚六时再开大会。

散会后，姬兆生、錢富貴等党员找李培良摇头，李培良对本厂斗争提供一些办法以后，并且鼓励姬兆生等說：“我們的斗争不是孤立的，全天津的工人都要援助我們！全中国的工人也都是我們的后盾。上海、广州和香港，以

及中國各地的工人，不是正在斗争着的嗎？”

傍晚六点多鐘，工人正在集合起来开会，从大直沽馬路上开来一輛汽車，汽車上下来几个青年人，头前的是个中等个，紅潤潤白淨長臉盤。他說他是天津学生联合会的代表，向工人宣布天津的学生同情工人的正义斗争，并且願意当工人的后盾。工人包围上他，兴奋得欢呼起来。

宝成紗厂的資方代理人，因为感到自己命令警察开槍打工人太占不住理了，不肯再自己出头和工人代表談判条件。学生代表叫工人在外边繼續开着会，他們就以調解人的名义，找宝成紗厂資方代表，并且代表工人举行了談判。

談判到晚八时，資方对工人提出的条件完全答应了。上述的五个条件以外，另外还有罢工的这一天的工資，厂方也照發。

学生代表宣布罢工斗争的胜利消息以后，工人群众們欢呼着感戴学生代表。这个紅潤潤白淨長臉盤的青年学生代表，笑着向工人群众說：

“这是你們自己的力量，这是你們自己团结斗争的结果！”

这个紅潤潤白淨長臉盤的青年学生代表，是共产党天津地方负责人之一——安先生同志。

气吞河山

宝成紗厂附近还有一个日商紗厂——裕大。这个工厂

的工人受的压迫和剥削，比一般工厂更要大，可是工会总是成立不起来。因为这个工厂里有个封建帮派“老头子”赵奎高，是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忠实走狗，利用帮口和会门的封建关系，愚弄着大部分工人，并且积极破坏工人的觉悟和团结。工人上李培良平民学校，他都干涉。

宝成工会斗争的胜利，给了裕大工人一个巨大的刺激。有一部分先进工人，以贺志、项瑞芝和项瑞成为首，开始冲破了工贼赵奎高的封建统治，筹备起来了工会。自己没有办公的地址，就暂且和宝成工会在一起办公。

为了交流经验和互相援助，当时采取的是联合斗争的方式。平日开大会，都在一起，斗争起来更是互相支援。裕大工会成立起来以后，先到宝成工会参加了一次大会，第二次又到河西北洋纱厂开了一次大会。工人的斗争意志立刻发扬了起来，于是和兄弟工会约定：回到本厂，明天上午向资方提出条件，如果资方在一天之内不答应，白日班下班的时候，就集合日夜两班开大会。河西北洋和裕元两纱厂工会决定带队过河去支援，宝成在附近，更不成问题。

第二天上午，裕大工会派代表贺志等向日本资方提出了象宝成工会提出的条件。裕大日本资本家不但不答复这些条件，反倒勾结中国军阀军警来镇压。厂内厂外的路口，都站立上了军阀军警。工人气愤得不得了，下了白日班，就要按预定计划到盐坨地去开大会。刚一出厂门，在厂外站岗的军阀军警竟拦住工人蛮不讲理地问：

“干甚么去，你們？”

“开会去！”工人并不隐瞒自己的正义斗争。

軍閥軍警却举起槍把子来威胁工人說：

“又他妈的开会造反！滾回去！”

工人立刻都火啦，围住軍閥軍警問：“日本鬼子多少錢买动的你們，你們就这样替他們压迫工人？”“別忘了自己也是中國人！”

軍閥軍警恼羞成怒，掄起槍把子就打工人。工人也不退縮，就一拥而上，和軍閥軍警扭打了起来。工会代表劝住自己的工人，說这是日本鬼子資本家的罪过，回厂質問他們去。糾察队立刻号召工人回工厂里包围公事房。这时候大門敞着正在上下班，可是开会的工人回来要进厂，守門的軍閥軍警立刻关了鐵柵欄門。工人企圖撞开柵欄門进厂，可是鐵柵欄門非常坚固，怎样用力冲撞，也冲撞不开。厂里边的工人想出来，也給擋挡住不許出来。

約定来开联合大会的各工厂工人，已經陸續來到。特別是附近宝成的工人，听到裕大工人要到鹽坨地开会去，被軍閥軍警打了回去，立刻全体来支援，和裕大工人一同包围了裕大工厂。

鐵柵欄門冲撞不开，有的工会代表看着工厂围墙砌得偷工減料，根基又鹹坏了，号召工人推倒围墙进厂。工人群众一呐喊，向围墙猛力一冲，围墙应声倒塌。工人群众立刻排山倒海一般冲了进去。

开来弹压工人的軍閥走狗，見工人把围墙推倒冲了进

来，立刻鳴槍示威，工人听见槍声并没有退縮，里应外合，兩路夾攻，更加勇猛地冲过去包围資本家公事房。日本鬼子資本家和軍閥走狗却給軍警們下了屠杀工人的命令！

軍警的槍不再向空中鳴放，立刻朝工人身上平射起来。工人看見階級弟兄一个个倒下去，紅了眼，振臂号呼，向軍閥軍警冲了过去，夺槍，怒打。

資本家和軍閥軍警有的竄到公事房高樓上去負隅抵抗，有的弃槍越牆逃命。工人群众，有的攻打，有的追捕，有的向公事房和机器房發泄仇恨。

工人空手繳获了十枝步槍，三枝手槍，俘虜住了一个日本职员，一个土城警官，一个軍閥走狗。这是天津工人第一次为了正义的要求，跟日本資本家和軍閥走狗發生的流血斗争。工人要想翻身，和武裝斗争分不开。

夜間在郑庄子下坡地开大会，裕大工会代表感謝各工厂工人弟兄的热烈支援。李培良以普通工人的身分上台講了話，号召工友團結一致为受伤工友报仇，并警告大伙加强战斗准备，今天开来的軍閥兵虽然被繳械了，可是軍閥政客还要繼續效忠于帝国主义者的。

主席宣布了明天上午在鹽坨地繼續开大会，就散会了。

散会后，李培良找到宝成工会党员代表姬兆生說：

“明天上午在鹽坨地开的大会，是全天津各工会的联合大会。我們只有把这个斗争，扩大成全天津工人罢工，学生罢課，商人罢市，才能取得最后胜利。你們要好好的布

置明天这个大会的会場，各工会群众到齐以后，还要游行示威，把全天津带动起来！”

血写的历史

夜十多鐘，鄭庄子周圍开来大批軍閥保安隊。見着站崗的工人糾察隊，首先聲明他們是來幫助工人鬧鬥爭的。並且有一個穿便衣的，自稱是天津軍警督察處陳督察長，要找工人代表商談事。工人糾察隊領着這個陳督察長找到值班的裕大工會代表項瑞芝，和寶成工會的糾察隊長趙恩杰。這個自稱督察長的陳某，見了工人代表又先聲明他們是來幫助做鬥爭的。工人半信半疑，還沒有答腔，他就提出了要求：

“為了敦睦邦交，你們把扣押住的日本人最好先放出来！”

工人代表從這句話里，立刻嗅出來了他的漢奸氣味兒，冷笑笑問他：

“你們保安隊和軍警督察處，是中國人不？”

所謂陳督察長立刻點頭哈腰地回答說：

“當然是中國人啦。”

“是中國人，”工人代表接着問，“為什麼先說保護日本人？”

所謂陳督察長立刻漲紅了臉，強詞奪理地解釋說：

“放出日本人去，才好幫助你們做鬥爭啊！你們老押着人家的人，你們提的條件，人家怎麼答應？我們官面上的

人还怎么帮助你們斗争啊？”

工人代表不相信他說的話，不肯放走扣押起来的日本人。陈督察长立刻拿着自己爹娘不当啥地罵起誓来，工人还是不相信他们会帮助工人和日本資本家做斗争。这位陈督察长一面罵誓，一面却拿出紙笔来，給工人代表立字据。工人代表項瑞芝和赵恩杰願意和其他工人代表商量商量再放。陈督察长說深更半夜地惊动那些代表干甚么？你們做了主就算啦，反正保安队并不走，还帮助你們做斗争呢。

項瑞芝又問受重伤的工友們怎么办。陈某說：“南市有慈善医院。我回去給他們去个電話。今天太晚了，明天吧，明天你們游行的时候順便抬去就行啦。”他似乎对于明天工人开大会和游行的事，也很清楚和很热心。

又談了談夜間工人糾察队和保安队共同站崗的事，項瑞芝和赵恩杰就被这个陈督察长慫恿着，胡里胡塗地擅自做主，允許他把扣押起来的日本人帶領走了。

全天津市的共产党組織为了准备第二天在郑庄子鹽坨地开的群众大会，紧张地工作了一通夜。第二天太阳出来不多会儿，散布在天津四周的工厂里的工人，已經开始向河东郑庄子集合。有的走河北大馬路，有的在沿海河过摆渡船。摆渡船被軍閥水上警察拉到海河中心下了锚，会游泳的工人弟兄就跳进海河里去，从海河中心把摆渡船摆到河西岸，一船一船向河东岸摆。所有海河的摆渡船，这天早晨都被开大会的工人掌握了。

宝成、裕大的工会代表正在郑庄子下坡地集合本厂的工友，准备到鹽坨地欢迎从天津各处集合来的阶级弟兄。在下坡地刚集合了百人上下，从下坡地北边高粱地里突然鑽出成队的军閥兵。他們一出高粱地，就如临大敌，一面打槍，一面呐喊着向工人队伍冲杀过来。

工人群众受到这种突然袭击，起头有些儿慌乱。工会代表号召工友们沉住气，不要跑。于是工人群众向郑庄子街里做有秩序的退却。纠察队的槍，立刻被他們夺了去。

工人群众刚退入郑庄子街里，从郑庄子村南又冲来了更多更猛的军閥队伍。他們見人就打，挨家搜尋，見人就抓。槍声不断，明晃晃的刺刀逼着每个人的心口。众寡悬殊，力量悬殊，郑庄子工人群众被迫地进入了裕大工厂。

从各处向河东郑庄子鹽坨地集合的工人队伍，也遭到了同样的袭击。青年时期的天津工人运动，第一次尝受到了被各个击破的痛苦！

郑庄子的军閥军警，把包围住、搜捕到的工人压缩到裕大工厂里。裕大駐厂巡警巡长刘甫臣認識裕大和宝成的工人代表，立刻到人群里指着名抓。

工人代表和纠察队长被指出了五个。特別叫軍閥走狗注意和痛恨的是宝成工人代表姬兆生。姬兆生小的时候腦袋上长疮，沒錢治，落了些疤痕；一口的山东腔，又經常公开代表工人办交涉，軍閥军警早就記准了他。巡长刘甫臣指出了他，他一看縮在人群里也脱不了灾，立刻雄赳

趙氣昂昂地走出人群，和軍閥走狗講理。穿着大皮靴的軍閥警官像驢掠蹶子一般跳起，朝姬兆生同志心口踢去。姬兆生同志沒提防被他踢中，立刻暈倒在地。昏迷了好半天，才蘇醒過來。蘇醒過來以後，慘无人道的軍閥走狗已經把他吊起來，並且掄着皮鞭子打。

姬兆生同志是個無產階級的硬漢子，又一想成天公開地領導鬥爭，瞞也瞞不住，于是他承認自己是代表，並且把一切責任攬在自己身上。這群漢奸走狗却夢想斬草除根，非要他咬出別的代表來不可。姬兆生同志一口咬定：“是我叫他們奪的槍，是我叫他們打的日本鬼子，是我叫他們砸的機器！”

一同被吊起來打的共有五個。留在老工友記憶里最深刻的，除了姬兆生同志以外，還有個十五六歲的青年工友，因為他在慌亂里，忘了撕去他胳膊上的救護隊的白繩紅十字袖章，而被指出來吊打。也是一連被打暈過去好幾回，軍警叫他咬別人，他始終不肯咬別人。

軍閥軍警是企圖把工人領袖一網打盡的，但是沒有想到工友們這般堅貞和義氣。最後只好把各處圈住的工人，通統帶走。於是警察廳，督辦公署執法處，軍警督察處，屋裡院裡都擠滿了被扣押的工人。

姬兆生同志倒背剪地捆着，解到軍警督察處，立刻上了手銬腳镣。

不給水喝，不給飯吃，餓到晚十二點鐘的時候才過堂。法官問他：“你是紡織工會的總代表嗎？”姬兆生

同志把脖子一挺說：“不錯，就是！”又問他：“是你領頭起的暴動嗎？”姬兆生同志仍是不屈不撓地回答道：“不錯，是我領的頭！”

法官起初聽着他招口供招的很痛快，心里好生高兴。可是又一看他那种氣吞山河、不怕一切的英雄氣概，彷彿受到威嚇，惱羞成怒了，拍着惊堂木，大声吼叫道：

“你領頭暴動，槍斃你！”

“槍斃就槍斃，既然干這個，就不怕死！”

姬兆生同志是一個共产党员。一個黨員，在他自由的時候，他要為工人階級、為革命事業奮鬥到底；但是當他已經被捕而失去一切自由的當兒，他只剩下了一個武器：堅貞不屈，為黨保守秘密。从此，法官再審問姬兆生同志，他只有一句話啦：“槍斃我好了，一切都是我干的！”

法官用威嚇的辦法吓唬不住他，鬼臉忽然一笑，夸獎起他來，說他又氣，說他是英雄好漢。姬兆生同志知道這是“貓哭老鼠，沒安着好心”，不理他。單獨法官引誘不出他的口供來，一轉眼翻了臉，大聲吼叫道：“光你一個人怎么能鬧起那麼大的暴動？可見你是不說實話，好，看刑！”

站堂的狗腿子立刻上前剝掉姬兆生同志的上身衣服，同時把刑具都搬過來：杠子兩條，鏈子一盤，一條杠子壓腿，一條杠子綁胳膊。鏈子盤在膝蓋底下。扶着綁胳膊的杠子，四條肥豬似的大漢子立在压在腿上的那條杠子上用

力輶悠。还有一个人，立在姬兆生同志面前，用兩条皮鞭子，抽打姬兆生同志的脊梁背。脊梁背上立刻成了“十字披紅”似的血痕。

姬兆生同志暈过去了，上刑的狗腿子就用凉水朝腦門一噴。姬兆生同志醒过来，法官还是問：“还有誰是？說實話！”姬兆生同志仍然是簡單地干脆地回答一句：“就我一个人干的，槍斃我好啦！”

于是又上刑，暈过去了又用凉水噴。噴醒了又問，不說，又上刑。一連治了三天。但是姬兆生同志仍然只是冷冷的那么一句話。

軍閥統治者沒有办法，只好把抓来的工人都放回去。楊寶如、賀志和張云生因为有狗腿子巡長血口咬着，也同姬兆生一塊儿下了獄。不久，又解来以同情工人罢工的学聯代表身分被捕的安幸生同志和海員工会盧妙根同志等十人。

再接再励迎接更伟大的斗争

軍閥統治者用无耻的阴谋和血腥的屠杀，襲击了天津工人第一次的英勇斗争以后，立刻宣布解散天津一切工会，并且繼續搜捕工人領袖和共产党员。

共产主义象一顆火种，在工人阶级最深处燃起了希望和光明，悽惨的飢寒交加的生活，把工人阶级鍛煉成鋼鐵。在英雄的共产党领导下的正义斗争，决沒有因为軍閥反动派的屠杀而退縮。繼續宝成、裕大的斗争而起的是裕

元（即今国营棉纺二厂的前身）工人一连几次的罢工。

接受了裕大罢工失败的經驗教訓，罢工以后工人决不离开工厂，不离开机器。資本家如果勾結軍閥走狗来鎮压工人，工人和机器共存亡，并且把棉花包象沙土口袋一般堵住厂門、車間門，如軍警开槍，棉花包起火，首先燒毀工厂的机器和原料。因此細紗科發起的增資斗争，順利得到胜利。

可是，資本家又想出破坏工人斗争的办法来了：或者对工人提的条件不答复；或者扣押工人代表，送交軍閥警察厅。有一次，工人派代表前后三次都被資本家扣起来送交軍閥警察厅，立刻激起工人大罢工，并且由工人糾察队把各个車間的資方代理人車間主管扣起来当抵押品。

資方勾結軍閥軍警来鎮压，工人糾察队关上大鐵門，拿起木棒子、鐵棍子当武器警戒着，軍警也不敢进厂。資方就叫軍警封鎖上大门，不許工人家屬进厂送飯。工人們餓了一整天，到晚上織布厂工友想起来了：浆出洋白紗科庫房里有白面，于是大家一涌而上，砸开庫房，扛面来。有的找劈柴，有的找鍋。木头好找，那里有那么多的鍋呢？就用水桶蓋子和鐵板當鍋，烙起大餅来了。烙熟了大伙就分着吃。

資方一看用封鎖的办法治不服工人，就叫工人家屬来指名召唤自己人回家去。企圖用这办法瓦解工人团结。虽然有少数人动摇了，可是經大家一解釋，也就又坚决起来。但是軍閥軍警却利用工人家屬做掩护，冲进工厂，把

工人压缩到车间里去，企图各个击破。

工人刚退据在各个车间里去，人事科长楊羔子就趾高气扬地出来瓦解工人团结。

楊羔子是裕元工厂的活閻羅王，他自己有一套刑具，他的办公室就是法庭。他是资本家的忠实走狗，工人阶级的死敌。裕元紗厂在一九一五年成立，十几年的工夫，从一个厂，增加到三个厂；可是河东裕元公葬地里却埋上了近二千艺徒（养成工）。这些夭折的青年和童工每个人的身上，都烙印着楊羔子的牛筋鞭子的血痕。事过境迁三十多年了，在裕元学过徒、今天已经白了头髮的老工友，一提楊羔子，浑身还起鸡皮疙瘩。可见楊羔子当时多么威风，也够多么残暴。

楊羔子先到織布厂分化工人。布厂车间大门已经被工人纠察队关上，堵上，抵抗军警的进攻。楊羔子就立在布厂窗戶外边罵工人是餓不死的穷骨头，要工人赶快无条件投降。工人起初对他没办法，他却越罵越张狂，最后竟用文明杖敲打着窗戶訓教起工人来了。有一个工人纠察队员瞅他冷不防，从窗戶里猛然伸出手来抓住他的脖子，又一伸手掐住他的脖子，用力一提，从窗戶里把他提进车间里来了。

性情急躁，平素又受过他打罵的工友，就主张当场打死他。这个胆小的资本家走狗，起初那么狂妄，被抓住以后可就吓得魂不附体。后来工会的人說不用打死他，拿他做抵押，换回咱们那些代表，不更好嗎？大伙都說对，这

才沒有打死他。

資本家舍不得楊羔子這條對主人無比忠順，對工人無比殘暴的瘋狗，同時又看到工人占據着機器罷工三天三夜了，愈戰愈堅，決不屈服，於是叫軍閥警察廳長出頭，假裝調解，資方也答應了工人要求的條件，於是互相釋放了雙方被扣押的人員。

資本家對工人提的條件，答應是答應了，但是軍閥警察廳密探却在廠外瘋狂地抓捕工人代表和糾察隊。對於領導工人運動的共產黨人抓捕得更緊。並且抓住了就殺。以張廷瑞、秦茂軒、王玉山為首的七烈士，就是這時候被捉去槍殺的。

不久，國民黨軍隊來到了天津。天津工人曾經用熱情和血的鬥爭策應了北伐革命。但是國民黨來到天津以後，對工人比封建軍閥官僚更殘暴、更毒辣。國民黨一方面用監獄和屠殺對待工人，另一方面却又從工人內部收買工賊、建立特務網和偽工會，里外夾攻地鎮壓工人，以便更有效地盡忠于帝國主義和中國官僚資本家。

共產黨被迫進入更艱苦的地下活動了，可是舉起了更鮮明的旗幟。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五日天津工人究竟看見了自己的天空，看到了自己的旗幟。

我們是怎样編寫工厂史的

棉紡三廠党委宣傳部

在这東風壓倒西風，一天等於二十年的偉大歷史時代，進行編寫工厂史的工作是有很大意義的。因為職工們回憶和了解了過去生活的苦痛，就會更加感到今天生活的美滿和幸福；了解了過去工人階級战胜反動統治的英勇鬥爭，就會充滿力量來建設今天的新生活；了解了黨領導着工人階級走過的道路，就會更加熱愛我們的黨和偉大的領袖毛主席。工厂史對於一個工厂來說，正是進行思想建設工作的有力武器。

編寫工厂史，在我國是一個新的工作，沒有前人的經驗可以借鑒。我們是怎樣編寫的呢？我們走過這樣的道路：

一、摸清家底，召開座談會

寫工厂史必須掌握大量的歷史材料，否則就無從寫起，而我們的領導同志們雖然多是老工人，但是因為年輕，過去的事情雖然聽見說過，知道的很不系統。這樣就

不好进行这一工作，怎么办呢？經過研究，我們決定从兩個方面摸清家底：一个死材料——档案，一个是活材料——了解老工人。首先翻开了全部档案，档案里面多是簡單的生产表报，連工厂的事务档案都沒有，关于工人生活和工人斗争方面的材料更是少見。在翻档案的同时，我們把全厂职工按工会分类排队。然后再根据各个时期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召开座谈会。在座谈会上，一方面要求他們談談自己经历过的事情，另一方面談談耳聞过的事情和那些有关人物。前后召集了二百来个职工，开了四十多个座谈会。通过这些老工人的口述，就基本上掌握了全厂發展的历史材料。这些材料虽然丰富多彩，因都是比較粗糙的东西，有些事隔的年头久了，一时想不完全。我們把已經掌握的材料，經過細致的分析和研究，選擇能够反映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典型人物和典型事件，再进行多面的深入細致的訪問和查对，保証材料的絕對真實性。

二、大搞展览会，發动全厂职工编写工厂史

家底摸清了，怎样發动全厂职工来编写和怎样在编写过程中使大家受到深刻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呢？有兩种方法：一个是直接写成文字編成書，另一个方法是把已經掌握的材料画成連环画举办工厂史展览会。經過研究認為前一种不容易一下子把工人發动起来，后一种方法比较好。展览会不仅能教育职工，而且能够發动群众来编写自己的历史。画画的工作开始了，当时因为我們对工厂史

的認識不怎么深刻，着重的描写了新旧生活对比。为了使繪画真实，一边画，一边使厂級和車間的领导和老工人來參觀。他們提出了很多意見，使我們不但对画面作了修改，而且改正了反映工人斗争少了些的情况。有的老工人說：“那时虽然我們受苦；可是我們时时都在斗争。統治阶级的鞭子抽的越緊，我們的斗争越強。”党委書記也說：“工厂史主要是工人阶级斗争史，生活只是一个方面。”同时市委宣傳部和作协的同志也提出了意見，作了指示。我們根据大家的意見反复进行研究和學習，最后也深深的体会到了：在过去工人阶级虽然灾难重重；但每个人都是硬骨头，并且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了頑強的斗争。例如王佩玉虽然在旧社会因怀孕被开除了三次，但是并沒有屈服，相反的她却站在工头面前罵了他一个屎臭屁騷。另外，工人們当时“偷”东西，警察搜出来就上刑毒打；但是鞭子越狠工人“偷”的越厉害。同时我們从思想上明确了，工厂史應該以党的領導作为一根紅綫，来反映工人的斗争、生产条件、公共福利和个人生活。这四方面，是有机联系而不可分割的整体，忽略了那一方面都不能真實現全面地反映工人阶级的历史。我們根据这些修改和补充了展览会的內容，然后又請领导和老工人參觀，又提出了意見就又进行修改和补充，这样反复地补充修改了三次，才完成了展览会的工作。我們这样做并不是沒有波折的，当时有些领导同志对工厂史的意义認識不清，因此不积极的給以支持，并且說这是“厚古薄今”的工作。但是工厂史

一出現就顯現了它巨大的生命力。在修改工廠史展覽會的過程中，很多干部受到深刻的階級教育，尤其對知識分子出身的干部教育更大，他們過去就不了解工廠的历史，當然更不能很好地了解和認識工人階級了。另外，對工人所起的現實教育也是很大的，在布場九隊搞“兩參一改”（即干部參加生產，工人參加管理，改進舊制度規章）的試點工作中，發現了部分人有“三怕四顧慮”，即怕得罪人、怕干不了、怕指出漏子來挨批評等等，並且有一個叫鄭炳常的工人經常違會都不參加，就更甭說參加管理了。開了幾次辯論會也沒有解決。怎麼辦呢？展覽會只搞了一半他們就去參觀了，參觀之後老鄭感動得要哭，他說：“我錯了，過去我們在人家腳底下干活，挨揍連言語一句都不敢，今天黨讓我們參加管理，我還坐屁股，真該打！現在給我什麼工作都行，保證一定做好！”這樣，試點工作就順利的進行了。為緊密的配合兩參一改，擴大黨委号召，各車間有人出入、有力出力。原來要一周內完成展覽會工作，結果只三天就完成了。

展覽會在5月15日到18日舉行。各車間分批組織職工參觀。在參觀的時候，很多白髮蒼蒼、儿女成群的老工人被那些亲身經歷過的可歌可泣的史實感動得掉了淚。比如布場工人何永第，在看展覽的時候，領着自己的小孩，他看到過去工人飢寒交迫的生活和在鬥爭中犧牲的伙伴，他激動得掉下了眼淚，只好把孩子打發走自己含着淚再繼續往下看。老工人左福祥說：“過了小十年的好日子，以前

的痛苦有点忘了，象吃东西总是挑挑拣拣，自从看完工厂史又重温了过去，吃什么都香，干什么都有劲了。”苏貢文，因为有病，大夫給了兩天假，他想起了过去工人的斗争，就把假条掖在口袋里，又进厂干活了。

对新工人的教育更大，漿紗工人張繼全，过去在工作中挑肥揀瘦，爭工資、闊名譽，自从看了工厂史也被感动得哭了，并且說：“我虽然作了几年工，但是对工人阶级并不理解，所以才做出来那些不利于工人阶级的事来。”从那以后他一个人就干了兩个人的活。

总之，他們看了工厂史，对旧世界充满了憎恨，对新社会就更加热爱了。这样工厂史就成了推动生产和教育职工的最好的教材之一了。在全厂职工討論的时候，虽然組組有哭声，但是每一滴眼泪都是对旧世界的控訴，都是建設社会主义的力量。“兩參一改”有如順風駛船，順利的推广开了。另外大家看完了展览以后，又补充了很多材料，把在原来座談会上沒有了解清楚的材料也搞清了，比如过去在宝成紗厂有个叫黃文亮的被皮帶絞死了，在开座談会的时候只知道姓黃，想不起叫什么名字了，看过展览，大家就补充出来了。这样使得工厂史的材料更丰富更全面了。

三、怎样写，依靠誰來寫

职工們參觀了工厂史展览会，受到了深刻的社会主义教育，很多老工人要求把工厂史編成書，拍成电影，編成戏来教育自己和后代。党委根据群众的要求，提出“党委

領導，以創作組為骨干，全廠職工動手來編寫工廠史”的口號。立即組織職工座談，運用大字報的形式來編工廠史，每一個工人都談了自己過去的痛苦生活和英勇的鬥爭，一共有三千多張發言記錄，同時有很多老工人寫了大字報，^抄僅貼到展覽會上的就有二百多張。另外業校高年級的學生作文也寫的是工史，共計有六百多篇。這些材料的特點是內容生動，語言朴素，有的稍加整理就行了，例如：

“小妮子”就是根據大字報整理的。另外還有一個問題，就是一個人只能了解一個片斷，象“八間房”，“一九二五年的風暴”等，這樣的材料，就得綜合起來，也就是在群眾創作的基礎上加以系統的整理。

依靠那些人來整理呢？我們根據每一個歷史事件，組織了有關的老工人和創作組的骨干來系統的編整工廠史的工作，在開始的時候，他們有些迷信思想，認為干活是手拿把摃，寫文章是作家的事，要說說也差不離兒，要寫可辦不到。經過宣傳部同志的再三动员、啟發和“新港”編輯部的編輯同志下來分頭幫助，這樣老工人就拿起筆來寫自己的歷史了。

在寫的過程中，我們體會最深的是：凡是老工人寫自己亲身經歷的就寫得又快、又生動，用不着怎麼修改，例如：“二十六個粗紡工人罷工”是老工人姜汝為寫的。他的文化程度不高，可是寫起自己的事來特別快，他只用了兩天時間就寫完了。根據他這篇文章，組織了經驗交流會，讓大家討論了他的文章。新港編輯部的同志又分析了

这篇文章的特点，鼓舞了大家的写作热情和信心。另外，有些老工人虽然不是写自己亲身经历，可是他們有过那种生活体验，写起来也快也生动，例如：“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屠刀面前”的作者，虽然当时没参加那个斗争的行列，但经历过当时的斗争，写出来就用不着修改，比较困难的却是文化程度比较高，解放后才参加工作的作者。他們的主要缺点就是沒有在过去的工厂生活过，写出来就不象原来的样子，都得認真去加以修改。象“八間房”，“偷”都修改了三四遍，才定稿。根据这些經驗，在十一月底，我們又提出第二批写作提綱，組織編寫組的同志們座談，根据每个的特点，分派題目，大家研究了写作提綱，根据不同情况进行不同的帮助。对老工人主要是帮助組織材料，提供細节的写作提綱，而对新入厂的作者，就需要多介紹一些过去的情况，帮助他們写得真实，写完之后，再多修改兩遍，就可以了。这样我們在沒有专家的帮助下，自己写出了十四篇文章，完成了第二批的写作任务。

根据我們的体会，只要加強党的领导，充分的发动群众，并取得专业文艺工作者的辅导，我們工厂是可以把工厂史編好的。

